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 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

〔苏〕若莱斯·A·麦德维杰夫

〔英〕安德鲁·R·德肯 译

邵子婴 宋 嘉 译

赵 洵 校

吉林人民出版社



2 024 2419 9

# 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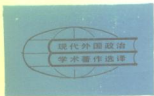
〔苏〕叶·A·瓦西里耶夫

〔苏〕伊·A·瓦西里耶夫

〔苏〕瓦连季·K·普里

多尔斯基 等著

李 毅 译



## 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

〔苏〕罗伊·A·麦德维杰夫

〔苏〕若莱斯·A·麦德维杰夫

〔英〕安德鲁·R·德肯 译

邹子婴 宋嘉 译

赵 洵 校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5%印张 130,000字 2插图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600册

书号：11091·66 定价：0.87元

## 出版说明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 目 录

序 .....	( 1 )
前 言 .....	( 5 )
第一章 斯大林的遗产 .....	( 9 )
过多的接班人 .....	( 10 )
清除贝利亚 .....	( 14 )
第二章 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 .....	( 20 )
第三章 农业改革 .....	( 30 )
第四章 西方的挑战 .....	( 42 )
对国家保安部的改组 .....	( 43 )
一点小小的成绩 .....	( 46 )
第五章 权力之争 .....	( 50 )
第六章 农业“奇迹” .....	( 59 )
新边疆——处女地 .....	( 60 )

	种植玉米运动 .....	( 64 )
<b>第七章</b>	<b>赫鲁晓夫占了上风 .....</b>	<b>( 67 )</b>
	“秘密报告” .....	( 67 )
	事件后果 .....	( 71 )
	1957年的戏剧性事件 .....	( 75 )
<b>第八章</b>	<b>赫鲁晓夫操之过急 .....</b>	<b>( 81 )</b>
	机械——拖拉机站——事与愿违的结果 .....	( 85 )
<b>第九章</b>	<b>梁赞州的惨败 .....</b>	<b>( 93 )</b>
<b>第十章</b>	<b>苏美制度的联姻 .....</b>	<b>( 100 )</b>
	对工业的震动 .....	( 101 )
	国民经济委员会 .....	( 102 )
	效果 .....	( 103 )
	对科研机构的改革 .....	( 105 )
	对农业的震动 .....	( 106 )
	农业部的命运 .....	( 108 )
	“从柏油马路到田地” .....	( 110 )
<b>第十一章</b>	<b>“农业奇迹”乌云笼罩 .....</b>	<b>( 113 )</b>
	开垦处女地的胜利成了问题 .....	( 113 )
	玉米运动的后果 .....	( 118 )
	玉米作为青贮饲料 .....	( 119 )
	玉米作为粮食作物 .....	( 121 )
<b>第十二章</b>	<b>赫鲁晓夫身边的人物 .....</b>	<b>( 123 )</b>
	T · D · 李森科 .....	( 124 )
	M · A · 奥尔尚斯基 .....	( 129 )
	A · S · 谢甫钦柯 .....	( 129 )
	V · S · 列别杰夫 .....	( 131 )

A·阿朱别依 .....	(133)
<b>第十三章 引起政治危机的“改革” .....</b>	<b>(135)</b>
<b>第十四章 失败的苦涩 .....</b>	<b>(149)</b>
形势确实使赫鲁晓夫很难堪.....	(150)
更多的烦恼 .....	(151)
对休耕地的错误处理 .....	(153)
首当其冲的肥料问题 .....	(155)
对赫鲁晓夫的补救措施的反应 .....	(157)
<b>第十五章 赫鲁晓夫下台 .....</b>	<b>(160)</b>
<b>第十六章 在赫鲁晓夫之后 .....</b>	<b>(168)</b>

# 序

赫鲁晓夫执政的年代，是苏联进行了真正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时期。尽管这些改革充满矛盾，而且毕竟是有限的，但在实际上，苏联社会生活的每一领域无不受到1953年至1964年这段时期变革的影响：大恐怖的结束，千百万监押在集中营的囚犯获释，为限制一些最恶劣的官僚习气和特权所采取的措施，公众的觉醒，知识界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改革；以及导致我们今天所谈的“缓和”的外交政策的变化，等等。这个常被称为“非斯大林化”的改革的过程，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中远不只是它的发生没有引起长时间的暴力或动乱和往往出人意料这两点。

许多研究苏联问题的西方学者，对这些事件的发生缺乏准备，因而理解得也迟缓。他们被斯大林二十五年的恐怖专制主义统治及其强加给社会和官场的畏惧、尊奉、僵化的形象所束



缚，也被他们自己头脑中固定不变的“极权主义”的苏联模式所禁锢，感到难以想像任何重大、持久的变化。他们否认或者看不到，在赫鲁晓夫作为苏联领导人当权的整个时期内，这种变化已经发生，而且进行改革确是赫鲁晓夫的本意。赫鲁晓夫从俄国上层进行改革的传统出发，把自己看作是（也正如某些人评论的那样）“好皇帝”尼基塔。不少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赫鲁晓夫反复无常的改良主义进程所迷惑，把他的政策解释为仅仅是为了“权力之争”——这通常被看作是苏联政治的唯一实质——而搞的权术。还有一些人，甚至在赫鲁晓夫1964年10月被迫下台前夕，还拒不承认他一直是一个极力奋争的领袖，这位领袖的政策在苏联官僚机构内部，以至在他的最高层的同僚中，都遭到了激烈反对。

1964年以来，以及1971年赫鲁晓夫逝世之后，西方专家和苏联公众对赫鲁晓夫的看法的分歧点，转移到了赫鲁晓夫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及其遗留的影响问题。一种也许是对赫鲁晓夫较为有利的观点正在慢慢形成。但是由于我们的注意力某种程度上仍然集中在苏联制度中继续存在的独裁主义的一面，致使赫鲁晓夫实行改革的全貌至今仍被习惯势力掩盖着。这种情况，还在妨碍着尽管有许多弱点和过失的赫鲁晓夫，受到他在历史上应该享有的尊重。

罗伊与若莱斯·麦德维杰夫的这本书，对于我们理解赫鲁晓夫的时代，或者重新考虑对这个时代的评价，有着重要意义。它出色地概括叙述了使得赫鲁晓夫获得权力，成为苏联领导人，继而失势的主要事件与问题，内容丰富，分析性强，富于洞察力。即便是可能不同意麦德维杰夫兄弟的这一或那一论点的读者，也会赞赏他们对于从非斯大林化的早期阶段，到赫鲁晓夫的狂热，及最终灾难性的农业和党内改革，这一系列关键事

件的明晰的阐述与新颖的见解。本书中明确论及的一些重要政治问题，并没有与赫鲁晓夫的生涯一起结束。赫鲁晓夫之后的领导又遇到了这些问题并且发生分歧，就象以后的领导还会面临这种情况一样。

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它看待和分析问题的独特的角度。正如若莱斯·麦德维杰夫指出的，赫鲁晓夫时代对于作者来说，是一部“活着的历史”。他们的著作是第一部由苏联作家“从内部”所作的广泛的分析研究。出自这两位苏联作家之口的“活着的历史”一语，决非文字上的渲染、修饰。作为三十年代斯大林恐怖时期的一个受害者的后代，苏联知识分子阶层的活跃的代言人和社会主义的革新派，（罗伊本人还是共产党员），他们与赫鲁晓夫的政策利害关系，是社会性的，也是与己唇齿相关的，赫鲁晓夫倒台之后，他们的命运就证实了这一点。个人的卷入使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非常有趣，但我认为并没有因此而歪曲事实本身，尽管他们自己也有过“希望与幻灭，……热情与痛苦”，麦德维杰夫兄弟还是对赫鲁晓夫做出了在我看来是公正、恰当的评价。他们对他的错误的批评是严厉的，同时提出“他还有不少值得赞誉之处”。

当然，罗伊和若莱斯·麦德维杰夫的观点，不能代表苏联所有知识分子或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的众多的不同见解，也不可能由哪一个人来代表。尽管如此，我以为他们的看法仍然颇具代表性。将来，有关赫鲁晓夫时代的著作会更多起来，目前在苏联，仅仅是地下刊物上有所评述。<sup>①</sup>麦德维杰夫兄弟关于

---

① 由一些当事人撰写的专题性见证材料已经开始出现，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关于文学政治的回忆录《小牛撞橡树》（1975年巴黎版），和弗拉基米尔·拉斯克金的《索尔仁尼琴、特瓦尔多夫斯基与新世界》，《二十世纪》杂志第二期151—218页，由罗伊·A·麦德维杰夫编辑（1977年伦敦版）。

赫鲁晓夫的“积极作用”的观点，一定能经得起考验而站住脚。而且可能时间愈久，材料愈多，愈会得到证实。同时我们深知，在大多数社会中，影响深远的改革往往要经历数十年漫长的历程，一点一滴，困难重重，时进时退；而且在改良的进程得以重新开始之前，一般总先有保守势力的反攻，正象赫鲁晓夫之后在苏联发生的情况。以“一半是失败了，因而也就有另一半是成功”这种较长远的政治眼光看来，诸如赫鲁晓夫这样的伟大的革新者们，只有在当他们的经历成为历史以后，才能得到我们的充分的理解与尊敬。

斯蒂芬·科恩

## 前 言

本书虽然篇幅不长，却是作者从1963年起，经过长时间的持续努力写成的，中途曾有过间断。那时，赫鲁晓夫刚恢复自用地实行计划不周而又风险极大的农业政策，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苏联在它的历史上，也是在整个俄国的历史上，破天荒的开始从国外购买粮食。<sup>①</sup>

我之所以对赫鲁晓夫的政治、经济改革发生兴趣，是由我对苏联遗传学争论的历史所做的研究引起的。关于这个研究，我写了《T·D·李森科的兴衰》一书。至于本书的合著者，我的兄弟罗伊对赫鲁晓夫政策的分析，则是他的《让历史来审判》一书的自然延续。这本书，是他研究斯大林主义历史的一个成果。罗伊和我还在1964年至1971年在莫斯科流传的地下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关于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的文章。

我们对赫鲁晓夫的研究，在1971年被暂时地，然而粗暴

---

<sup>①</sup> “俄国”自然指的是1917年以前，苏联则是十月革命后的国家组织。

地打断了。那年十月，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得知《让历史来审判》一书不久将在美国问世，便搜察了罗伊的住所。他的全部有关斯大林的研究资料都被没收，还没收了他所有的关于赫鲁晓夫的笔记和材料。甚至连从苏联报刊上收集的剪报也未幸免。尽管如此，以在《政治日记》上发表过的文章为基础，1972年我们得以又重新开始了研究工作。

1974年本书完成，其中的政治性章节，是我在伦敦撰写的。

我对本书的出版负完全的责任。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罗伊仍在苏联法律的约束之下。他在行动上很受限制，也缺乏象我这样旅居苏联境外的人所具有的、与西方出版界联系的自由（我是由于被剥夺了苏联护照和国籍而被迫流亡的）。书检审查使我不可能将手稿寄回国内，让罗伊看到本书的全文，也无法就出版前书刊评论者建议的某些修改征得他的同意。

在西方，有关赫鲁晓夫的文献作品屡见不鲜，还有几种版本的传记。而在苏联，不仅见不到关于他的书籍，就连他的名字在1964年以后也从报刊上消失了。只是1971年，苏联报纸发了一条很短的消息，公布他的死讯。即使是地下刊物上，也没有关于他的专题文章，或为他而写的回忆录。这个刊物对于斯大林时代的注意和研究，远远超过了赫鲁晓夫时期，在罗伊和我分别撰写有关斯大林和李森科的那两本书时，我们手头备有大量的回忆录，评论文章及其他材料。而赫鲁晓夫1964年下台以后。关于他的材料就少的可怜了，事实上，本书是第一部由苏联作家写的关于赫鲁晓夫的书，也是以亲身体察过他的改革的人的目光，“从内部”来分析赫鲁晓夫的改革和政策的首次尝试。

西方在1971年和1974年先后出版的赫鲁晓夫两卷集回忆录，对我们从事研究的参考价值并不大。因为他的回忆录，主

要讨论的是国际问题。在论述个人生平和政治生涯时，没有提供文件依据。对他自己政治和经济上的许多错误，也没有做自我批评的分析。他还回避了对其农业政策的探讨，而这，正是本书的中心议题。

西方人所写的，为数颇多的有关赫鲁晓夫的著作，提供了大量饶有趣味的史实材料。但这些毕竟是“来自外部”旁观者的分析，是那些往往对另一个国家的内部结构缺乏深入了解的人写的学术论文。

而对罗伊和我说来，赫鲁晓夫和他的时代至今仍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我们怀着希望与幻灭参与了这个时代的生活，有过热情，也有痛苦。我们曾为他大胆的政治、外交方面的变革而欢欣鼓舞，也曾为他在简单处理经济、农业以及理论问题上所不时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无知而愤激。仔细回味这些往事是很令人痛心的：赫鲁晓夫在有了那样一个辉煌的起点之后，该能为苏联和世界做出多么巨大的贡献，而结果，他的作用发挥的极其有限，并且在突如其来的事变中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这个突变，是1963、1964年发展起来的危机的必然结果。在本书中，我们力图作为亲自在苏联境内生活过的人所感受的那样，描绘出赫鲁晓夫时期的环境、气氛。

我们并不打算写一部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全面传记，也不想叙述赫鲁晓夫时代的全部历史。在这段刚刚流逝而去的时间里发生的许多事情，已经在多种书刊中得到了探讨。其中一个贡献卓著者，正是赫鲁晓夫本人。他除了回忆录之外，还发表了若干卷讲话稿，包括国际问题、农业问题和其他内容，例如关于“文学艺术的责任”的讲话等等。所有这些文本，以及按照他的指示所做的外交政策方面的许多变动，生动鲜明地展现了他的频繁的活动，展现了他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取得的切实

的成果，和他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对苏联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控制。所以，我们不想重复，哪怕仅仅是简短地重述他所做、或是在他掌权时期所发生的一切。

要说明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升到了列宁和斯大林曾经达到过的高度（即个人具有指挥一切对内对外政策，改变党的纲领、章程，任命或罢免政治人选和提出并通过新法的种种权力），并不困难——历史学家们不难对他擢升给予解释和评价；然而要解释他的出乎世界各国意料之外，引起了巨大震动的下台，就是对历史学家的严重挑战了。在苏联，人们认为他的下台只是时间问题，因而没有过份的震动就接受了这一事实。赫鲁晓夫的演变，从1953年至1957年的小心谨慎，有条不紊的革新者（要记住，那时他还处在顽固、保守的反对派的遏制之下），到攫取了全部权力之后，仍然成了激烈的研究课题。当然，在1957年以后，赫鲁晓夫确实取得了一系列积极的成果，而且假如他1964年以后仍然当权，也许还能做得更多。但必须正观的是，从1958年至1964年期间的许多计划和运动造成的恶果，至今仍在苏联发生影响。

在地下刊物最活跃的时期（1962—1966年），苏联作家还可以使他们的批评性著作的原稿，在本国知识界中自由传阅，由此得到一些新的原始材料和有益的评论。现在，这种“内部”传阅手稿的有利环境已不复存在。因此，作为本书的作者，我们希望这部书将有助于搜集赫鲁晓夫有关国内政策方面尚无人知晓的，独特的新材料，也希望本书能为将来进一步探讨我们所思索的问题提供一个基础。

若莱斯·A·麦德维杰夫

一九七六年一月于伦敦

# 第一章 斯大林的遗产

在着手写这部书时，我们打算先把直接有关的背景描绘一下。以便为赫鲁晓夫和他执政的时代这幕戏搭起舞台。这个背景就是：斯大林留下的恐怖；他死后表面上有所克制而实际上毫不放松的权力斗争；以及赫鲁晓夫在农业和政治方面的试探性的改革，这些改革，很机敏微妙地适应了当时普通公民的愿望与要求。在这之后，我们就要转向本书的主题——赫鲁晓夫那些混乱的、破坏性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冲击，他将这一切无情地强加给了迷惑不解的人民。如果“太少、太慢”会导致一场战争的惨败，那么“太多、太快”同样可以给一个国家带来灾难。

我们列举的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不是重复一些谣传，而是来自一份尚未发表的、1964年10月以后在党内传阅的秘密文件，文件中历数了赫鲁晓夫的错误。但我们的分析，大部分还



是有独立见解的。我们不仅指出了赫鲁晓夫个人的缺点，而且指出了当时整个权力结构的缺陷，以及从斯大林时期延续下来的，在赫鲁晓夫手中只是略有改动的社会制度的弊病。

## 过多的接班人

1953年3月，约瑟夫·斯大林的死亡，造成了一种奇特的政治真空。在他活着的最后几年里，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包括最亲近的同事。由于一直害怕被推翻，他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政治遗嘱，也没有指定接班人（1923年，列宁感到即将寿终时，曾以给党的代表大会的一封信的形式留下遗嘱，对他身边的其他领导人做出了评价。可笑的是，他的关于将斯大林调离权力中心的这一主要意见，恰恰没有得到实施）。斯大林很少想他什么时候会死，甚至在死的前一天，他还在策划对一些政治要人进行一场新的、彻底的清洗。这之前，领导中央委员会的核心小组——老政治局，已经被改组为由三十几个成员组成的、大一些的主席团，而其中没有一个人能说、或者敢说自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

尽管是暂时的，那时真正的权力是由副总理乔治·马林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拉弗林季·贝利亚，和他们一道、一度曾任外交部长的弗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掌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斯大林主要是通过政府渠道，而不是通过党的机构来行使其专制权力的。他的主要身份，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被削弱，总书记一职改为第

一书记。①过去斯大林曾在这个职位上掌管过国家的绝对权力。现在他感到，以苏联政府首脑或主席，即行政头目的身份直接行使专制权，比以党的领导人的身份间接行使权力更方便。同时，政府首脑的职务对控制他在战后建立起来的整个帝国，和以苏联政府的名义采取国际行动，也更为便利，因此，斯大林死后的关键职位是总理。②

这时贝利亚不可能上当总理，因为在斯大林生前最后几个月，他已被剥夺了一部分权力，不再单独负责镇压机关——国家保安部的工作。另一个间接原因是，在斯大林的最后一个恐怖行动，即所谓“医生谋杀案”③被捕的人当中，有一个是贝利亚的下属，当时保安部的头头阿巴库莫夫。他被捕后，由马林科夫手下的S·伊格纳耶夫接替了其职务。伊格纳耶夫刚从中央委员会调来，在斯大林死前，尚未来得及清洗贝利亚的众多的支持者。

斯大林死讯宣布后的第二天，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谁来治理国家。在贝利亚提议下，马林科夫被指定为总理。他接受这个职务时，又报恩似的提议将内务人民委员会与国家保安部合并，由拉弗林季·贝利亚负责。莫洛托夫任第一副总理，并且恢复了外交部长职务（斯大林讨厌他时，他的这个职务曾一度被剥夺）。在斯

---

① 第一书记指定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总书记意为全党的领袖。

② 斯大林通过马林科夫来控制党的机器。马林科夫被给予了非凡的荣誉，在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做了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这是自1923年以来，除斯大林之外，第一个做这种报告的人。

③ 一些医生，多数为犹太人，被指控为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或外国情报组织的特务。指控他们蓄意错误地处置一些高级官员的医疗，使病症拖延，甚至造成死亡。这就是所谓“医生谋杀案”。但其实，这一事件是斯大林一手制造的，正如被指使去进行迫害的人清楚地知道的那样，指控是毫无根据的。

大林面前失宠的K·E·伏罗希洛夫，担任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时，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从三十人减为十人，按如下顺序排列：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名单的排列顺序很重要，因为在习惯上这表明了一个人在政权体系中的地位。那时，赫鲁晓夫仅名列第五。

这次会议，没有决定由谁担任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把手。但在此之前已经宣布，鉴于赫鲁晓夫必须集中精力做好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所以将免去他莫斯科市委书记的职务。斯大林葬礼的具体事宜是由赫鲁晓夫主管的，但发表讲话的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贝利亚。苏联国内外都认为，这便是执政的三巨头。

1953年3月14日，党中央委员会接受了马林科夫辞去中央书记的请求，以便他全力做好总理的工作，赫鲁晓夫被指定担任党的领袖。但不知何故，这个决议直到3月22日才公布。

对赫鲁晓夫的这一新的任命，并没有使人们联想到一个斯大林的接班人正在出现。无论在党内或社会上，一般人不认为赫鲁晓夫是苏联领导阶层的主要人物。除了赫鲁晓夫之外中央书记处书记还有M·A·苏斯洛夫、P·N·波斯佩洛夫、N·N·沙特林和S·D·伊格纳耶夫。其中，只有赫鲁晓夫同时还是中央主席团成员。十分明确的是书记处只在党内起作用，不能指挥最高苏维埃。因此，赫鲁晓夫也不能对马林科夫发号施令，在斯大林死后的一些日子里，马林科夫无疑是全国最有威望的人。赫鲁晓夫几乎被他所有的同事都视为工作勤勉但无创见的凡人，根本成不了全国性的政治人物。他们认为他缺乏政治理论，平庸甚至有些粗野，绝不会渴求过份的权力，而将总是听取比自己“更高明”的人，即党内阅历更深的领导者的意见。

出于对彼此的戒心，斯大林的伙伴们犯了三十年前列宁病危时，他身边的人所犯的同样的错误。那时，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以为，不知名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不会有权力欲，因而极力支持他就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列宁仍然是党的实际领袖，他的政治局委员们也都尽可能地各自把持较有威望的职位。尽管如此，列宁死后不久，秘密警察头子捷尔仁斯基和武装力量首脑伏龙芝紧接着相继去世，使领导核心权力的分配迅速变化，总书记的职务因此而变得极为重要。

1953年时，尽管作为苏联政府首脑，马林科夫的全面影响为他人所不及，但是在各州和加盟共和国等地方一级上，真正有实权的还是党的书记。此时，这一套党的工作系统是跟赫鲁晓夫，而不是跟马林科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斯大林任国家之首时，从来是直接对所有问题做出决策，不把党的机构放在眼里。马林科夫还没有这样的权威。所以在斯大林死后，过去相对来讲不甚重要的党中央委员会，这时作为“工人阶级专政”的真正代表，变得尤为重要了。

赫鲁晓夫所以能当选为第一书记，原因之一，是他享有农业问题专家的声誉。而在1953年，农业是整个经济中最糟、最亟待解决的一个环节。这就使赫鲁晓夫的被提升带有了象征性的意义——它缓和了农村中多年积蓄的不满，甚至是绝望的情绪。赫鲁晓夫出现在党的领导者的行列中，使几乎被恐怖和饥饿轧碎了的农民，有了一线改革的希望。

对书记处的作用估计不足，将使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和卡冈诺维奇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一党制的国家里，只有党代表大会和在两次党代会之间的中央全会，具有实际的权力。但是在斯大林死前的十五年中，只召开过一次党代表大会和有数的几次中央全会。就连只讨论最重大问题的，党内有威望

的最高核心——政治局，也几乎从来没有开过全体会议。所有重大决策，通常都是由斯大林独自做出，或是与一、二个最亲近的同事商定之后，再以中央委员会或以部长会议的名义进行宣布。

赫鲁晓夫作为第一书记没有斯大林那么大的权力，连一些党内问题，都不能独自决断，更不用说国家和国际问题了。因此，他不得不借助中央全会或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的权威来解决问题。定期召开中央全会的制度必须恢复，以便为提高一位新的党的领袖的声望与影响提供适当的场所。

斯大林死后，虽然宣称要实行集体领导的原则，但是俄罗斯民族悠久的传统和苏维埃国家三十五年的历史，都要求一个能够果断地掌管国家事务的杰出领袖人物的擢升。在所谓“集体领导”的最初日子里，敏锐的观察家不难看出，只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或赫鲁晓夫，具有这种领袖人物需要的全部特征。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很快就默然失色了，伏罗希洛夫年事已高。况且，他在德军入侵初期对许多败仗应负的责任尚未被人们忘却。卡冈诺维奇是犹太人，斯大林后期扇动起来的反犹太主义情绪这时还没有完全平息。贝利亚负责的部门尽管权力极大，但却无法为他提供创造得人心的领袖形象所需要的公开露面、讲话和做出经济政治决定的机会。

## 清除贝利亚

赫鲁晓夫回忆录<sup>①</sup>第一卷中，有一些关于贝利亚的“阴

---

<sup>①</sup> 赫鲁晓夫回忆录，1971年里特·布朗出版社出版。

谋”与赫鲁晓夫“反阴谋”的叙述，并谈及了贝利亚被捕和后来被处决的一些情况。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对这些事件的说明矛盾百出，很不准确，也没有具体地、令人信服地解释贝利亚“阴谋”的实质。但是我们从其他来源多少得知了一点贝利亚在国家保安系统内部建立起来的独立王国被摧毁的情况。这个独立王国确实存在过，而且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它是准备夺权的。在领导人之间彼此怀有戒心、互相严密监视的情况下，贝利亚是所有的人都害怕也是最不被信任的一个。只要想想内务部的性质和它的工作手段，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了。

国家安全组织，即秘密警察，从不露面，但每个在政治上有抱负的人首先要想到的却是它。这个不受党控制的恐怖机构，无论其名称如何，或称国家政治署，或称内务人民委员会，或称国家保安部，包揽了从逮捕、侦察、审判、监禁到处决的司法程序的全过程。斯大林曾把这套系统置于他一个人的控制之下。一个地区或州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和保安部的头头，可以逮捕任何党的领导人，包括地区或州的第一书记，以至整个州或地区党委会全体成员。这种情况，在恐怖年代里确实发生过。一个地区的保安系统，往往有一个秘密特务网（即告密者）。他们有些是被雇用的，但更多的是被胁迫而“自愿”工作，不取报酬的。

虽然从理论上讲，国家是由党领导的，但这个强有力的国家安全系统，只听命于斯大林，成了笼罩在每个人头上的阴影。任何党或国家领导人都可能默默无闻地消声匿迹，而报纸上只字不提他们的被捕、审讯或是处决，特别如果是被害者普遍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戴，则命运将更是如此。

1949年的时候，秘密警察机构独立到了这种程度，即在隶

属于党的中央委员会本身的机构中，竟有一个不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而向保安部报告工作的“特殊部门”，保安部有权检查中央委员的办公桌、文件夹和保险柜。在党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站岗的卫兵，也归保安部管理。另外，由于斯大林对贝利亚从未有过完全的信任，所以建立了一支独立的私人警卫队。这支警卫队穿保安部的制服，但不受保安部调遣，而直接由斯大林指挥。只要斯大林有命令，他们可以逮捕任何政府首脑，包括贝利亚本人及其下属。

这支卫队，由不属于保安部的苏联将军尼古拉·伏拉希克领导，通常驻守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寓所的周围，或是在莫斯科郊外，靠近索契的克里米亚。伏拉希克将军对斯大林极其忠诚，他忠心耿耿地亲自给斯大林当了二十多年主要的贴身警卫。尽管如此，1952年，在迫害狂的驱使下，斯大林竟然下令把他也逮捕了。

斯大林一死，贝利亚立刻将这个系统包揽一切的大权抓到自己手里，并为进一步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对之进行了改组。这时，他只任用完全效忠于他的人，其势力范围，甚至扩展到多数东欧国家的保安系统内部。他支持马林科夫出任总理，因为他们已是多年的朋友，对一些大规模的镇压共同负有责任。

为斯大林举行盛大葬礼时，成千上万的苏联人从四面八方拥到莫斯科。贝利亚派了内务部的几个师到城里去维持秩序，其中一些部队驻守在市中心的各办公大楼里，葬礼结束之后，这些师没有被调回原地，对此需要做出解释，贝利亚也确实找到了一个借口。

斯大林死后不久，对判五年以下徒刑的罪犯宣布了一次大赦。这不包括政治犯（他们的刑期一般最短为八年，最长可达二十五年），也不包括危险刑事犯和重新作案的惯犯。而贝利亚

违反大赦令的规定，下令将几个劳改集中营关闭，使成千的普通罪犯和惯犯获释。这些人流窜到莫斯科和其他城市时，犯罪率急剧上升，激起了很大民愤。贝利亚便以此作为托辞：为了维护公共秩序，需要在城里留驻大批由他调遣的内务部的武装力量。

贝利亚要加速他争夺权位的步伐不是没有道理的。对轻罪犯和一些精心挑选的政治犯（见第二章）的释放，给了人们一线希望，要求进一步开释的广泛的社会压力日益增长。内务部、党中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人民来信，要求归还他们的亲人。中央委员会，对这些情况的任何一点调查，以及接下去所要做的处理，对贝利亚都将是致命的打击，所以，他要在斯大林的葬礼之后很久，还把内务部的部队留在莫斯科。

这时，一个针对贝利亚的密谋已经在中央委员会内酝酿形成。赫鲁晓夫和其他许多领导人，甚至包括马林科夫，都意识到了贝利亚掌握全部大权的危险性。为首策划这个密谋的是赫鲁晓夫、军界，尤其G·K·朱可夫将军是他的后盾。

六月底，逮捕贝利亚那天<sup>①</sup>，正规部队取代了他布置在克里姆林宫和党中央大厦的内务部卫兵。贝利亚的支持者，内务部的许多高级官员同时被捕。朱可夫和科涅夫将军指挥的部队包围封锁了莫斯科的内务部中心大楼。几天之内，地区内务部的大部分官员和加盟共和国的内务部长们也纷纷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贝利亚的朋友V·N·麦尔库洛夫（国家管制机构的负责人）和M·D·巴基洛夫（阿塞拜疆州委第一书记、

---

<sup>①</sup> 逮捕发生在六月二十八日，但是直到七月十日才公开报道。



主席团候补成员)①。

贝利亚专案的调查者需要找到他每一段经历的证人，特别是他任外高加索和格鲁吉亚中央委员会书记的那段时期。而实际上，这些见证人中已经没有一个还活着可以讲述当时的情况了。因为在他担任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头头以后，采用各种手段，几乎将所有他在外高加索时的俄罗斯同事，都一一干掉了。后来，不得不到集中营去搜寻，结果只找到两个还活着的证人：在外高加索时曾与贝利亚一起工作过的A·V·斯涅戈夫和在阿塞拜疆时认识他的O·G·莎图诺夫斯基卡娅。他们还在服刑，但是被立即用飞机送到莫斯科去作证（斯涅戈夫在到达莫斯科之前，甚至还没来得及脱去囚衣）。贝利亚被审判之后，斯涅戈夫被恢复了名誉，并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校，在古拉格监狱集中营系统中担任重要职务。后来，他开始编辑有关斯大林的罪行材料，并直接向赫鲁晓夫报告工作。②

对贝利亚的起诉书的全文，只在党内高级干部的秘密会议上宣读过，比后来报纸上发表的所谓“最终起诉书”要全面、详细的多。起诉书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以前不为人所知的魔鬼的存在——有关镇压和恐怖活动的大量材料反映出来的情况，是赫鲁晓夫和其他党的高级干部都难以想像的。如我们后来所知，内务部和古拉格集中营系统始终与党的组织保持着相当的

---

① 据一些目击者叙述，几乎所有在内务部中心机构——捷尔仁斯基广场大楼工作的官员，都是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被捕的。贝利亚的几个最重要、也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左右手，被就地枪决，尸体运到城外掩埋了。

② 斯涅戈夫在赫鲁晓夫下台后退休了，但还在作为历史学家，继续收集针对斯大林的材料并发表了许多演说。1967年，70岁的退休金领取者斯涅戈夫，被加之以进行反党活动的罪名再次开除出党。他为罗伊·A·麦德维杰夫所著的有关斯大林主义历史的《让历史来审判》一书（1971年纽约科诺福特出版社出版）提供了许多说明问题的、有趣的资料。

距离，党的干部确实从来无意，甚至根本没有想到过，要去干预左拉格独立王国的活动。只是在决定了要对贝利亚的罪行及其使用的手段进行调查之后，党的领导人和赫鲁晓夫才了解到内务人民委员会及国家保安部等机构，践踏法律和人权的许多细节情况。

对贝利亚来说，1953年事态发展之神速令人沮丧。三月初斯大林去世，六月底他被逮捕。没到年底，就已经进行审判并被处决了。

## 第二章 斯大林时代的 受害者

斯大林执政的年代，是以或有间断的清洗、屠杀、阴谋与反阴谋为标志的。它不仅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而且将成千万的人投入监狱、流放和劳改之中。臭名昭著的监狱、集中营系统，这里就不赘述了。斯大林去世之际，数百万他一手制造的冤案的受害者（如医生阴谋案）仍在集中营里遭受苦难。这就使新政权面临一个极待解决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不但要给这些无辜的人恢复自由，还要恢复他们的尊严、地位、职务，以及过去的生活待遇。也就是说，要全面昭雪。

在我们讨论苏联的政治犯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牢牢记住“昭雪”这个特别重要的概念，因为其含义非常深远，决不仅仅是“改正错误”的问题。昭雪即意味着无辜。既然被昭雪的人是无罪的，那么对于把他们投入集中营要负责任的人来说，就有滥用司法职权之罪。因此，中央主席团委员们便不能挥动魔棒，慷慨地为所有的政治犯平反昭雪。否则，当重新调查一

些案情的时候，质疑的探照灯光就会转移到他们自己身上。

“死后昭雪”的重要性决不能轻视。对于已经死去的受害者，这将意味着些什么呢？

在斯大林时期，被宣布犯罪的人的全家往往被从原来的住室里赶出来（如果他们的住房条件为人所向往，则更是如此）。而且这些家庭的成员通常不得进入首府城市。他们从学校毕业后不能在军事或外交部门工作，也不能担任领导职务（找任何工作都需要填表说明是否有亲属被逮捕）。过去被判罪的人平反之后，即使本人已经死掉，其家属也可以再搬回原来的城市（如莫斯科或列宁格勒），并且可以优先得到一套住房。亲属们再不会因为“有被捕的社会关系”而受污辱或歧视。对已经在集中营里死去的人的遗孀，还发给专门的养老金。

如前所述，斯大林死后，贝利亚以对轻罪犯的有限释放为借口，在莫斯科保留了他自己的武装力量。同时，他突然出人意料地下令将受“医生阴谋案”牵连的医生，和在1952年因较不为人所知的米格列兰案件而被捕的一些格鲁吉亚领导人予以释放和平反昭雪。他这样做，绝对不是出于仁慈，或是笼络人心。真实的原因是，医生案和米格列兰事件都不是他的主意，而是国家保安部单独策划的。斯大林想借此指责国家保安部丧失警惕，没有发觉这些坏人，是失职。从而将贝利亚调离恐怖系统的中心控制机构。因此，斯大林死后，贝利亚借宣布医生案和米格列兰事件纯系捏造之机，而将参与迫害的人迅速赶下了台。

贝利亚的声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热烈欢呼，把这视为对所有政治犯大规模平反的开始。

而贝利亚却谨慎小心地行事。他精心选择了几个与政府高级官员有关的人予以昭雪。如莫洛托夫的夫人，被从集中营直

接送到莫斯科，贝利亚本人、她的丈夫莫洛托夫都一起前去迎接。伪造的“医生阴谋案”被揭露之后，贝利亚又宣布将国家保安部前官员阿巴左莫夫和他自己的几个好朋友予以释放、平反，并在新成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委以要职。贝利亚当然丝毫无意进一步扩大释放和平反的范围，因为紧接着“医生谋杀案”之后的最后一个重大的恐怖行动——所谓“列宁格勒案件”是他和马林科夫都积极参与了的。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谈到。

由于受到这一系列“平反昭雪”所揭示的内幕情况的震动，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国家保安机关违法乱纪的决议”。这一决议是直接针对贝利亚的，因为国家保安部对法律的违背，决不只限于“医生谋杀案”。对有特殊关系的人物的平反，使中央委员会进而考虑到历次恐怖和清洗运动中受害者——那些至今仍被置于脑后的成百万无辜的人们。

法院里堆放了几百万份上诉，要求对仍被关在监狱和集中营里的人的案子重新进行复查、或亲属要求为死者平反，恢复名誉。国家司法机关再也不能对这些要求盖上“拒绝重新审理”的印章而置之不理了。因为在几乎整个国家保安部门的核心受到谴责、批判的时候，自然对被这个机构所处理的，包括逮捕、判刑的所有案件都要打上问号。国家检察机关和司法系统根本没有能力对如此众多的案件重新审理，政府也不可能简单地宣布政治大赦。因此，需要制订一个大赦的标准以及限度、范围，说明何种情况可予考虑，何种情况不在此例。

赫鲁晓夫主张，绝不能为在“公审”时被“公开定罪”的斯大林的激烈反对者，如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季可夫和布哈林等人平反，就像不能给让人不得安宁的魔鬼列夫、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一样。他认为，斯大林在这些案子中清除了对尚处

在幼年时期的共产党国家进行破坏的“极左”和“极右”分子是正确的。而且在他看来，对农民残酷地搞集体化，以及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镇压，也都是必要和正当的。这些压制，以及更加毋庸置疑的国内战争时期契卡的“光荣传统”都被看作是任何革命中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的表现。

但是1937年至1939年以及后来，成千上万杰出的党的领导者、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被逮捕。他们当中不曾有人是“持不同政见者”或参加过什么“反对派”，他们一贯忠实于“党的总路线”，一贯忠于列宁和斯大林，并且都曾有过光辉的革命、政界或军事生涯。然而，没有任何“公开”审判，他们悄然地、默默无闻地消声匿迹了。被投入监狱集中营的，除了州委书记、人民委员、外交官和一些党内著名人士外，还有成千上万没有什么名气、但都是“纯洁”的党的干部，如区委书记、工厂厂长、集体农庄主席等，以及普通的公民。党员、非党员、科学家、学者、工人、农民，均未能幸免，不论赫鲁晓夫本人或是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同事，都不清楚这种镇压的实际规模到底有多大。但是，很显然，必须正视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和中央委员会都承认，镇压活动窒息了他们自己这一代党、政干部——三十年代末及四十年代的优秀分子。但他们又不肯轻易地动摇自己绝非通过民主的方式所取得的个人权力的基础。应该记住，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和主席团的其他要人，都直接参与过对别人的镇压。再低一级的许多党的干部，之所以能晋升到目前的领导岗位，恰恰是由于他们取代了被逮捕和被处决的那些人。

尽管赫鲁晓夫本人1937年在乌克兰工作时，也未能超脱使用恐怖手段，但比起他在主席团的对手们来，尤其是卡冈诺维

奇、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赫鲁晓夫还算是远离恐怖机构中心的。他从来不曾是任何主要清洗运动的发起者，而马林科夫则和贝利亚一样，与列宁格勒案件有着密切的关联。

1949年至1951年曾经毁灭了数千党政干部的政治与个人生命的列宁格勒案件，从来没有在苏联报刊上公开提及过。被逮捕的人无声无息地便消失了，对接替他们空缺的人，也没加以任何解释。所以无从得知共有多少重要的职位因此而被空出。

根据很久以后公布的官方消息，在列宁格勒案件中议定的主要受害者，是当时地位仅次于斯大林的尼古拉·沃兹涅辛斯基。他是政治局中最年轻而又最富学历的成员，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计划委员会主任。他在政府中的地位高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和伏罗希洛夫。由于具有敏捷的、无懈可击的逻辑思维和经济方面的一技之长等特点，使他被认为是第二梯队中最有可能接替斯大林的人物。这自然引起斯大林的猜忌和怨恨。据传，斯大林尤其嫉妒他作为一个作家所取得的成就。沃兹涅辛斯基1947年发表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战时经济》一书，很受欢迎。其中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许多方面的理论分析，已开始和“斯大林著作”一并被推崇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材。尽管沃兹涅辛斯基的这本书可能是促使斯大林最终决定清除他的一个原因，但更大的可能是，他的名望日益增长，使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和其他一些人都起了嫉恨之心。

1949年初，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沃兹涅辛斯基被解除了一切职务，这时，还找不到任何理由将他逮捕，如果只是简单地宣布他是“人民的敌人”显然是不能使人信服的。

贝利亚便首先暗示，沃兹涅辛斯基与计划委员会“丢失了”一些秘密文件有瓜葛。接着，逮捕了几个计划委员会的高级官

员，以取得必要的口供。但是那些“招供”了的官员，也不能证明他是同谋。所以沃兹涅辛斯基没有被逮捕，而那些坦白交待的人，却被判刑送进了集中营。无论如何，总归是需要一些遮人耳目的“案情”，于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就编造了一个。

据列宁格勒案件的指控，俄罗斯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一些部长级官员，阴谋在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之外，建立一个独立的俄罗斯共产党，并将列宁格勒定为俄罗斯共和国的首都，莫斯科则作为苏联的首都。这一“大俄罗斯自治”的阴谋，被说成是“破坏分子”企图削弱中央政府、破坏党的中央委员会，进而攻击作为党和政府首脑的斯大林同志。

从上到下，成千的党政人员被逮捕，其中自然有尼古拉·沃兹涅辛斯基，还有他的弟弟，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教育部长A·A·沃兹涅辛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被废除了的死刑，又特为列宁格勒案件在刑法中予以恢复。被告中最重要的人物均被枪决。<sup>①</sup>其余的人关进了劳动集中营，一直关到1953年。显然，所有这些被指控的人都应该予以平反。

对一个案件的复审，要是遵循基本的正规司法程序，如传见证人、反证人，提出新的证据，推翻原告，等等。这样，一个案子的复审就要几个月的时间，而有几百万个案子需要重新审理。对于焦急等待着的家属和亲友来说，这个令人痛苦的过程太缓慢了。据估计，在斯大林时代被关进集中营的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三百万人中，到1953年只有四千人得到释放。但即使是这从古拉格群岛中溢出的涓涓细流，也将对今后的事态发生巨大的影响。与有威望的政界人物有关系的人继续被给以优先考

---

① 这里所说的枪决并非“由刑警队执行”。在苏联，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后，是由一个执行者与犯人在监狱的某一特殊区域走着的时候，从背后将子弹射入其头颅。



虑而获释。赫鲁晓夫亲自过问了他在乌克兰工作时期和战争时期的一些老同事、老朋友的释放问题。1954年至1955年，被释放的人数增至一万二千人，这是非常特殊的一万二千人。其中大多数曾在党和政府内担任过要职，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因此他们积极地返回政治生活。使党内较高领导阶层的组成和气氛有了改变。

继续推迟人们所期待的大规模的平反，已为日益增长的公众舆论所不容。鉴于原有的司法机构对迅速复查所有案情无能为力，于是设立了临时司法委员会。这些委员会被授权在关押囚犯的场所就地进行平反工作。关于被平反释放的人数，从来没有发表过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据最接近的计算估计，1956年至1957年，约有七——八百万人被释放回家，另有五——六百万人得到死后的平反昭雪。这一事实，像我们已经说明过的，对幸存的家庭成员有着重要的意义。

成百万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的大规模平反给每一个有头脑的苏联人的心理上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平反获释归来的囚犯，在安置上有很多优待：平反了的工人，尽管他们在监狱中渡过了多年，也要安排适合其才力和技能的工作，战争时期的受害者，即战俘和被强行押送到德国去的人，不经平反而全部予以特赦。早在1937年至1938年被捕的那些人中，只有百分之四——五到1956年时还活着，而且多数已经年老体弱，不能工作。在集中营里被处决或死掉的军人，由国防部长朱可夫发布特殊命令，追认为烈士，与在 frontline 牺牲的烈士同等看待，并发给家属抚恤金和特别终身养老金。尽管还有数千人未被释放，如在战争中被俘，后来又曾为德国军队服务的苏联士兵，和乌克兰、波罗的海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分子等，但总的来说，古拉格体系已在瓦解。

1955年，当苏联与西德关系“正常化”时，几千名仍在苏联拘留营中的德军战俘被释放，同时，对被指控与德国占领军进行过各种勾结的苏联公民实行了大赦。他们一般只是被迫曾在德国本土或德军占领区工作过。

赫鲁晓夫在释放政治犯运动中所起的主要作用，使他越来越得人心，但这一时期，也发生过两起企图暗算他的事件。<sup>①</sup> 这些事件。苏联报纸上从未报道过。第一次图谋发生在他去白俄罗斯的旅途中。第二次，也是更严重的一次是1956年他乘坐“红色乌克兰号”游艇参观时发生的。当时这只属于黑海舰队的游艇正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港，在赫鲁晓夫结束了他的视察访问、刚刚离开几分钟之后，游艇就爆炸了。这些预谋，显然与赫鲁晓夫坚持不懈地主张大规模地为政治犯昭雪一事有密切联系，而且看来是由那些在斯大林时代参与过镇压的人组织策划的。其动机，也许可以做如下解释：

许多从监狱和集中营被释放出来的人，不会满足于温顺，感恩地回到家里就善罢甘休，他们还要寻求某种形式的报复，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使他们遭受痛苦，即编造假证据、进行审问、刑讯以及恶毒地参与执行判决的那些人，要么要进行纯粹道义上的谴责，要么要采取正式的法律行动。当然，参与过这些行动的人，为数不少，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仍然处在重要岗位上。中央委员会和总检察长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上访信件，要求追究至今仍在政府机关身居高位的要人的共谋责任问题。地下刊物泄露了一些这样的指控、并附有详细的证据，使人看了不禁感到震动、惊恐、内疚和愤怒。

---

<sup>①</sup> 图谋暗杀的情况曾在1972年由阿姆斯特丹赫尔岭基金会出版社出版的1964—1970年《政治日记》第3集第15页上做过描述。

例如，人们获悉，当时仍任高等教育部长的V·斯托列托夫对萨拉托夫地区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被捕与被清洗负有直接责任；政治局委员、哲学研究所所长M·B米丁和苏联驻中国大使P·F·尤金(二人均为科学院院士)，造成了1936至1938年期间许多知名学者的被捕与被清洗；科学院院士T·D·李森科，也与许多著名遗传学家的被捕有关。作家协会主席A·法捷耶夫，对一些著名作家的被捕负有直接责任。这个名单，可以继续开列的很长很长。

当然，要对这些指控进行调查，尽管时间可能会拖的很长，但是再也不会有人“突然失踪”了，时而有些较小的人物被降了级或是作了自我批评（如苏联高教部长斯托列托夫，被降为俄罗斯共和国的高教部长，作协主席法捷耶夫自杀了），但总的来说，若不对党和政府的领导进行彻底改组，就无法解决问题。赫鲁晓夫本人和他的相当数量的一些同事，也并非完全无可指责。一度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头头的I·A谢洛夫，在1958年出人意料地被撤职了。他一直被人视为赫鲁晓夫的私人朋友，而且在我们将于第七章中叙述的“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阴谋”中，曾给予赫鲁晓夫极大的支持。斯托列托夫战后曾在东欧“被解放国”和德国指挥过一系列行动计划。被撤职后，他的住所和乡间别墅都受到了搜查，他从德国及其他地方非法占有的大量珍宝和艺术品，都被没收了。但是除此之外，谢洛夫并未被逮捕，只是被告知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他仍然和家人住在一起，而且显然还拿着将军的退休金。

然而，数以百万幸存下来，并且已经回到日常生活的潮流中，但仍然不能忘记集中营生活的那些人，和成百万尽管其父兄或丈夫已被昭雪的人，成了苏联社会中动乱的主要酵素。他

们开始要求强有力的法律制度的绝对保证，使镇压和恐怖行动不至重演。正是这些人当中的活跃分子，要求更全面地谴责斯大林时期的罪行，要求公布历史文件，审阅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国家保安部的档案以及进行其他激进的变革。而这些无论赫鲁晓夫本人或他的同伙都无法接受。

### 第三章 农业改革

为了更好地理解赫鲁晓夫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赢得人心，以及他是怎样通过重大的农业改革加强了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就必须了解苏联当时的农业状况和纷繁复杂的苏联农业政策。

1929年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时，产生了三种类型的生产和管理单位，即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机械——拖拉机站。国营农场是在过去的贵族地主的大片庄园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政府掌握。一般位于人烟稀少的地区。1929年，其面积仅占农用土地的5%弱，因此，就全国范围来说，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集体农庄按其章程的规定，是农民“自愿”结合的合作组织，直接对党负责，由选举产生的管理委员会实施领导。重大问题由管理委员会根据农庄庄员大会的意见，而不是党政干部的指示做出决定。

国营农场是国家所有的，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全部农业机械，独立进行农业生产。集体农庄则只能从国家买到最简单的

设备，其中主要是手工劳动工具和粗糙的马拉犁。

为了帮助集体农庄，政府建立了拥有较多的复杂设备的所谓“机械——拖拉机站”，通过专门的合同，以收取生产实物作为交换条件，为集体农庄服务。一个拖拉机站往往为几个农庄服务，承包各种类型的农活。1929年至1932年期间，农业机械设备还不多的时候，大部分农活儿仍然主要靠马和人力，拖拉机站对粮食生产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后来，它的作用不断扩大，到1953年，拖拉机站已经承担了集体农庄的耕地、播种、施肥。用联合收割机进行一部分收割，以及收晒干草等大部分基本农活。尤其是需要拖拉机、康拜因、脱粒机、耙地机等现代化机械的农活儿，都是由机械——拖拉机站的工人或司机完成的。集体农庄没有技术设施、修配厂和受过训练的能够使用这些机械的人员，所以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合作方式。拖拉机站的数目不断地稳步地增加。1928年，只有六个拖拉机站，1932年增加到2,446个，1940年为7,069个。战后又增加了2,000多个。

合作化的目的之一，是要保证可靠的粮食供应。斯大林采用集体农庄制度、起草第一个“样板集体农庄”章程时，是希望集体农庄能够生产出规定数量的粮食，供政府购买后，在农村以外的城市及工业区的零售商店里出售，国家的收购，当然是在同样归国家所有的拖拉机站耕作的土地上，扣除了农民所得的实物分配之后进行的。国家起初并非要征收，而只是购买农产品，当然支付的价格要由政府确定。政府还规定所要购买的数量指标，不论农庄的实际收成是否受到恶劣气候的影响，从理论上讲，一个集体农庄在完成了收购任务之后，应该还有归集体农庄所有的剩余，这些剩余，或者按每个庄员投入的“工作日”分配给农庄庄员，或者留作种子，或者在城市市场及专

门商店里出售，而集体农庄可以从这种销售中盈利。

但是实际上，对使用拖拉机、康拜因和其他机械收取的实物数量很大，而政府付给集体农庄的价格却很低。收购价格时常低到不足以偿付生产这些作物所消耗费用的一点零头。

只有土地良好、又有精明的头头管理的集体农庄，才能在这种制度中生存下去。使这种局面更不平衡的是，某一特定的州或地区的领导，都要保证至少有一个“样板”农庄，它可以得到本来分配给全州、地区的大部分肥料和机械，因此收成特别好，可以得到奖状、奖金和各种奖励。而大多数集体农庄不仅毫无剩余，还年复一年地累积下债务。如果第一年因为收成不好等原因没有完成规定的征购指标，则下一年必须补足亏空。歉年时，农庄常常不得不把存留的部分种子上缴国家，到春天再向邻近的农庄或政府要求救济，才能进行播种。畜牧农庄以同样低廉的价格向国家交售牛奶和肉类，所以畜牧农庄同样没有经济方面的刺激来促使畜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规定的指标还不断向上调整，而这种调整所依据的不是实际的收获情况，而是基于“推论设计”的产量。

斯大林的逻辑简单而且蛮横。他认为，如果集体农庄事先就知道政府征收的数量将是很大的，就会加倍努力地干活儿，取得最好的收成，以便在政府征收后，还能留下一些自己的口粮，但不幸的是，大自然有其本身的规律，没有肥料，就不能保证使产量连年持续增长。由于实际上几乎没有肥料，苏联平均的单位面积产量从1913年至1953年就没有什么提高，其产量仅仅是欧洲其他国家平均产量的三分之一。

集体农庄章程规定，每户家庭可以有一小块供自己使用的“自留地”。这块地，是要以在集体农庄做的工作日来交换的（未完成每年规定的工作日的人家，自留地将被没收）。一家还

被允许养一头奶牛、有数的几头猪或几只羊，一些鸡或其他家禽。自留地的面积，不能超过四分之一公顷（半英亩）。

自留地并不算农民的私有财产，但却要用钱或实物缴税。如果一个农户养了鸡，就要缴给国家一定数量的鸡蛋作为税收；如果养了牛或猪，就要缴牛奶或肉；如果种的是菜园或果园，则要缴蔬菜或水果，到1940年时，政府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征购的全部农产品中，有37.2%的肉类，34%的牛奶、黄油和93%的鸡蛋是来自农民的自留地。<sup>①</sup>

四分之一公顷的土地显然就不可能养活一家人以及牲畜的。尽管如此，战争当中和战后，正是这一小块自留地，成了每个农民家庭粮食和日常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从很远的草场、树林或农庄废弃的荒地上割草来喂牲口，这样就可以把很小的自留地留下来种水果和蔬菜。并且他们努力通过连续耕作和改良土壤来提高产量。战争期间，城市中十分缺乏蔬菜和水果，在自由市场上出售的自行定价，而且往往价格很高的集体农庄自留地上的产品，成了城市供应的重要来源。

由于“家庭”自留地只能分配给在集体农庄劳动的人，因此这种“特权”实际上是强迫农民在集体农庄的土地耕作，而且几乎是一无所获地提供劳动力。把在公共土地上提供廉价劳动，作为取得自留地的前提条件，这实际上是以特定的束缚条件维持的一种半农奴状态。即没有集体农庄领导和苏维埃政府的批准，农庄庄员不得转入城市，甚至不能转入另一地区。<sup>②</sup>

---

① 苏联《农业经济》杂志1964年第九期第17页。

② 在城市与城镇居住或工作的公民，需持有证明其身份并在警察局注册的一种内部护照。法律禁止雇用无此护照的人。农民没有这种护照，只有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发的身份证。这种身份证使他们不能在任何其他地方找工作。



从理论上来说，集体农庄是一个独立的农业生产组织，其中国家的利益主要由党的系统来加以保证。集体农庄的重要会议，一般由地区党委会的书记或政治指导员来主持。党的委员会在农业地区比在城市或工业区有更大的权威，因为城市和工业区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还有一定的作用。如果某一小工厂经营不善，就要责怪地方苏维埃；而如果某一大工业企业不能令人满意的话，则要追究部或其他单位的责任。但是如果农场或农庄出了问题，受批评的总是地委或州委书记。农业人民委员会只起顾问、参谋作用。

合作化运动使农业生产在1930年到1933年期间急剧下降。同时，俄罗斯和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南部地区发生了饥荒，几百万人被饿死。从1933年起，农业生产有所改善，使迅速扩展的城市得到较好的供应。并且开始出口一些粮食，其主要对象是德国。

农民与政府之间的这种半封建式的关系，使战前和战争当中，国家对粮食的需求都得到了保证。尽管这期间成百万的农民应征入伍，而且在战争中损失二千万人口中，有一千五百万人是农村人口，除了战争中死亡的人之外，还有一千多万人残废。1941至1945年的战争无疑造成了巨大的直接与间接的破坏，尤其在德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内更是这样。1945年，全国农业生产的水平只相当1940年的60%。<sup>①</sup>

战后，政府没有把注意力转向农业，而是集中精力重建城市和恢复工业。过去的农民，尤其是那些刚从军队复员退伍的年轻人，没有匆忙地回到半农奴制式的集体农庄，他们到工厂做工去了。但与此同时，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以供养城市

---

<sup>①</sup> 见1965年莫斯科版中央统计局资料《1964年的苏联国民经济》第246页。

人口的需求却增加了。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停止了对苏联的粮食供应。而那时，苏联除了要供给自身的需要之外，还承担了向几个东欧国家提供粮食的义务。

1945年到1953年，农业生产的发展非常缓慢，1953年只达到1940年水平的104%，而城市人口却比1940年大大增加。对捷克、东德、甚至中国的粮食出口也更多了。面对为非农业人口提供食品的巨大困难，国家几乎征收了集体农庄生产的全部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使农民所剩无几。他们以微薄的收入被迫为集体农庄干活儿，如果他们从自己耕种的土地上拿走一袋土豆或小麦，即可被逮捕并送到劳改营去，时间可长达十年之久。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对自留地征收的现金和实物税收，也增加了。

1946年以后，自留地的农业税增长迅速以致农民的精耕细作不再有利可图。由于对不缴税者采取了强行罚款并判刑的措施，又由于税收不是根据土地面积的大小，而是按产量计算的，所以农民不但不再努力生产，反而开始销毁其产品，先是为了逃避交钱或交水果而砍掉了果树，接着又将自己喂养的猪、牛、鸡杀掉。由于对土豆征税的指标还比较合理，土豆便成了自留地上的主要作物。

支持这种没收政策的理论是：如果农民不能靠自留地养家糊口，他们就会更卖力地为集体农庄干活，以后农庄土地的收成比自留地好些。而这样干所得到的唯一结果是，凡有可能人们就干脆彻底地离开农村。

尽管半封建的制度用不予签发内部通行证的法令，强行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但是他们总有办法逃脱集体农庄的生活，年轻人常常根本就不加入集体农庄。与以往不同的是，出生在农村的孩子不一定必然注册为农庄庄员。这时，这些孩子们已

经长大成人，占了农村人口的多数，在农奴时代，主人不仅拥有农民，还拥有他们的孩子，而集体农庄只能占有最初登记参加农庄的那些人。苏联一直实行义务兵役制，服役之后，青年们就不愿再回农庄了，女孩子们则可以有机会到城里去上大学、结婚、或者自愿到特别边远的艰苦地区去工作。

农村没有新生力量来充实，农业就难以维持。再有二、三年时间，就可能发生灾难性的粮食生产危机和全国性的饥荒。斯大林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最接近他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真正看到了这种危险，这个人就是赫鲁晓夫。

斯大林自己对农业一窍不通，还对农民怀有一种特别的憎恶与不信任。他从来没有参观视察过任何一个集体农庄。

其他政府官员，如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等，比斯大林懂得更少。十月革命前，斯大林到底还在西伯利亚的一个村庄被流放了三年，而且自己种过一个小菜园。

1948年以后，斯大林的主要农业顾问是T·D·李森科。他极力鼓吹通过环境条件来改变动植物的本性，使之适应土壤气候的荒谬论点。在李森科的影响下，产生了“斯大林改造自然的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在南部地区建立一条宽阔的森林带，抵御来自东面的干冷的风沙。斯大林还提出，要“改变农作物本性”，将南方的作物移植到北方去生长。为此建造了大批温室，种植柑桔、柠檬、橄榄，甚至可可树。结果很不成功，农业区倒是因此得到了一些资金和其他援助，但是只提供给有上述荒谬的和二、三十年之后才会使环境发生一些变化的项目的地区（如建立森林带）。

赫鲁晓夫出身于农民家庭，他是斯大林的政治居成员中唯一经常去农村视察的人，他常与农庄主席交谈，努力了解他们的困难。看到中小农庄毫无出路的处境，赫鲁晓夫在1949年就

提出过一个相当大胆的结合或合并集体农庄的计划，而且一年之内就在全国范围推广开来。

1929至1930年的合作化运动，是将几个村子的农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集体农庄的方式来实现的，这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搞合作化的方法，因为那时还不具备由较少的人在大片土地上耕作所必需的农业机械，这种高度耗费人力的农业劳动，使小村庄只能耕作小片土地。这样，大、中、小型的村庄，分别组成了大、中、小型的集体农庄。南方的村子面积较大，有时一个村子可以成立几个农庄。

1948年至1949年期间，中小型集体农庄由于国家对农民的过份盘剥逐渐在崩溃。大农庄一般经营较好，又可以以机械——拖拉机站得到较多的帮助，并从地区有关部门得到较多的信贷与指导，针对这种情况，赫鲁晓夫提出一个方案，将小农庄合并，或者将一个小农庄附属于同一地区邻近的大农庄，以改善这些集体农庄的状况。

在经营较好的大农庄里，农民的生活要富裕的多，他们常常对不得不与欠了政府大量债务的穷邻居分享自己的财富而牢骚满腹。但合并是强迫实行的，很快所有的小农庄都被卷了进去。全国集体农庄的总数减少了三分之二。这种重新组合，使许多只有少许身强力壮的庄员，都要耕种200到400公顷土地的小农庄，幸免于崩溃；并使地区和州的党委会更容易实行对农庄的领导，更容易挑选精明强干的农庄主席，也使一个地区内的集体农庄与机械——拖拉机站的关系得到了改善。

赫鲁晓夫还提出，在每一个“合并”了的集体农庄里（通常包括五至八个自然村、几千公顷土地），建立“农庄镇”这样一个中心区。这个建议在党内广泛讨论之后，被政治局认为不可行。理由是，既没有适当的办法，也没有建筑材料来建设这

样的“农庄镇”。

合并的措施暂时遏止了由于对小农庄毁灭性的剥削而引起的危机。但是联合本身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农民的生活还在继续恶化。过去是有的村子生活好些，有的差些，有的则到了困苦不堪的境地。合并之后的二、三年里，由于不得不与运气不佳的邻居平分财富，生活水平的下降开始波及到过去曾经是比较富裕的村庄。远超出联合的目标之外，赫鲁晓夫还打算提出一系列专门旨在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改革措施，而一旦权力在握，他就要去这样做的。

由于赫鲁晓夫首先动议合并集体农庄，加上他成功地反对了李森科试图在乌克兰和南部地区用春小麦代替高产的冬小麦（见第五章）计划，使赫鲁晓夫赢得了农业内行的声誉。这对他晋升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起了一种不能低估的作用。

担任第一书记之后，赫鲁晓夫很快提出了大幅度削减自留地物产税和取消对某些财产（如果树、奶牛等）的实物税，代之以一户家庭为单位的按家庭人口比例计算来收取现金的作法。而且政府将以相当高的价格购买农民的剩余产品。这个提案，很快为1953年夏天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成为法令加以实施。结果，迅速解除了农村困难的经济境况，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二十五年来第一次感到，国家对他们越来越甚的压榨，总算有了个头，而且多少开始解除了。

赫鲁晓夫在1953年9月召开的一次关于农业问题的中央特别会议上提出，对自留地的征税要进一步削减。对没有喂养自留畜的农民家庭应提供一定的福利，对住在农村、小城镇和城市郊区的体力与脑力劳动者喂养奶牛、鸡、鸭和猪，或种植小片菜地、果园均不征税，并应给予鼓励，赫鲁晓夫在全会上说：“我们必须摒弃体力或脑力劳动者喂养自留畜是一种耻辱的偏

见”。<sup>①</sup>他的意见，被中央委员会采纳通过，自留地的税收再度下降，对猪、牛等自留畜则完全免除了税收。

赫鲁晓夫这项改革，尽管只涉及自留地这一占全部耕地面积不到2%的小小的方面，却迅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果。奶牛等自留畜的数目大大增加，1953年时，2000万农户中，有四分之一的家庭不养奶牛。到了1959年，几乎每家农户都养了奶牛。住在小城镇和城市郊区的体力、脑力劳动者喂养的奶牛，也达到350万头。<sup>②</sup>几年内，羊的头数增长了一倍，猪和家禽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果园又兴旺起来。城市市场上私人出售的农产品价格，从1954年起开始下降，农村的紧张形势得到缓和，潜伏的粮食危机没有爆发。

尽管是很小的一个方向，但这是一种使私人生产受益的所谓农业“新经济政策”。它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化。即国家不再直接干预一个地区的人民生活，允许他们自己决定怎样使用实际上多少是租借来的那四分之一公顷土地。希望得到一小片菜地或果园的要求，很快超出了小镇和城郊工人的范围。大城市的机关被允许在乡村的路边、树林及铁路沿线寻找荒地，作为菜地或果园分给其工作人员，一般为1000平方米。这就是所谓工人集体园地的开端，工人们可以在业余时间和工休日来这里劳动。

自留地问题的解决还不太困难，因为这不需很多财力和组织工作。尽管农民如牛负重的状况有了改善，但是赫鲁晓夫毕竟不能单凭这一点而使整个农业改观。最重要的，是要增加粮食的供应（这些粮食不是在自留地上生产的），要提高某些

---

① 见1953年莫斯科国家政治出版社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的发言《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第28页。

② 1962年莫斯科版中央统计局材料《1961年的国民经济》，第382—383页。

专门作物的产量，以增加牲畜饲料，还要解决与工业有关的一些问题，否则工业就得不到发展。

因此，1953年9月关于农业问题的中央特别会议，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改革措施，国家将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农副产品，支付比过去高得多的报酬。会议还通过决议，尤其要大幅度提高下列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肉与家禽提高55%，牛奶和黄油200%，蔬菜40%。其他“剩余产品”的收购价格，也都有所提高。同时国家还一笔勾销了集体农庄拖欠的老帐。

改革措施还包括，有计划地增加化肥和农业机械的生产；为建立奶牛场发放贷款，以及为机械——拖拉机站的工人提高工资等等，其他这些措施的效果，要几年之后才能看到，而收购价格的提高是立即见效的。照这个新的作法，集体农庄可以从国家那里得到相当一笔资金用来支付给农庄庄员。集体农庄与其成员之间半封建性质的关系大大改变了。

会议同时决定，要使集体农庄在政治上更加活跃起来。为此动员了二、三万名有经验的党员干部去担任农庄主席、工作队队长、会计和党的工作者。其中不少人受过农业方面的专门教育。这些人在头二、三年里由政府付给较高的工资。

这些改革，无疑对农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粮食产量，1953年时是8,000万吨，1958年增长到13,600万吨，其中6,000万吨是缴给或卖给国家的，几乎相当于1953年的二倍。<sup>①</sup>单位面积产量，从平均每公顷7公担，提高到11公担（1公担相当于100公斤或220磅）。全国肉类产量，从约600万吨提高到800万吨，增长了32%，牛奶产量增长了61%，鸡蛋44%，羊毛36%，甜菜的产量提高二倍多。

---

① 见1959年莫斯科版中央统计局材料《1958年的苏联国民经济》，第350页。

国家支付给集体农庄的食品和现金总额，共计1,340亿卢布。按照现在的兑换率，相当于每户农民家庭每年收入600美元。<sup>①</sup>这个数字看起来不算什么，但是要知道，1953年时，每户农民从集体农庄的所得，只相当于150美元。加上自留地收入的增加，一个苏联农民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几乎已经相当于一个低水平的工业工人。一场农业危机似乎已经避免。赫鲁晓夫这一毋庸置疑的重要成就，加强了她的政治地位和影响。

---

<sup>①</sup> 见1959年莫斯科版中央统计局材料《1958年的苏联国民经济》，第367页。



## 第四章 西方的挑战

赫鲁晓夫雄心勃勃，对未来想入非非，他梦想着使苏联在工业、科学、艺术诸方面，都走在世界的前列。他之所以全神贯注地致力于农业，正是由于他知道，使国家从缓慢的，周期性的农业危机中解脱出来，是在经济上，政治上取得进展的关键。没有充足的粮食及农业原料的供应，轻工业、重工业都将不可能得到发展。

在斯大林时期，巨大的技术工程，诸如挖运河、修水坝、在北方和远东地区修建新兴城市，建设工厂、矿山，以至盖莫斯科大学的大楼，都是使用所谓的罪犯进行奴隶般的劳动而建造的。几乎占15%的最重要的科研项目和不下于50%的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是由政治犯在国家保安部和人民内务委员会的特殊机构里进行的。这些政治犯在以往的社会生活中，曾经是著名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六年里，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上，也曾有数以百万计的德国战俘

在劳动。

将劳动改造制度改变为一种正常的工业和科学方面的就业，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办到的，然而1953年以后，这个改造过程总还是开始了。

如果正常的工业生产和科学研究取代苦役般的劳动，就需要盖房子，需要给正规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象样的工资，还要保证提供足够的食品、衣物和娱乐设施。而且人们所要求的生活标准，也不再是俄国1913年式的，而是更接近现代西方的水平。

为实现这个目标，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是改善农业的状况和为政治犯恢复名誉。下一步，就是要确保往昔曾是不可一世的进行恐怖与镇压活动的秘密警察制度永远不再重演。

## 对国家保安部的改组

贝利亚的下台，涉及的不是他一个人。他的左右手，保安系统中级机构的要员和地方保安机关的头目都随之倒了台。但是，对贝利亚权力系统中的一般人员，没有采取什么严厉的措施进行惩罚。一些老的保安部工作人员，领取养老金后退休了。较年轻的则分配到专门的工业和科技部门去搞人事、保卫工作。

从旧日的独立王国——国家保安部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废墟中，产生了克格勃——名义上隶属于部长会议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当时的政府委员会分为二类：部长会议所属的委员会和名义上隶属于部长会议的委员会。所谓名义上的隶属，意味着它介乎于多个机构之间，即实际上并不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而隶属于党中央委员会。<sup>①</sup>

共青团的头目A·N·谢列平很快被任命为克格勃首脑。在他富有生气的指导下，安全保卫人员的作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多数职业“契卡人员”被撤换了，他们中的一些甚至是相当于将军的职位，都由莫斯科和各州的共青团组织中较年轻的人接替了。州和地区的共青团委员会，被授权建立州一级的克格勃组织。党中央委员会甚至为“外国思想颠覆”问题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sup>②</sup>

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改组后的新的克格勃系统，不再是只听命于斯大林那样的神的独立机构。现在，州安全委员会的头头要向州委书记报告工作。

一些地区的党委会内，直接设立了专门小组，代替过去独立的国家保安组织，如果需要告密者，则由地区党委会直接从党员中吸收。保安机关在失去独立性的同时，也失去了逮捕、审判、判决和执行的全权。克格勃系统现在只能调查和实行逮捕，审判及判决由法院执行。监狱和集中营系统则由内务部监管。这种职能上的分工，使得在决定是否需要采取一种镇压措施时，党作为最终的裁决者，发言权大得多了。不久，人们就得知，除非经过地方党委的审查，或者已经做出开除出党的决定之后，任何党员以及党的行政干部，都不能因政治罪名而受

---

① 以“部长会议保护印刷品中的国家机密委员会”和“国家电影摄影委员会”的形式存在的国家书检制度，以及其他几个委员会，就是这种性质的。部长会议只负责其财政开支。

② 那时，“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问题还不突出。

到逮捕。

州委、市委、地委书记全面负责他们所管辖的地区，再也不必担心会突然被逮捕。这项改革，使赫鲁晓夫获得了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里占了大多数的州委书记们的全力支持。这时，党中央委员会与苏联政府最高机构之间的关系，和州一级党委与执行委员会的关系一样，是平行的。赫鲁晓夫可以对政府发布指示，这样，他不仅成了党内最有声望的人物，而且很大程度上在全国也是如此。

过去存在于保安系统内部的“特别委员会”多卡斯“三人专案组”被取消了。它是超乎于法律之上的，有权对由旧内务人民委员会保安部进行调查的所有案件做出判决。这些“多卡斯”常常根本不把所谓的刑法和司法程序放在眼里。1953年以前，多数的一般法院只审理小偷小摸和与工作有关的罪过，以及离婚等其他民事案件。现在，这些法院受理范围扩大了，也审理政治案件。但是，由于这些“人民法院”并没有审理政治案件的实际准备，所以那部曾将数以千计的政治犯送进集中营的机器，便自动停止了运转。在赫鲁晓夫执政的整个时期，新的、全国范围的重大政治审判一次也没有发生过。<sup>①</sup>当然，所谓的反苏活动仍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一些学生和知识分子团体就因此而被判了刑（例如对待抗议1956年苏联对匈牙利骚

---

<sup>①</sup> 尽管在赫鲁晓夫时期因违犯刑法中的政治条款而被判刑的犯人只有几百，但政治犯的总人数仍保持着相当多的数量。赫鲁晓夫的平反政策，没有延伸到一些可以被看作是政治性的问题。除了早些时候已经提到的那些例外情况，还有在战争刚刚结束的那几年里，积极参与了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分子。其次，赫鲁晓夫还通过了一项针对所谓“寄生主义”的法律条款。依此法令可以对自称为诗人或艺术家，而又未被正式接收为作家或艺术家协会会员的年轻人进行指控。另外，在赫鲁晓夫时期，还开始实行将“对社会有危险”或有“精神病”的人强迫住院的做法。这项规定，使那些不适当地把人送进精神病院的精神病医生，免除了法律责任。

乱进行军事镇压的人)。尽管赫鲁晓夫时期在一些省份的个别地区无疑地进行过政治性的逮捕（这也是根据地区党委会的指示，而不是来自莫斯科的命令），但总的来说，是以日常的行政压制手段（如开除党籍、从大学里开除、先召去工作等），代替了过去司空见惯的政治恐怖。

## 一点小小的成绩

在斯大林死后，处心积虑地争夺权力的人们所面临的，不仅仅是简单地改组国家警察制度这样一个问题。1953年，国际关系也极度紧张。这是冷战最激烈的时期。1951年开始的朝鲜战争打个不停，看不到要结束的迹象；与南斯拉夫的关系，被限制到最低限度，斯大林与铁托之间长期不和，仍在每天的反南宣传中反映出来。

赫鲁晓夫相当成功地处理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问题，显示了很大的才干。如果说他在谋求迅速解决朝鲜冲突中的努力还不引人注目的话，那么1955年当他和布尔加宁一反苏联对南斯拉夫的常态，到达贝尔格莱德，并且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宣称，两国之间悲剧性的长期的敌意，是贝利亚臭名昭著的阴谋造成的恶果的时候，他所起的作用就十分明显了。铁托宽大为怀，表示了完全的谅解，苏联感到又找回了一个朋友，这个消息，得到国内人民的热烈拥护。

赫鲁晓夫开始对外交政策和出国旅行感到兴趣以后，他就看到了苏联的农业和整个经济不仅无法与美国（它的发达可以用历史的原因来解释）和英国（它的先进可以归结于过去和现

在对殖民地的剥削)相比,就是和西德、法国甚至日本这些在战争之后,迅速发展建设起来的国家相比,也是落后的。当然,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赫鲁晓夫向全国提出,要研究别的国家的成就,摒弃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宣扬的抵制“世界主义”和排斥一场外国事物的老教条。这一新的态度,对苏联科学技术的发展关系极大,同时,也促使政府更加关心消费品的生产。

赫鲁晓夫没有受过科技方面的训练,不能自己解决技术问题,但他却会提出要求,假如看一些有关农业的一般性和技术性的电影,克里姆林宫里有放映设备。赫鲁晓夫喜欢让苏联最高级领导人观看配有同声传译的外国农业和技术成就的影片。放映后,有专业人员对赫鲁晓夫感到不太清楚的问题进一步加以讲解(农业方面的影片有时由李森科担任讲解员)。往往在这之后,这些电影,就拿到技术和农业部门及其他机关放映。

从1953年至1954年起,西方的影响开始向建筑、农业、工业等许多经济领域渗透。莫斯科定期举办外国的工业、农业及一般器械展览(其中最出名的是1959年美国的展览)。几乎所有的展品在展出之后都被买了下来,作为使苏联的产品、机械和其他设备现代化的样品。总的来说,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赫鲁晓夫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使凡有助于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事物都积极引进。

在此,不可能列举由赫鲁晓夫直接建议、或者在他从美国、英国、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及其他地方观察、学习到的东西的影响下,所取得的全部技术革新成果。其中不少项目在当时是有益的,而且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例如,大规模的住宅建筑的发展,就与赫鲁晓夫直接有关。为了加速建设,他下令使用预制结构的新方法(即整个房

间都在专门的装配厂里预先制做好)。这是一种注重实效的做法。但同样为了加快速度，他不必要地坚持强求施工图纸千篇一律，甚至降低某些规格，使楼房显得非常难看。居民楼的高度被限制在四层到五层，因而不必使用昂贵的电梯。阳台也被视为多余的奢侈品。<sup>①</sup>这种遍布莫斯科城郊的大片居民楼，很快就得到了“赫鲁晓夫的贫民窟”的绰号<sup>②</sup>。

美国式的自助餐厅和自动售货机遍及各地（伊尔克和佩特罗夫在1935年写的《美国见闻》一书中，曾对这种快速的美国自助饮食方式做过讽刺）。在斯大林时期一度被宣布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的控制论，这时也恢复了名誉。计算机技术以及计算机在工业、科学和经济领域中的应用，都开始有所发展，尽管在时间上这项技术的使用已远远落后于西方。在农业方面，开始改变过时的、由拖拉机牵引的挂钩式的农业机具，而采用铰链将机具直接安装在拖拉机上。这样，一个拖拉机手不需要助手，就可以独自进行几项工作。公路建设也有所发展，修建了几条可与西方的超级高速公路相媲美的高速公路。

赫鲁晓夫十分清楚，普通公民对他的判断，不会只基于生产更多的煤炭、石油或者钢铁，甚至也不仅仅用政治改革或他的外交政策，要赢得民心，就必须巩固自己的权力，因为尽管他的声望与日俱增，身边还是有怀着敌意的人，那些人也想为自己争得一些权力。

出于种种个人或集团的利害关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核

---

① 1956至1966年又发现，如用大量的低层建筑来满足住房需要，占地太多，会使莫斯科的城市面积过大，而且相应所需要的道路、煤气、水暖设施的花费比电梯还要大。从那以后，莫斯科城内的居民楼至少在十二层以上，并有电梯、阳台，房间比较宽敞，通风也好。

② 此种住房的俄文名称Khrushchoby，恰好与赫鲁晓夫名字的Khrushchev贫民窟或出租房屋的俄文字Frushchoby的合称谐音。

心领导，对赫鲁晓夫在政治方面的“激进主张”持反对态度。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这些赫鲁晓夫的地道的政敌们，对农业的形势缺乏了解，并惧怕“迅猛”的改组。他们只想将贝利亚“一伙”清洗掉，除此之外，对任何政治上的清理和改革都毫无兴趣。

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些斯大林时代的幸存者是如何搞掉贝利亚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早在1953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的，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与赫鲁晓夫之间的权力之争。



## 第五章 权力之争

由于赫鲁晓夫对发起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方面所起的决定性的贡献，使他在最高决策机构中的感召力已经毫不成问题了。但是，直到1954年，还没有确定一个唯一的领袖，斯大林死后宣布的“集体领导”的原则，仍然占据着优势。人们的思想，二十五年来一直被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所禁锢——舆论宣传使苏联公民们相信，只有这位“伟大的人民之父”才能独自处理并制定外交政策这样复杂的问题和掌管国家。因此，代替这种超级智慧的最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的主要同事和信徒们的集体的力量。这些人此时必须在对“导师”的怀念中紧密团结。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的同僚中没有一个是特别受到知识分子爱戴或是在学术、科学及经济界比较得人心的。所有那些由于帮助别人而赢得了声望，开始初露头脚的人，或者有组织能力，或成绩卓著，或能熟练有效地处理经济问题的人，到1953年时，都已经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了。1954年的集体领导班子中，只有一个人是斯大林的老卫士，这就是曾被斯大林强迫退休，后来又恢复了职务的国防部副部长朱可夫元帅。

在向克里姆林宫金字塔的顶峰攀登的路途中，有几个人是赫鲁晓夫必须设法通过的障碍。其中有的人又比起其他人来，具有更大的挑战性质。莫洛托夫到1941年为止，一直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战前已身居高位。这时，他认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还不够大，因此想将赫鲁晓夫排斥于外交事务的范围之外。伏罗希洛夫，曾因未获得芬兰边防的重要情报，就让苏联与芬兰作战而深受谴责。1941年，他在南线指挥作战不利，致使战争开始不久，纳粹德国军队便在乌克兰地区很快地击败了红军。他也因此受到过惩罚。伏罗希洛夫不会忘记，正是赫鲁晓夫——曾作为南线军事委员会的成员，积极地支持撤销了他的一切军事指挥权。赫鲁晓夫与卡冈诺维奇之间的交恶，始于1947年；与马林科夫结怨是在1949年。

斯大林一直把赫鲁晓夫视为一个忠实而有用的侍从。甚至对他颇有几分好感。因此，尽管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时常敦促，但斯大林仍然顽固地拒绝将赫鲁晓夫从老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清除出去。

第一次认真考虑将赫鲁晓夫贬职的企图，是发生在1947年3月，他因为没有对乌克兰地区的民族骚动给予充分警惕并进行镇压而受到指责，被“解除了”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卡冈诺维奇被从莫斯科派去，接替了他的职位，来恢复“治安”。赫鲁晓夫同时还是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他的这个政府职务和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被保留了。但是，在这个过去完全由他控制的乌克兰地区，而且他曾经是一个颇受拥戴的领导人，这时却要隶属于卡冈诺维奇了。

尽管有人感到，卡冈诺维奇作为犹太人，在清除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倾向时可能更无情。其实，对卡冈诺维奇的任命，只在某种程度上与“民族主义”有关。将他派往乌克兰，主要是因为1946年的严重干旱之后（自1891年毁灭性的旱灾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饥荒正在威胁那个地区，如果有任何可能发生骚乱迹象，那么就需要他挥动“铁腕”，进行镇压了。在1932年的那次由于收成不好，合作化运动以及收获后立即上缴大量谷物支付国家的高额税收造成的饥荒中，乌克兰的损失最为惨重，有二百多万人被饿死。对这一痛苦的悲剧，人们仍记忆犹新。

在围绕春小麦还是冬小麦更为优越的问题上，卡冈诺维奇和赫鲁晓夫之间爆发了一场争论，这成了他们俩人的政治冲突中理论方面的焦点。在这场冲突中，赫鲁晓夫不顾冒自己政治生涯可能被毁灭的风险，表现了相当的决心和勇气。在战后，当饥荒又一次成为主要威胁时，一个人关于农业政策的观点，将对决定其在党内的地位，产生重大的作用。

1947年，在乌克兰原来种植冬小麦的相当大面积的土地上，准备改种春小麦，这个建议，是农业科学院院长T·D·李森科推崇的计划的一部分。他从农学家V·维尔亚姆斯关于“禾本植物轮作制度”的呆板的理论设想中，推论出了春小麦的优越性。赫鲁晓夫十分清楚地了解这项计划的缺陷和可能对他的家乡造成的危害。对乌克兰的农民来说，种植冬小麦更符合习惯，也更靠得住。春小麦一般是在冬小麦受到不利气候的严重损害后，作为一种补救才播种的。

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的广大地区，冬小麦的产量比春小麦平均高出一倍半至二倍，也较少受周期性干旱的影响。在初秋，当土壤中含有充足水分时播种的冬小麦，经过一秋，已经长得相当可观，到了春天，土壤中的水分又比较充足时，它

便很快开始迅速生长，至仲夏即已成熟。因此，南方经常出现的夏季干旱，对作物没有什么影响，而且，禾本植物的较长的生长期（从秋天至来年仲夏），使每一粒种子产生的分蘖较多，因而产量较高。

春小麦生长出来的果实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所谓“硬质”谷物，含有较多的蛋白质。但由于是在春天播种，仲夏时分蘖，夏末开始成熟，所以，夏季里哪怕是轻微的干旱，也会使它的产量大大下降。严重的干旱则会使作物完全毁掉。鉴于以上原因，在乌克兰扩大种植春小麦，是一件风险极大，而且极不得人心的事情。

尽管如此，卡冈诺维奇仍然坚持迅速扩大春小麦的播种面积，李森科对此从“科学”的角度给予支持。由V·S·德米特列夫担任局长，S·T·德米多夫任副局长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农业局，要求各地一定要完成规定的春小麦种植面积。

关于小麦的争论，很快便爆发成了政治上的冲突。1947年夏末，曾经谣传赫鲁晓夫失掉了他在乌克兰共和国的党政职务。但是，卡冈诺维奇要将赫鲁晓夫的所有职务撤销的企图没有成功。他的对付乌克兰民族主义知识分子阶层的计划，也遭到抵制，并且因为怕引起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被取消了。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的保安系统里有很多赫鲁晓夫的支持者，卡冈诺维奇作为一个“外来户”和莫斯科派来的政府官员，还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卡冈诺维奇的犹太人背景显然也是不利因素，因为斯大林在战后几乎是公开煽动的反犹太主义，在历史上是于乌克兰而不是于中部俄罗斯扎根最深。

赫鲁晓夫巧妙地利用这种形势，从各个方面进行周旋，并控制住了局面。到1947年底，卡冈诺维奇来乌克兰还不满一

年,就被召回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又恢复了乌克兰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不久之后,在一次乌克兰科学家与农业专家的重要会议上,赫鲁晓夫的论点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冬小麦的产量被证明确实比春小麦高。为了逃避因做出错误的建议而可能受到的指责,李森科在一篇题为“论V·K·维尔亚姆斯的农业经济理论”的文章中宣称,维尔亚姆斯关于春小麦在乌克兰地区的优越性的论点是错误的。<sup>①</sup>鉴于维尔亚姆斯已经在1939年去世,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身上。

1953年,赫鲁晓夫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后,立即撤销了德米多夫和德米特列夫在国家计划委员会中的职务。而排挤卡冈诺维奇,要困难的多。但也有迹象,表明了对他的不满。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取消用活着的党内重要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城市或机关这一长期以来被引以为荣的作法。此项禁令具有反溯效力,几个已经以“卡冈诺维奇”命名的小城镇和村庄都被恢复了它们原来的名字。在莫斯科,1935年时为了表示对卡冈诺维奇的敬意,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莫斯科地下铁道,这时改称为列宁地下铁道。但为了尊重他发起建造地下铁道的功绩,莫斯科市苏维埃提出了一个折衷办法,将莫斯科市中心的“野味市场”地铁站改名为“卡冈诺维奇站”。由于这个站名不能给乘客以任何方位的启示,所以很快恢复了“野味市场”的老名。几年之后,这条街道又被命名为“卡尔·马克思境界”,地铁站也随之改了名。在乌拉尔,以莫洛托夫命名的工业城市,恢复了旧称彼尔姆。乌克兰的伏罗希洛夫格勒,再次被称为卢甘斯克。没有用马林科夫或赫鲁晓夫的名字命名过什么有名的城市和机构,因此,这二位重要人物的声誉,不会因为这种简

---

<sup>①</sup> 引自1950年7月15日《真理报》。

单的改变受到任何损害。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之间的摩擦，也不是由于斯大林死后的权力之争而引起的，同样是由于赫鲁晓夫一年之前的农业政策引起的。尽管斯大林在几乎所有的内政外交领域中占有唯一的独裁者的地位，但是他显然不具备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解决战后阶段的这一问题的资格。而农业，恰恰是在合作化之后与斯大林的声望联系最密切的经济领域。农业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它的失败不能用虚假的统计数字来掩盖。食品的短缺比煤炭、钢铁或石油的短缺更能被人们敏锐地体察到。轻工业消费品总产量的80%，依赖农业提供棉、毛、麻、动物油脂等原料。因此，能掌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就在治理国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49年12月，斯大林将赫鲁晓夫调回莫斯科，担任莫斯科州委和市委书记，并担任党的书记处书记。同时，他还被授权主管经济中的农业部分，这个任命的含意是微妙的，这时，斯大林的副手尼古拉·沃兹涅辛斯基已经因为“列宁格勒案件”而被捕，伙同贝利亚执行这项“任务”的马林科夫这时正处在副手这一“危险的岗位上”。也许正是因为马林科夫手中的权力过大，才使斯大林决定将几乎是同等份量的权力交给赫鲁晓夫；任命马林科夫主管工业，赫鲁晓夫主管农业。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赫鲁晓夫获得成功的第一个计划是合并集体农庄。他把这仅看作是农村真正的现代化和改善农民生活状况的开端。他下一步的打算，是在合并了的农庄的基础上，建立农业城镇。

虽然实施这项计划可以使国家的投资迅速转向农业，而且仅这一点，就可能使农业的危机状况得到缓解，但从苏联1951年的情况来看，当时在全国范围推行这一计划，无疑是乌托邦

式的幻想。斯大林也无意进行如此迅速的转变。他误信一种虚假的计算收成的办法，这种方法不是按照实际产量，而是在实际收获前，根据采样测定作物的样品进行推算。这就使产量的数字不符合真实的情况，要上缴给国家的粮食指标却不断增加。结果，在农村经济迅速走向崩溃的同时，城市却呈现出一种虚假的繁荣景象。

马林科夫趁此机会贬抑赫鲁晓夫，说他的农业城镇计划是一个危险而有害的重大经济错误，斯大林和贝利亚表示赞同，农业城镇计划便就此湮没无闻了。在重新进行任免时，马林科夫再次授权主管农业，但他仍然不能将赫鲁晓夫彻底排除出政治局。马林科夫并未就此善罢甘休。他以第一书记的身份（原意如此）指示在党内散发一份“机密”信件，尖锐地批判建立“农业城镇”的主张。并在1952年召开的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再次对赫鲁晓夫的计划提出了批评。<sup>①</sup>马林科夫在报告中竟然宣称，苏联的粮食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其实，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只需将真实的数字公布出来（1952年，苏联每人平均的粮食产量比1913年沙俄时代的水平还要低），就足以为自己辩解，并使马林科夫的信用蒙上一层阴影。但是，仅仅让马林科夫在农业政策上丢脸，还不能够剥夺他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

作为旁观者看来，并非一定要撤掉马林科夫的职务，国家才能富强。在政治机敏性方面，他并不比主席团其他成员差。而且如果作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来发挥作用，他也许还能对过分性急的赫鲁晓夫起一点有益的抑制作用。将全部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的、近似极权主义的作法，永远是危险的，在缺乏民

---

<sup>①</sup> 见1952年10月6日《真理报》。

主传统的国家里，尤其是如此。但恰恰是由于缺乏民主传统，多个领袖之间的互相不信任，就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成为公开冲突，随之一个被另一个强行搞掉。这些人全都认为，国家的稳定，只能靠在关键岗位上安插效忠于自己的人才得以维持，而不相信应该通过宪法或者规章制度来保证这一点。

这样，就只剩下谁让位的问题了。不久以后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使赫鲁晓夫占了优势。

1953年12月，贝利亚被处决后，开始了对列宁格勒案件的复查。在为受害者恢复名誉的过程中，起诉的一些证据表明，马林科夫那时曾去过列宁格勒，和贝利亚一起导演了所谓的“调查”。后来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的M·安德列诺夫，曾作为马林科夫的助手，积极参与了策划“列宁格勒案件”。这年十一月，他被赫鲁晓夫撤了职，正在受审查。

作为贝利亚过去的合作者，马林科夫只有接受赫鲁晓夫的制裁。他付出辞职的代价，才得以逃脱彻底的身败名裂。1954年底，他辞去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但因为还要遵循正规的“民主程序”，官方一直没有公布这个消息，直到1955年2月，召开定期的最高苏维埃会议时，才予以宣布。这种作法，某种程度上在世界公众的眼里维护了政府是按制度办事的形象。马林科夫本人对自己的请求辞职的理由做了说明：由于长期从事党内工作，在处理政府事务方面缺乏经验；1950年至1953年的农业生产情况不佳，他负有直接的责任。因为自动辞去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马林科夫才得以保留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地位，但再也不掌有任何实权。这样，他一直失势，直到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要讲述到的，他再一次卷入的那次权力斗争。

自战前一直都是赫鲁晓夫的朋友的布尔加宁，这时被授命



组织新的部长会议。他将赫鲁晓夫的多个支持者分别任命为新政府的农产品采购部部长和农业部部长，曾经支持马林科夫反对赫鲁晓夫的前农垦部长A·科兹罗夫，被贬到北高加索地区去领导一个国营农场。朱可夫元帅升任国防部长。这一任命，立即使军队在政府中获得了应有的重视和威望。赫鲁晓夫的其他亲信，也在党和政府机构中被委以要职。只有当所有这些自斯大林死后，用了近二年时间进行的变动成为事实之后，才能说赫鲁晓夫确实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自己的权力。

## 第六章 农业“奇迹”

在赫鲁晓夫的推动下，中央委员会采取了几项谨慎的步骤，准备制定必要的立法，以逐步改善农业状况。但是，1953年粮食歉收，要保证来年有较好的收成，又缺乏必需的肥料、饲料和机械，这迫使赫鲁晓夫考虑采取更激进的措施。农业产量需要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匮乏已经严重到即使农业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也难于解决城市的粮食供应，因为城镇人口的增长过于迅速。

工业、交通运输和通讯事业的发展过份集中，使过去能够自给自足的一些农民（过去他们自己磨面、烤面包、加工奶制品、屠宰家畜），这时也不不得不到附近的城市或工业城镇去买面包、肉和黄油。遇到歉年，收成不好时，政府不考虑当地人民的需要，仍从集体农庄征收规定的农产品，集体农民只得被迫到城里去购买食品，或是让住在城市的亲戚、朋友寄些吃的东西来。几乎每户农民都有亲友或过去的邻居住在城镇，所以无法进行限制。禁止从较大的城市寄出食品邮包的办法也不起作用

用。其结果，形成了城市养活乡村的局面，这就使政府要考虑解决的不仅是城市人口的吃饭问题了。自给自足的农民已经不复存在，粮食成了在一般国家市场上向全体人民出售的一种商品。

一个工业国，必须拥有能满足全体人民需要的足够的粮食。苏联只有靠精心计划、逐步发展来实现这一点。要达到西欧或美国的水平，需要将粮食产量提高两倍，肉类生产提高三倍，家禽和蛋类产品提高四至五倍。要有一个农业奇迹，才能使苏联恢复到沙俄时代的传统农产品出口国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农业问题，不仅是国内形势的主要方面而且成了苏联活跃的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外交政策，旨在加强苏联在印度、阿拉伯世界、非洲、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的优势。这些摆脱了殖民统治的贫穷国家，是扩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范围的重要环节。

稳定而缓慢的农业增长（有时会因气候情况发生波动）不适应苏联雄心勃勃的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于是，赫鲁晓夫从1954年起，开始了对传统农业体制的积极的改革。首先，迅速开垦东部和东南部地区成百万公顷的处女地与休耕地；其次，把玉米作为一种重要的粮食和饲料作物加以推广。

## 新边疆——处女地

1953年9月，当关于农业的中央全会还在召开时，就已经可以看出当年的收成不好。后来的计算表明粮食的实际总产量按人平均，甚至低于1913年的水平。国家收购的商品粮为3600

万吨，比1940年少250万吨。显然，在肥料贫脊、使用过度的土地上，不可能迅速提高产量，赫鲁晓夫便很自然地转而考虑扩大耕地面积的可能性。只有大规模开垦新的地区，才能迅速取得成效。

最初，开垦处女地的计划是作为一项临时的、过渡性的措施提出来的。为的是当传统的粮食产区在使用化肥和最新技术设备而充分发展，达到其生产能力的极限时，填补其空白和赢得时间。那时，苏联还有大片尚未开垦或利用不足的土地，适于发展农业。仅在哈萨克斯坦及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东部地区，就有4,000多万公顷处女地、休耕地、干草地和牧场地。为了能在1954年开始全面开发这些地区，需要及时采取措施。一月份，赫鲁晓夫提议，发起一个全国性运动。在他的倡议下，哈萨克斯坦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大规模开垦该地区的处女地。二月，在莫斯科召开的机械——拖拉机站工作者大会，表示全力支持开垦处女地的计划。1954年3月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也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决定垦荒1,300万公顷土地。这样，到1955年，可望从中收获约2,000万吨粮食。<sup>①</sup>

1954年春夏两季，一项巨大的组织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通过共青团组织的号召和募征，三十万名志愿者奔赴北高加索、阿尔泰、西伯利亚南部和乌拉尔地区。农村及城市人口被鼓励向边疆移民。专列火车将成千上万户人家运往新开垦的地区。数百个居民点，临时帐篷城镇，还建立了几百个规模很大的新国营农场，其中有的农场马上就分到了几万公顷土地。工厂流水作业线组装生产的新农业机械，几乎全部运往这些地区。约5万台拖拉机（按传统的15马力单位计算），6千多部卡

<sup>①</sup> 见1954年苏联共产党决议，第3部分，第661页。

车和其他机械设备，也运送到新开垦地区的国营农场和为集体农庄服务的机械——拖拉机站。<sup>①</sup>

1954年，开垦处女地的指标超额完成了。原来只计划开垦1,300万英亩，1954年开垦了1,900万公顷<sup>②</sup>，1955年又开垦了1,400万公顷，但并不是所有1954年开垦的土地上都种上了小麦，只是在有限的土地上进行了春播。整个夏季和初秋继续进行耕地（主要是在高原地区），为来年播种做准备。1954年获得了好收成，全国粮食总产量增长了1,000万吨，<sup>③</sup>其中大部分是老农业区增产的。处女地的开垦，还仅仅是开始，收获微乎其微——不超过300万吨。对新开垦区的希望寄托在1955年。

而结果，1955年东部地区十分干旱，希望落了空。在处女地上播种的春小麦全部枯死了。到了冬天，生活十分艰苦，粮食和其他物品的供应没有保障，成千上万移来长期定居的人们开始纷纷离去。这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是一个惨重的失败，是令人痛心的幻灭。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公开指责他进行“大飞跃”式的鲁莽的冒险。有人指出，如果把过去两年中毫无效果地投入到处女地上的全部人力、物力、财力，投放到中部地区、乌克兰、北高加索，及顿河、伏尔加河等传统农业地区，结果会大不相同。中央委员会中的反对派强硬起来，要求将“无价值”的人力与设备的投放，从东部转向西部和南部。

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但他不仅仍然对处女地计划满腔热情，大力扶持，而且还要求进一步扩大开

---

① 为统计方便起见，拖拉机按照传统作法，即1930—1940年，以15马力为计算单位，照此方法，一台60马力的拖拉机，被计算为四台15马力的拖拉机（见1972年莫斯科版《苏联战后时期的农业发展》第145页）。

② 见1957年莫斯科版中央统计局材料《1956年苏联国民经济》第127页。

③ 见1959年莫斯科版中央统计局材料《1958年苏联国民经济》第436页。

垦面积。因此，1956年成了对处女地计划和赫鲁晓夫本人都至关重要的一年。如果再出现1955年那样的坏收成，赫鲁晓夫的被贬黜就将是不可避免的了。

结果1956年在处女地上获得了特大丰收。那年夏天，东部地区雨量适当，西部却受到严重干旱。新开垦的处女地这时还不需施放很多肥料，因土壤中仍含有大量养分。小麦获得了苏联农业史上空前的高产。赫鲁晓夫以胜利者的姿态，乘坐汽车，飞机、直升飞机，得意洋洋地到这个地区进行视察，来这里参观的党的高级干部不下几百人。这一年，仅在东部地区就收获了6,300万吨粮食。全苏粮食总收获量约为12,500万吨，超过国家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最高水平，而这个数字中一半以上的粮食产自新的开垦区。仅哈萨克斯坦一地，就收获了1,600万吨粮食，比整个乌克兰地区的总产量还高。若不是多亏新开垦的处女地获得了丰收，苏联在1956年几乎肯定要发生饥荒。

大丰收的巨大胜利，证明了赫鲁晓夫提出的政策的正确性，使他的批评者暂时失去了口实。然而不幸的是，出乎意料的特大丰收，又随之带来了许多问题。虽然从西部地区迅速派去了大批联合收割机和其他机械，仍不可能在冬季到来之前将庄稼全部收割完毕，不少粮食因此受到损失。同时，由于没有足够的粮仓和棚屋，收获的粮食也不能完好地进行储存。又由于缺乏足够的卡车、公路和人力，储存的粮食也不能及时运到需要的地方去。如果使用铁路运输，又没有足够的适于运送粮食的车皮，以致大量粮食在运输途中损失掉了。但是，所有这些问题的产生，毕竟是由于成功引起的而不是失败造成的。有能力创造“农业奇迹”这一成就，使得人们欣喜异常，而不会去过份注意存在的问题。由此看来，在这些成绩后面，隐藏着日后终将成为不幸的农业灾难。在这些新开垦的边远地区人烟稀

少，新建立的农场无法种植多种作物，只种植单一品种的小麦，到了一定的季节，就要从西部城市临时抽调大批劳动力，预计需要很长时间，这些地区才能完全开发和定居下来。因此，赫鲁晓夫为中部地区、乌克兰、北高加索及顿河、伏尔加河流域等传统农业地区，专门制订了另一项发展计划。

## 种植玉米运动

如果开发东部地区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那么，把玉米作为一种饲料加以生产和推广，则是为了解决畜牧业的问题。赫鲁晓夫完全清楚，苏联在增加粮食生产的同时，也必须发展畜牧业，而且只能依靠传统农业区来实现这一目标。饲料的缺乏，是这些地区发展畜牧业的主要障碍。赫鲁晓夫知道，玉米是美国的主要饲料，那里的畜牧业由于玉米的高产而兴旺起来，苏联从1955年开始，在大使馆中设立了“农业随员”，大量情况和有关改革的建议，通过这条渠道送到了中央委员会。同时，派出了一些农业代表团，到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访问。

以往多年来对玉米所抱的巨大希望，从未实现过。在三十年代时，美国玉米遗传学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普遍采用，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玉米产量，而近交系杂交品种的问题，成了李森科学派与以N·I·瓦维洛夫为首的古典遗传学派激烈争论的课题。瓦维洛夫认为，美国提高玉米产量的成功，无可辩驳地证实了遗传学的实用价值，并且建议将这一方法引入苏联，在南部地区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李森科反驳说，育种种植玉米的新方法，是资本主义的公司搞的商业宣传，他还认为近交

系杂交有损植物本身的“生态学”。<sup>①</sup>

1953年9月赫鲁晓夫提出，在乌克兰和南部地区，大面积地扩大种植玉米，作为粮食，在其他地区作青饲料。那时，全国青贮饲料的生产很少，而玉米在所谓“灌浆”-的成熟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青饲料。不仅在南方，在中部地区也是这样。

用现代的杂交方法生产杂交玉米种子，要用相当长的时间，因为需要经过若干年人工诱导的自花授粉，才能形成纯种的近交系。为了加快发展速度，苏联从美国进口了一些专门用于繁殖种子的纯种，并且建立了几个专门的育种农场。但是整个计划的进展速度，仍然不能使赫鲁晓夫满意。而且，尽管大力宣传了种植玉米的好处，苏联的玉米播种量，仍然没有很大提高。过去从未种过玉米的农场，对这一新的作物十分谨慎。有的农场只在不到一公顷的小块试验田上进行种植。人们不愿扩大种植面积，原因之一是由于缺乏专门的机械设备，大部分农活都要靠手工操作。

赫鲁晓夫对玉米，特别是对杂交玉米的偏爱，很快地被瓦维洛夫等遗传学家加以利用，来削弱李森科在农业科学领域中的影响。这时赫鲁晓夫对李森科还并不感兴趣，也许是因为他还记得，1947年他们在冬小麦与春小麦问题上的冲突。李森科过去一直否认杂交玉米更为优越的学说，致使苏联不得不从美国大量购买玉米种子。在各方面不断的批评、谴责之下，李森科终于被撤销了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

赫鲁晓夫对1954年玉米种植面积增长不大感到十分不快，因此，尽管还缺乏必要的种子、肥料、机械、粮仓和经验，在赫鲁晓夫的一再坚持下，中央委员会还是发出了指示，要在几

<sup>①</sup> 详细内容见1969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D·李森科的兴衰”一书，若莱斯·麦德维杰夫著。



乎所有的农业州大规模地扩大种植玉米。人们久已盼望的，才刚刚开始实行的集体农庄可以自行决定种植何种作物的农业计划制度，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他们接到命令，种植玉米、玉米还是玉米！在每一个可能的会议或集会上，赫鲁晓夫都大力鼓吹一番玉米。他还引证史料，回顾十八世纪时，如何不得不用暴力，将马铃薯引进俄国。作为施加压力的结果，玉米的播种量（包括用于粮食和作青饲料用的）急剧增加，达到约1,800万公顷。<sup>①</sup>

玉米的种植决不是在每个地方都获得了成功。但是，1955年较为炎热的夏季，有益于玉米的生长，（东南部受了旱），连中部地区和波罗的海共和国的农场里种植的、用作青饲料的玉米，也获得了丰收。南方的青贮饲料和粮食玉米的收成也很不错。赫鲁晓夫因而作出决定，1956年，玉米的种植面积还要进一步扩大。这一年，苏联的欧洲部分夏季仍很干燥，玉米又获得了好收成。于是，发动种植玉米的运动，又成了农业上的一个重大成就。人们纷纷来赶玉米的新时髦，规划建立新的粮仓，制订出用青饲料喂养牲畜的办法，设计制造了机械化种植玉米的专用设备，纯种玉米的培育也有了改进。乌克兰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玉米研究所，莫斯科的展览馆里开辟了一个玉米展览室；农业部发行了一本新的科学杂志，刊名为《玉米》；食品生产部门增加了用玉米制作的食物种类，还在莫斯科开设了一家命名为“玉米”的专门的食物商店。玉米，和新开垦的处女地一样，成为开辟新天地、创造农业奇迹的象征。

---

<sup>①</sup> 见1959年莫斯科版，中央统计局材料《1958年的苏联国民经济》，第403页。

## 第七章 赫鲁晓夫 占了上风

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赫鲁晓夫执政的年代里最重大的事件——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所谓“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谴责了强权统治和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行径（实际上是含蓄的对斯大林本人提出了批评）。这样，赫鲁晓夫就在使苏联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开创一个新局面，迈出了不可逆转的一步。

### “秘密报告”

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贝利亚被捕之后，在中央和地方党的积极分子中传阅详细列举他的罪行的秘密文件时，赫

鲁晓夫就已经打算象他后来在二十大上所做的那样，把贝利亚的罪行与斯大林联系在一起，并对斯大林进行指责，到1953年底，斯大林还没有成为官方批评的目标。但是在他的生日——12月21日那天，没有颁发斯大林奖金（自1939年以来，每逢这个日子，都要对科学技术和艺术方面杰出成就颁发此奖），官方说是由于经济原因，这显然是一种托词。

赫鲁晓夫和他在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对过去进行的镇压与迫害的实际程度，都还没有确切的了解，但是他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事情已经很明显，不全面评价斯大林的作用，已经无法继续对政治犯进行平反昭雪。为此，中央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准备一份报告，以提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尽管表面上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全面调查斯大林主义的恐怖行为，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要它将全部画面彻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是要在特殊的灯光效果下，部分地显示画面。报告将一方面对滥用权力，以致使党的健康肌体一时蒙受沉冤提出指责，同时还说明，那时是处在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创建的过程中，对“列宁的党的内外敌人”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克里姆林宫的头头们确信，斯大林清除托洛茨基“左倾”反对派以及清除二十年代末期出现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是正确的。对农村和农民无情地实行合作化，以及残酷地对待富农，也被认为是必要的，是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因此没有对此进行非难。令人不能容忍的，只是：斯大林对党的忠实干部、有头脑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以及数以千计的无辜地受到牵连的普通人的迫害，这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

领导阶层的谨慎态度，决定了特别委员会的组成。被任命

的人选，多是公认的“温和主义者”。而委员会主任P·N·波斯罗洛夫，基本上是一个典型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他曾经是斯大林传记撰写委员会的主任。这样一个惯于用高尚的理论为一时的实用目的辩护的极端保守的党内史学家，三十年代许多大规模迫害行动的参与者，根本就不适于领导对于恐怖行为的揭露工作，正象他过去不适于参加编写斯大林的传记一样。

这个委员会准备的报告，只供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参阅。即使是波斯罗洛夫这样一个人，也无法掩盖斯大林肆意、非法处置他所不喜欢的大批党的干部：那些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党代表大会代表、州委和市委书记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事实。中央委员们对此早有所闻，何况他们自己也正是在可能遭到同样境遇的威胁下生活过来的。

这样一个尽管经过了波斯罗洛夫精心炮制的报告，由于揭露了斯大林对忠诚的党员、干部和军队高级将领的魔症般的迫害，在1955年还是引起了一定的震动。虽然当时的主席团成员们对这方面的情况略有所知，但是谁也不清楚全国的镇压进行的实际程度。波斯罗洛夫提供的情况，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席团决定，在预定于1956年2月召开的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对“个人迷信时期”滥用权力提出批评。这种一般的、没有针对性的批评载入了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正式记录，并被写进了讲话稿中。党的领导人希望用这种方式表明，新的领导决心回到社会主义法制的轨道上来。预定的大会正式日程上，没有列出赫鲁晓夫将针对斯大林的罪行发表任何讲话，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也没有正式批准过任何这类讲话。

代表大会召开后，听取了事先准备好的发言，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并选举赫鲁晓夫为党中央第一书记，然后正式宣布闭幕。按照惯例，这时第一书记要向新选举的中央委员

会提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名单及其分工的建议。这是作为第一书记的特殊权力。在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和即将提名主席团的短暂间隙，赫鲁晓夫抓住对他的权力尚无限制的有利时机，<sup>①</sup>采取了决定性的行动。赫鲁晓夫通知已经正式休会的代表大会，再延长举行一次会议。这时，许多代表已经离开会场，只好再从宾馆返回。

把代表请回到克里姆林宫大厅，出席一次“已经闭幕”的代表大会会议的通知，于2月24日午夜十一时半发出。任何一个外国代表团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或是非共产党国家的，都没有被邀请出席。大会由赫鲁晓夫亲自主持，从午夜起开始了他的约长达四个小时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坦率而感情冲动地谈到了许多可怕的事情：谈到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被监禁，谈到对忠诚无辜的党的领导干部的拷打和处决，谈到非法流放和驱逐出境，谈到斯大林本人对恐怖行动、刑讯、判处死刑等所发布的指示，谈到卫国战争期间造成重大伤亡的错误决定，以及党和国家机关中违法乱纪、胡作非为的事例。

报告之后，没有进行一般性讨论，也没有通过什么特别的决议，它在人们心中引起了无形的巨大反响。代表们震惊地、默默无言地听着，然后离开了克里姆林宫，各自回到自己的住地。

赫鲁晓夫报告的所谓“秘密性”，其实不过是当时的一种托辞。几天之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即发出指示，将报告内容在全国党的积极分子范围内传达。接着，又在所有工厂、机关、商业部门及其他组织的“党内”全体会议上传达。最后，传达到

---

<sup>①</sup> 这个时间至多只有一夜，第一书记独自工作，因为那时还没有产生他要为之负责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

党外的工人、机关干部、农庄庄员、大学生以至高中生，直到使整个苏联家喻户晓。报告的文本被发送给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负责人，并且很快在国外被用几乎所有文字（包括俄文）出版发行。但是，这个报告却从来没有在苏联国内出版过。<sup>①</sup>

## 事件后果

报告在苏联国内受到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热忱拥护，赫鲁晓夫因此而大得人心。但是在某些地区，对斯大林的谴责却是不受欢迎的。例如，在斯大林的出生地格鲁吉亚，由于对“格鲁吉亚人民的伟大儿子”的诋毁，而爆发了反赫鲁晓夫的骚动。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阿尔巴尼亚和中国，都表示反对。赫鲁晓夫的报告，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是一个骇人听闻的突然袭击，他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即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斯大林和贝利亚的信徒，而且在建立对他们自己的“个人迷信”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类似的迫害、镇压手段。这不是指发生在早些时候如1937年至1938年那段时期采取的镇压方式。这些国家的党的领导人，对苏联共产党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

<sup>①</sup> 曾经印发过100万册赫鲁晓夫报告的单行本，公开出售。1956年6月，在通过了一项较为温和的决议之后，这些印刷品被全部销毁。只有少数文本幸存下来。作者就曾亲眼见过一本这样的小册子。

要求苏联放弃非斯大林化的做法。

在国内，以至于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部，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也对非斯大林化的新路线持公开的反对态度。赫鲁晓夫在他的报告中，只对斯大林、叶若夫、贝利亚和其他少数几个人进行了指控。并且非正式地暗示，象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夫这样一些领导人，不仅没有直接参与这些迫害活动，而且还曾在可能的情况下，制止过斯大林的这种作法。

赫鲁晓夫的报告，在人们的感情上引起的反应太强了，以致他不得不采取措施，暂时控制一下非斯大林化运动。以后的几年里，他所实行的政策的特点是时放时收。1956年6月，又通过了一项《关于克服个人迷信及其影响》的决议。决议肯定了斯大林对党和国家以及国际工人运动所做的贡献，说明他的错误、罪过只是由于误入歧途、滥用了权力而造成的。而且对他滥用权力的程度也降低了调子，宣称即使是在斯大林控制的时期，中央委员会里“列宁主义的核心”仍然坚持了斗争，对斯大林的所做所为起了限制作用，尽管对于撤换他是无能为力的。

然而，这个温和的决议已经无法阻止因赫鲁晓夫揭露了内幕而导致的一系列事件的发生。1956年秋天，波兰发生的骚乱，与波兰党的前领导人受到批评有直接的关系。结果，从根本上动摇了波兰的党中央委员会，使哥穆尔卡上了台。在匈牙利，事态发展更为激烈。人们不能饶恕斯大林和贝利亚的忠实信徒拉科西所搞的血腥恐怖，从而使匈牙利共产党的专制统治迅速崩溃。在长时间的犹豫不决之后，赫鲁晓夫命令苏联军队开进匈牙利，对暴动者进行镇压。

采取这个行动之前，他征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华沙条约各国领导人的意见，他们都支持使用武力。包括波兰人在内，

也同意这种作法。毛泽东则一方面承认军事干涉的必要，一方面指责赫鲁晓夫听取中国的意见为时太晚，说他在决定“玷污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领袖、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同志的名声”之前，应该与中国党进行磋商。

在给苏联共产党领导人的一封信中，中国人公开提到，由于赫鲁晓夫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成为一个修正主义者，他不能再被认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这种领袖作用，现在要由中国共产党来承担。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列宁和毛泽东之间依旧保留着斯大林。一些党的宣传函上，毛泽东已经逐渐成为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后的第五个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形象。但是，他的肖象这时被明显地画的比其他几个人的大些，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和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谴责斯大林之前，他都没有允许自己享有这样的荣誉。

比对赫鲁晓夫报告的政治上的反应意义更重大、影响更深远的，或许是理论、哲学以及心理上的反响。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抨击和这之后的对政治犯的大规模的平反昭雪，在使赫鲁晓夫成为英雄的同时，也使人对共产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产生了严重的疑问。这时，全世界已经清楚地看到，在革命中诞生的苏维埃政府制度，并没有能保证其公民基本的民主、自由和法律权力，没有能够在法制的基础上发展和维持政权，而是依靠恐怖手段扼杀任何反对意见。二十大之后，人们曾希望那些罪恶会很快地一去不复返。但是，1956年发生的事情——对匈牙利骚乱的武力镇压和由于匈牙利悲剧而与南斯拉夫关系的再度恶化，表明二十大的坚强决心已经在削弱。由于国内和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压力，非斯大林化和民主化的运动开始扭转方向。

对文艺界来说，“自由化”的最明显的标志是出版了杜金采



夫的小说《不是单靠面包》，它在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轰动一时的欢欣雀跃。这本小说，尖锐地批判了官僚主义，揭露了在斯大林时期，如何在官僚主义的荒谬意志的支配下，滋育了一批阻碍国家技术发展的不学无术的精神贵族。但是这时，在许多领域里与其他国家进行科学技术合作的微小的进展，已经开始停顿。例如，苏联那时缺乏最简单的计算机技术，也没有合成纤维工业，春天很快就逝去了。1956年底，赫鲁晓夫亲自给杜金采夫的小说戴上了“反苏”的帽子。文学上的“解冻”（此语出于伊利亚·爱伦堡）到此为止。帕斯杰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格医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拒绝在苏联出版。但是直到1958年，帕斯杰尔纳克获得诺贝尔奖金时，这件事才为外界所知。

赫鲁晓夫讲话的调子变得保守多了。他试图部分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仍然把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位领袖。另外，还有一条没有公开宣布的禁令，即禁止再对以往的事情加以追究，或是对过去的罪行及其执行者再进行任何谴责。实际上，反复无常的恐怖统治，根本不是自1934年基洛夫被暗杀才开始的，迫害也不仅限于这时已被恢复了名誉的那些党的领导（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宣布，正在给7,000名左右的党的干部恢复名誉。而在大会以后的几个月里，就有800至900万人得到平反昭雪）。这项禁令，排除了为曾经被“公开审判”定罪的斯大林的积极反对者，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恢复名誉的任何可能性，也使得对党自十月革命以来的全部政策进行回顾成为不可能的事。如果进行回顾，就势必要对合作化时期的镇压重新予以评价，也不可避免地重新评价1929年到1930年的审判。更严重的是，甚至要对列昂·托洛茨基的问题予以重新考虑。赫鲁晓夫及其同事无意破坏自己的权力基础，因为这个权力毕竟是在过去的制度下取得的。

对平反的限制，给世界舆论、尤其是给左翼运动留下了不良的印象。而在苏联国内，幻灭与愤懑更多的是由于当时过低的生活水平，而不完全是由于政治问题引起的。只有当集权和专制制度要求人们做出的牺牲能产生切实可见的经济效果——不是重工业的发展，而是有更多的消费品、食品、衣物和更好的居住、工作条件，才会使人相信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

是赫鲁晓夫最先减轻了农民的痛苦，消除了警察恐怖统治的阴影，并多少给了人民一点消费品。开垦处女地和推广种植玉米的初步成绩，增加了他的威望，人们都公认是他给全国带来了乌托邦的气氛。尽管有其他人帮助，一起揭开了斯大林罪恶的潘朵拉之盒的内幕。但是，是赫鲁晓夫站出来在二十大上做的报告，所以现在一切功劳都记在了他一个人的帐上。

## 1957年的戏剧性事件

为了实现给全国提供更多的消费品的愿望，1957年5月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大幅度提高肉类、牛奶和黄油产量的惊人的计划——在三、四年内（即到1960年或1961年时），超过美国的产量。赫鲁晓夫提出这个目标时，并没有征求党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他感情冲动，过高地估计了党的领导人在经济工作的农业领域中所能产生的实际影响，结果成了自己的错误估计的牺牲品，这一点，从他在列宁格勒的讲话中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了。

在牛奶和黄油的产量上超过美国，还是可能的，因为在植物油和人造黄油的产量提高以后，美国人的牛奶和黄油的消费

量已经在下降。实际上，1957年美国与苏联的黄油产量几乎相等（美国的黄油消耗量比欧洲国家低二、三倍）。但在肉类生产上，苏联则远远落后于美国。赫鲁晓夫要在三、四年内消灭这种差距的号召是不现实的。

1957年，苏联的肉类产量是750万吨，按人口平均是36公斤；美国的产量是1,600万吨，按人口平均是97公斤。<sup>①</sup>这就是说，苏联的肉类产量要在三年中提高三倍左右。赫鲁晓夫将希望主要寄托于更多的饲料来源，特别是玉米的推广上，但当时他也似乎意识到了他的整个计划将不可能实现，赫鲁晓夫慷慨地把最后的限期定得很灵活。他在讲话中说：

“如果到1960年我们在肉类生产上仍然不能超过美国，这不算是悲剧，我们可以再延长一点，到1961年还不能解决问题关系也不大。但是到了1961年，我们应该是象俗话说的那样，进入收尾阶段，1960年之前，要把基础打好。所以现在就要立即行动起来。”

如我们现在所知，正是赫鲁晓夫这个对中央委员会来说如同对他的列宁格勒听众一样是新闻的讲话，直接导致了一个反对派的形成，并决心将赫鲁晓夫赶下第一书记的位子，赫鲁晓夫被视为一个不负责任的冒险家。这个反对派的核心，是赫鲁晓夫一贯的政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他们完全清楚，赫鲁晓夫的擢升是以牺牲他们为代价的。伏罗希洛夫出于畏惧，参加了预谋，连布尔加宁也表示默许。撤换赫鲁晓夫的计划，是在他和布尔加宁到芬兰访问期间策划的。赫鲁晓夫出访归来抵达莫斯科时。照例举行了官方的欢迎仪式，报上还

---

<sup>①</sup> 见莫斯科1959年版的中央统计局材料《1958年的苏联国民经济》，第469页。

刊登了主席团成员前往热情欢迎他的照片。然而第二天，他便不得不面对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的一次会议。

主席团的会议进行了三天左右，这期间，任何人均未离开过克里姆林宫的主席团所在地。经过激烈的辩论（这些辩论没有载入正式记录），赫鲁晓夫被以八票对四票的结果撤销第一书记的职务。赫鲁晓夫仅有的支持者是苏斯洛夫、福尔采娃和米高扬，第四票是他自己的一票。他拒绝接受这个决定，坚持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这个要求是合法的。因为党章规定，第一书记由中央委员会，而不是主席团选举或撤换。反对派集团对这一点也十分清楚，因而竭力阻挠中央全会的召开，并且打算如果赫鲁晓夫拒绝服从主席团的命令，就将他逮捕。

但是，长时间的秘密会议及会议的真实目的到底还是泄露出去了。如果会议通过的所有决议在开会的第一天就得以实施，那么这个反赫鲁晓夫的阴谋就可能得逞。但是，会议进行的第二天，已经有二十几个中央委员感到出了什么事情，来到克里姆林宫要求参加会议。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克里姆林宫的保卫工作，是由效忠于赫鲁晓夫的A·谢洛夫掌握的。反对派无法调动军队，因为军队的头头是朱可夫元帅，正是赫鲁晓夫为他恢复了权力和名誉。

这时，列宁格勒正在举行庆祝建城250周年纪念，许多州委书记前往参加庆祝活动。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费罗尔·科兹洛夫是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他一听说莫斯科发生的事情，便立即和其他一些中央委员赶到了莫斯科。当参加会议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就组成了一个以朱可夫、科兹洛夫和谢洛夫为首的特别纵队。为了使更多的中央委员能到莫斯科来，以加强他们的实力，朱可夫下令动用军队的飞机，到6月21日为止，已经有100多名中央委员集合在克里姆林宫，造成了不可能不召开中

中央委员会来讨论“赫鲁晓夫问题”的局面<sup>①</sup>。

全会于6月22日召开，几乎是不间断地持续了三十多个小时。这次辩论同样没有正式记录。据官方报道，全会听取了赫鲁晓夫关于“苏联党内形势”和莫洛托夫关于“苏联的国际地位的报告”。而实际上会议真正要决定的，是赫鲁晓夫的命运。结果是他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很多地区和加盟共和国的党的领导人早就是赫鲁晓夫的拥护者，他们感到赫鲁晓夫的领导给了他们更大的权力和自治。谁也不愿意恢复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组成的三驾马车的领导班子。年轻的党的中坚分子更反对任何恢复旧时的恐怖统治的可能性。中央全会彻底改组了主席团，将三个主要阴谋策划者及参与了阴谋的谢皮洛夫，不仅开除出主席团，而且清除出了中央委员会。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其他四个对赫鲁晓夫投了反对票的人，未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因为八个主席团成员突然同时被撤换，可能给人以即将发生危机或者搞了政变的印象。但是他们也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后来，策划者们的这次行动被定性为“反党阴谋”。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主席团，成员从十一人增至十五人，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们得到了报偿。朱可夫、费罗尔·科兹洛夫和其他一些人成为新主席团的成员。

反党集团的四位要人，没有受到在过去可能受到的严厉惩罚，他们即没有被送进监狱或集中营，也没有被秘密处决。经历了多次世界性外交会议的莫洛托夫，被派往蒙古当大使。曾主管全苏工业的马林科夫，被任命为中亚边远地区一个发电站的站长。一度曾充当乌克兰地区首脑的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

<sup>①</sup> 那时，中央委员会只有300多名，根据党章规定，人数超过三分之一以上即可召开例行全会。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水泥厂厂长。经济学家谢皮罗夫，在莫斯科的一所学院里当了教授。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通过这些相对来说比较轻微的惩罚，向人们表明，已经不再需要依靠恐怖手段来治理党或国家了。

其他对手此时也知趣地悄悄退却，赫鲁晓夫成了苏联党和国家唯一的、无可争辩的领袖。

1957年10月，正当朱可夫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时，赫鲁晓夫出人意料地解除了他的国防部长职务。这个决定，在朱可夫返程之前即已做出，后来才公开宣布。朱可夫回国时，机场上没有举行正式的欢迎仪式，他才感到一点不祥之兆。没有关于他的行为的任何指责，仅仅因为他在军队中的威望太高了，赫鲁晓夫担心会发生军事政变。官方只是简单地解释说，朱可夫犯有“波拿巴主义”的错误。

1957年10月，另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胜利也在等待着赫鲁晓夫——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一引人注目的成就，产生了惊人的影响，极大地提高了苏联的国防威望。苏联非常成功地向全世界表明，它在一个关键性的技术领域超过了美国。这是赫鲁晓夫不久前宣布的苏美“和平竞赛”中苏联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间接地说，这也是赫鲁晓夫个人政治上的一个胜利。这不仅是因为他对导弹技术给予了特别高度的重视，还由于苏联火箭的主要设计者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列夫，没有他，无论是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还是尤里·加加林的第一次宇宙航行，都将是不可能的。科罗列夫的研究小组，是斯大林时期在监狱里组成的。他在战前被捕，后来被送到可怕的科雷玛金矿集中营。他恰恰是因为在火箭技术方面的工作而被逮捕的——指控他忽视、并且因此而破坏了对一般飞机的研究工作。在战

争后期，当德国的V—2 S火箭显示威力时，火箭技术的潜力才开始受到重视。科罗列夫被准许在保安系统内部组织一个设计小组，但最初他是作为犯人在其中工作的。贝利亚被处决后，国家对保安系统进行了改组，废除了此类监狱科研中心，才使科罗列夫有可能得到释放，并被任命为苏联宇宙航行计划的主要设计者。

这样，到了1957年底，赫鲁晓夫已经在他的国家里作为毋庸置疑的最得人心的领袖而受到苏联社会各阶层的热烈拥护。未来的计划是很明确的——苏联将在农业、消费品生产、内部民主化、以及与各国改善关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等方面都迅速发展。这一美好计划的任何一点微小的标志，对人们来说都是重要的。举个例子来说，从斯大林时代起，就以法律条文规定了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建造房屋时，一定要修建地下防空洞。1977年以后，这种投资巨大的防空洞，不再是房屋建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显然，这是一个国家满怀信心地走向和平与繁荣的标志。

## 第八章 赫鲁晓夫操之过急

在经历了斯大林的作风之后——他习惯于在戒备森严的克里姆林宫高墙里工作和生活，态度冷漠高傲，使人无法亲近——很多人都喜欢赫鲁晓夫的平易近人，并且十分欣赏他在国内来往穿梭般的短期视察和引人注目的出国访问，以及连续不断的、频繁的讲话。赫鲁晓夫真的对人民敞开了克里姆林宫的大门。这还是自1930年以来第一次，普通公民可以自由出入这个地方，观赏著名的教堂和其他珍宝，只有某些政府机关的建筑不对公众开放。

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政策，对苏联的知识分子极有吸引力。较有生气的政治空气使他不仅在知识分子当中，而且在与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关系的工人、农民中深得人心。普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住房建筑的发展，以及苏联从与世隔绝的黑暗时代崛起——所有这些好转和变化，都十分恰当地归功于赫鲁晓夫的开放性的领导。



整个世界舆论都在注视着赫鲁晓夫，他的名字，天天在重要报纸上重复不断地出现。他的权力实际上也是无限制的。在布尔加宁1958年退出政治舞台之后，赫鲁晓夫即是部长会议主席，又是党的第一书记，实际上也成了一个独裁者。但他不是以恐怖的手段，而是通过在党内、部长会议和军队内的关键岗位上任用他在不同的时期亲自提拔过的人来掌握全部权力。这些人是他在战前、战争中或战后时期结识并且信任的，如检察院总检察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长、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中的大多数成员和许多州委书记等等。他们组成了国家领导机构中的赫鲁晓夫个人的“党”，他确信这些人将永远效忠并支持他。

所以，赫鲁晓夫敢于做出很多新的而且往往是出人预料的改革，而不必为可能引起某种后果的反对意见而担忧。斯大林也曾经屡犯错误，做出错误的判断或是执行罪恶的计划，而这些丝毫未能损害他的权力。因为凭借“个人迷信”的权威，任何针对他的阴谋都无法得逞（尽管他是始终处于这种阴谋的威胁之下）。到了1959年至1960年前后，围绕着赫鲁晓夫也形成了一种“个人迷信”。使他也可以犯错误，或做出估计错误的决策而不必顾及会因此而失去权力。赫鲁晓夫的观察者们不禁疑惑，他下一步还要干什么。但是在大多数苏联公民的眼里，赫鲁晓夫是一贯正确，不会犯错误的。

也有人批评赫鲁晓夫，可是这些人基本上是由于错误的理由来反对他的——斯大林培养的可憎的官僚主义者、军队高级领导中的不满分子，以及从此时已经不存在的工业部委中被撤换了的专家治国论者（这些工业部是被赫鲁晓夫的“下放”政策取消的）——他们都是赫鲁晓夫的对立面，尤其是最后一种人怨气最大。

1957年，许多专门的工业部委被取消之后，上万名机关干部，从莫斯科下放到苏联各地在“苏联国民经济会议”的地区中心经济管理委员会工作。被迫离开莫斯科或者哪怕是离开加盟共和国的首府，都是令人极不愉快的。习惯了首府城市丰富的文化生活和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后，很难适应省城（主要是工业城市）的清苦与单调。

赫鲁晓夫还取消了高级干部（如州委书记、中央委员、报纸主编等）的相当可观的月薪“津贴”。因此，尽管提高了他们的基本工资，实际收入还是有所减少。对其他领导干部（如研究所所长、各部局长和工厂副厂长等），不再配备司机，不再提供可以随意到任何地方去的专车。这些改革，使过去的既得利益者们感到不快，却受到了知识分子和一般群众的欢迎。他们认为，这些措施能够使领导更接近群众，作风更民主，有助于缩小干部与普通公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从而使权力金字塔的坡度减小一些。

大约就在这个期间，赫鲁晓夫以相当站不住脚的、含糊其词的理由和典型的突然袭击的方式，出人意料地将在中国工作的上万名苏联专家和技术顾问刻不容缓的全部召回。这些专家，是根据技术合作协议向中国派遣的。召回的借口，是中国对他们态度不好，监督过分，提出的意见、建议不被采纳。这些高级技术人员的突然撤退，使中国的经济受到破坏，这势必引起同中国领导人的冲突。连锁反应甚至波及到捷克斯洛伐克，因为中国被迫立即取消了已向捷克工厂预定的一大批订货。如果处理得当，本来可以避免与中国闹翻，可是苏联报纸却将这一事件誉为政治上的胜利。

此后不久，全世界又为之瞠目结舌地看到，当西班牙代表在联合国发言时，赫鲁晓夫竟然脱下鞋来敲打桌子。而这种大

喊大叫，却又被《消息报》（其主编阿朱别依是赫鲁晓夫的女婿）描述成是一个英雄的壮举。赫鲁晓夫不公正地指责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说他一贯纵容一个反对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的阴谋，这位领导人是亲苏的。卢蒙巴被暗杀时，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拒绝承认哈马舍尔德为联合国秘书长，并不与他发生任何来往。这个仅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做法，也不符合苏联的一贯立场，因为苏联曾对哈马舍尔德的当选给予过坚决的支持。后来，由于哈马舍尔德在刚果的飞失机事中不幸过早去世，才使得因为赫鲁晓夫态度的突变而引起的联合国的一场即将爆发的危机得以平息。这种突然的态度上的转变，再一次在苏联得到赞扬。

赫鲁晓夫还曾二次挑起“柏林危机”，建造柏林墙，就是第二次危机的结果。但还并没有损害其国内与国际的威望。他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冲突中，获得了和平创造者的全面赞誉。其实，是他向肯尼迪总统投了降。

不仅在外交事务上，而且在国内政策上，赫鲁晓夫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使全权。他的身上理所当然地笼罩着一贯正确的光环——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的指示是不会错的。同时，对高级干部的接二连三迅速地更换与重新任命，防止了反对派集团的形成。赫鲁晓夫推行其计划的速度，常常不给任何人以时间预测或估价可能产生的后果，况且，几乎党的领导提出的所有计划，都会得到“全国范围的群众讨论”的广泛支持。甚至在1953年至1957年期间应该按期召开并起重要决策作用的中央全会，也变成了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大厦里举行的大规模群众集会。成千位知名人士、党的工作者和积极分子被邀请出席。这种会议形式，使任何严肃的反对意见都难以提出。

凭着这样的威望和政治机敏，赫鲁晓夫怎么可能、又怎么

会被赶下台呢？

西方舆论常常把赫鲁晓夫的下台描写成传统“权力斗争”的结果，如同贝利亚、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其他人当年被撤换一样。这是一种不完全、不确切、甚至是不正确的解释，但这也是与赫鲁晓夫个人的看法相吻合的。直到生命结束之前，他都未能意识到，正是他自己的错误判断使他失去了权位。后来，这样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他的每一个行动不再是毫无例外地被称之为“伟大胜利”，而甚至开始可以使用“错误”这个字眼了。

## 机械—拖拉机站——事与愿违的结果

赫鲁晓夫几乎是在一年之内发起并完成了的一项最激进的农业方面的改革，也是他在判断上所犯的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取消国营机械—拖拉机站，并将全部的农业机械设备转交集体农庄。从表面上看来，这项改革是1950年集体农庄实行合并之后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

在开始实行合作化时，小集体农庄还不可能购买和有效地使用它所需要的全部农业机械，政府也不想让集体农庄独自掌管这类设备，从而掌握全部农业生产资料。所以，创办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农业单位：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和机械—拖拉机站。

1950年，集体农庄合并之后，一般仍然是一个拖拉机站为几个农庄服务。但是，也有一个拖拉机站只为一个大农庄服务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将两个单位统一起来管理似乎是很自然

的。1957年，在一个大农庄往往有几千公顷土地的斯塔克罗彼尔地区，对十二个拖拉机站做了试验性的合并，这些拖拉机站都是各自只为一个集体农庄服务的，合并后，农庄主席同时担任为该农庄服务的拖拉机站的站长。试验结果表明，这样做可以更有效地使用机械设备，农业劳动的质量有所提高，也简化了经营管理，因为不再需要在地区一级为农庄和拖拉机站之间进行协调。

尽管斯塔克罗彼尔地区的试验证明合并是可以的，但是还有其他许多细节需要加以考虑，还应该在情况不同的地区进行其他试验。例如在一个拖拉机站不是只为一个农庄、而是同时为几个大中型农庄服务的地区进行实验。<sup>①</sup> 在一个拖拉机站只为一个大农庄服务的情况下，不需要对设备、机修车间和职工住宅进行任何复杂的调整，即可简单地将两者合并。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

由于受到斯塔克罗彼尔地区试验结果的鼓励，赫鲁晓夫想入非非地对合并产生了一系列主张。这些本来都是初步的设想，需要经过深思熟虑和进一步的试验。但是，赫鲁晓夫没有耐心等待，几个月之后，在他的催促下中央委员会发出指示，命令机械—拖拉机站将所有的设备移交给集体农庄。

赫鲁晓夫过去曾经说过，机械—拖拉机站的调整，要逐步地、有选择地进行，不能立刻普遍推广。而只能在能够完好地使用这些机械的农庄和每个拖拉机站只为一、二个或三个农庄服务的地区实行这种合并。在集体农庄规模较小、效率较低的

---

① “大型集体农庄”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其面积因地区而异，要看是在哈萨克斯坦，在斯塔克罗彼尔地区（南方），还是在乌克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地区（北方）。一个“大农庄”的土地多可达二万公顷，少则为五、六百公顷。位于东部和南部的集体农庄，一般比中部和北部的大得多。

中部、西部和北部地区，这种改革要在几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再着手进行。<sup>①</sup>

但是，在1958年3月，恰恰是赫鲁晓夫无视自己关于要稳步前进的忠告，实际上是借助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强迫加速推行这项计划。改革进行了三个月之后，大多数机械—拖拉机站被取消了。与原计划不同的是，不是集体农庄与拖拉机站实行合并，而是要求集体农庄从政府手里将机械—拖拉机站的设备买过来。这意味着政府花了数十年时间才积累、支付了的这些设备，现在却指望集体农庄在一年之内就买下来。到1958年底，80%以上的农庄（包括穷的和比较富裕的）都被迫买下了拖拉机站的设备，而不再需要拖拉机站的服务。其他20%左右已经负债累累的极端贫困的农庄，根本买不起任何机器。但是中央委员会指示，这些农庄就是贷款也必须买机器，以防止他们滋长“依赖别人的思想”。这样，到1957年1月，几乎所有的机械—拖拉机站都撤销了。8,000个拖拉机站仅剩下345个，到1959年底，就仅有34个了<sup>②</sup>。结果，赫鲁晓夫关于需要几年时间来实行合并的比较明智的估计，被荒谬地缩短到不满十二个月。

这种与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法令相冲突、忽视一切具体情况的、鲁莽的紧急措施，势必给经济工作和组织工作造成巨大损失。从理论上来说，根据机械设备的出厂价格计算的全部拖拉机站设备的帐面总值，仅相当于国家收购集体农庄农产品价值的

① 见莫斯科1964年版赫鲁晓夫：《论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第三部分，第131—132页。

② 见1962年莫斯科版的中央统计局材料《1961年的苏联国民经济》第291页。

17%，于是据此假设强令农庄购买机械—拖拉机站的设备是可能的，农庄不会因此而破产。

但是实际上，情况要复杂得多。除了机械 设备 本身的费用，集体农庄还要花很大一笔钱建造新的机房、油库和修配厂等，过去由政府发给工资的机械工人，现在也要由农庄来支付薪金了。

法律条文规定，用于购买拖拉机站设备的款项，可在三至五年内分期偿付。但在开始实行这项计划时，一些富裕的集体农庄发起“竞赛”，要在一年内将收购款全部付清。赫鲁晓夫对这种“积极性”大为赞赏。在这样的无形的压力下，几乎所有集体农庄都在这个时间内偿清了欠款。为了做到这一点，许多农庄不得不取消其他的计划项目，停止了已经开始的工程，推迟购买畜牧业设备，甚至挪用工资基金，或动用于完成粮食生产任务的部分周转资金。<sup>①</sup>

拖拉机站设备的销售工作组织的很糟糕。集体农庄自然要先买那些用的不太久的较新的机器，谁也不愿意要破旧的拖拉机和卡车，何况新旧机器的售价又都一样。按照一般的逻辑，使用较久的设备应该售价较低，甚至无偿赠送。但是政府不允许这种慷慨。结果，集体农庄被迫以同样的价格，将新旧机器一并买进。

另外，赫鲁晓夫在最初的提案中关于拖拉机站设备总值与集体农庄“收入的比较”的初步估计，也是极不准确的。过去，国家生产某一种机械设备，然后发货到拖拉机站时，或是收取相当于工厂生产成本的资金，或是随便制定一个价格。而当这同一种机械再卖给集体农庄时，却又规定了一个平均相当于从

---

<sup>①</sup> 见1965年版《经济问题》第6期，第5页。

前价格两倍的“新批发价”。这样，集体农庄就不是以政府所付的原价，而是被迫以武断规定的新的商业价格来购买这些机械。汽油、润滑油和零件的价格同时上涨两倍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仅以速度而言，取消机械—拖拉机站的计划完全可以说是成功的。但如果要评价它是否使农业状况得到了改善，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一做法的消极影响，在1959年，1960年就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本来是可以通过对整个计划做通盘的认真考虑而加以避免的。农业生产由此遭受的损害是长期的，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机械—拖拉机站的“改革”，造成了如下恶果：

1. 集体农庄由于要花费大笔钱财购买机械设备，而不得不取消或者推迟许多计划内的重要项目，尤其是建立新的奶制品厂和使畜牧业现代化的计划项目。

2. 集体农庄没有足够数量的、经过正规训练而能有效地使用这些农业机械的技术员。过去曾在机械—拖拉机站工作的司机和驾驶员有50%离开了农业岗位。当然也有少数人愿意按照新的做法加入集体农庄，但是多数技术较高的职工在城市或工业城镇找到了工作，经常往返于自己住的村子或工作过的拖拉机站与目前的工作单位之间。

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机械—拖拉机站的工人是国家职工，与集体农庄庄员在地位、工资等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造成的。集体农庄也许可能维持这些工人的原工资水平，但无法保证他们在拖拉机站工作时所享有的法律上和社会地位方面的特权。例如，拖拉机站的驾驶员作为“兰领”体力劳动者，持有国内通行证，可以在苏联国内随意流动或找工作。他们计算工龄，可以领取国家发的退休金，享受公费休假和其他



许多工会工人的权力。这些待遇，是实际上被束缚于一个地方的集体农庄庄员在1958年时还没有享受到的。

为了制止技术劳动力外流，政府采取了一些补偿措施，以使集体农庄的生活较有吸引力。如给农庄庄员退休金和假期，允许拖拉机站驾驶员为农庄工作而不必加入农庄作为庄员，等等。但这些措施实行的太晚了，很多工人已经离开了农村，找到了别的工作。

3. 在缺乏经过训练的人员管理机器的同时，又没有时间建造放置新机器的库房，结果使农庄的机械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失修和使用过度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4. 实施这项计划的一个意想不到，然而却是灾难性的恶果，是突然引起了苏联庞大的农业机械工业的危机。直到1958年，生产拖拉机和收割机等农业机械的工厂，都是根据国家计划指标进行生产，然后将产品运送到指定的机械—拖拉机站去。可是在1959年之后，机械—拖拉机站已不复存在，集体农庄要自行采购机械。而农庄的基金都已用于购买拖拉机站使用过的旧机器上，农庄也没有经过训练的能从工厂直接购买机械的有鉴定能力的专职采购员。因此，工厂的销售额大大下降。为了防止生产的衰落，制成的机械被运往新开垦的处女地或者用于出口。尽管如此，由于卖不出去的机械开始在工厂大量积压，农业机械制造业惊人地衰退了（见附表）。

甚至直到1971年，运到农村的联合收割机的数量仍然仅相当于1957年数量的二分之一弱。青贮饲料收割机的产量，在1957年至1960年期间下降到原产量的四分之一的水平。用拖拉机牵引的犁耙、播种机、中耕机、割草机和打捆机的订货也有减少，有些机械的发运几乎完全停止了。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很多。新机械的使用指数猛跌，而机械损坏的百分比却在增加。

结果，使苏联在1958年至1961年期间的农业机械总数第一次在和平时期有所下降。造成仅仅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就缺少420,000台拖拉机、76,000辆卡车和136,000台联合收割机的情况——这些农业机械都是取得良好的农业收成所不可缺少的。集体农庄现有的机械，只能完成实际工作量的26%——48%。<sup>①</sup>由于缺乏机械动力，大多数农活几乎都要拖延。集体农庄长期缺钱买机器，只得向国家银行贷款，却又无力按时偿还。他们对银行的负债不断增加，到1961年，已超过20多亿卢布——大于赫鲁晓夫1957年估计的所有拖拉机站设备的总值。因此，不仅农业，而且整个农机制造业这时都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5. 没有足够的机械修配厂。机械—拖拉机站被以法律形式取消时，曾预计（预计是唯一可以使用的字眼）原有的8,000个拖拉机站，需要建立约4,000个国营拖拉机设备修配厂。但这些修配厂一直未能很好地建立起来，所以1961年做出决定，机械在集体农庄就地修配。约一万个大型集体农庄能够建立自己的修配厂，34,000个农庄没有修配厂，只能敷衍了事地进行一些整修。<sup>②</sup>为防止非正规的机械师乱修农业机械，国家在一些农业区有选择地建立了技术服务站。许多离开拖拉机站到城市去工作的机械师，这时又回到了服务站，这当然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直到1964年，他们也只能满足修理任务需要量的一半。<sup>③</sup>甚至到了1965年，集体农庄和新建修配厂的技术机械师的总数，仍少于1957年集体农庄和拖拉机站任用的机械师的数目。<sup>④</sup>

---

① 见莫斯科1972年版《战后时期农业的发展》第339页。

② 见1973年4月6日《经济报》。

③ 见《农业经济》1965年第5期，第30页。

④ 见《1958年和1965年的苏联国民经济》。

以上这些计划得很不周密，又不负责任地加以“实施”的“改革”的恶果，只是在后来开始稍微降低农业机械、汽油、零部件和卡车的价格时才被承认。但是降价的幅度太小，起不到什么作用。1964年第二次降价之后，价格仍然很高。为买一个白俄罗斯牌小型拖拉机的四个轮胎，农民要卖十三吨小麦。

由此看来，赫鲁晓夫这一根本性的农业改革是一个失败，它非但没有提高农业生产力，反而使之大大下降了。

(附表格)

农 用 拖 拉 机	1957年拖拉机站购买的机械 258,000 (台)	1959/1960年集体农庄购买的机械 236,000 (台)
小麦黑麦联合收割机	134,000	53,000(台)
一 般 卡 车	125,000	66,000
粮 食 烘 干 机	13,000	900
玉 米 联 合 收 割 机	6,000	200

## 第九章 梁赞州的惨败

也许，在赫鲁晓夫的农业和经济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最不为人所知，但无疑是最悲剧性的事件，恐怕要数令人难以置信的“梁赞”惨败了。梁赞是一个面积约18,000平方英里的农业州，其首府在莫斯科东南约115英里处。我们将在本章中看到，行政首脑的政治欲望，怎样把这个不幸的州实际上引向了经济崩溃的境地。

在党和国家机构中注意观察赫鲁晓夫的人们看到，除了重要岗位上任用自己的亲信、对他忠实的私人朋友和过去的老部下之外，他还迅速地提拔了一批执行他本人的思想路线，并在领导工农业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的革新家。如奥伦堡州州委书记G·I·沃罗诺夫，在该州超额完成粮食生产指标后，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沃罗诺夫把超额完成任务的原因归功于采用了一项“新的农业技术”，到秋耕后不再种庄稼。然而这项“新技术”第二年就被证明无效了——奥伦堡

州的“成功”只维持了一个季节。但这时沃罗诺夫已经青云直上，被提升为整个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农业监察员。

我们已经知道，赫鲁晓夫1957年5月所做的鼓动全国在三、四年内超过美国的肉、奶和黄油产量的讲话，使他险些在1957年6月的中央全会上丢掉乌纱帽。但那时政治上的冲突掩盖了畜牧业方面的问题。现在，赫鲁晓夫要来对付所谓“不负责任”和“冒险主义”的指责了。他要使那些批评者收回他们的谴责之词，要证明他提出的目标是现实的、可行的，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有野心、企望得到晋升的党的干部，显然可以通过在肉类生产方面取得突出成绩来博得赫鲁晓夫的欢心。

1957年和1958年畜牧业产量的微弱增长，使赫鲁晓夫十分恼火。这似乎是为他的批评者们的怀疑主义提供了佐证。

一个显然被忽略了的事实是，苏联在1957年还缺乏加速发展畜牧业的相应的资金。尽管国家在1953年以后大幅度提高了畜牧业产品的价格，但所有农业地区的生产成本增长得更快。造成生产成本高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机械化程度不高，缺少现代化的大型畜牧业设备以及饲料不足。国家制订的肉类零售价格较低，赫鲁晓夫又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决定不提高售价。因此，尽管1957年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把肉类卖给国家时得到的钱比1950年至1953年时多，但这种较高的收入并没有带来实际的利润，而没有盈利，就很难增加饲养的牲畜头数。这样下去，多养牲畜只能意味着增加农场和农庄的财政损失。因此，为了达到上级规定的肉类生产的更高指标，多数农庄只得向国家申请补助。

1957年时，畜牧业生产仍然以手工劳动为主，全部劳动量中仅有5%使用机械。在这种情况下，预期畜牧业生产将迅速增

长是不现实的。1958年，肉类产量只提高了5%，而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增长60—70%。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不能容忍这样不良的开端。所有的州党委会都接到命令，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以使1959年的情况大为改观。在这个关键时刻，梁赞州委第一书记A·N·拉里奥诺夫在个人野心的驱使下，做出了十分大胆而激进的允诺，保证要在1959年使梁赞地区的肉类产量增长二倍。

这个保证，是投赫鲁晓夫之所好，正因为如此，也引起了赫鲁晓夫的重视。他答应对梁赞州要亲自给予支持，使他们不仅能够达到，而且还要超过既定的指标。赫鲁晓夫还对拉里奥诺夫个人许了一些愿（据谣传，赫鲁晓夫答应让他当俄罗斯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拉里奥诺夫召开了梁赞地区的农业积极分子大会。他们头脑发昏地提出了更高的指标。梁赞州集体农庄的肉类产量将提高五倍，国营农场提高近四倍，出售给国家的肉类增加三倍。1958年，这个州卖给国家的肉类是48,000吨，现在保证1959年向国家出售150,000吨。

《真理报》的编辑没有兴趣报道梁赞的这些新指标，中央委员会中负责农业事务的人也认为这是浮夸，是难以实现的，因而反对公布。但是，赫鲁晓夫直接下了命令，1959年1月7日的《真理报》上终于刊登了这些保证。赫鲁晓夫以梁赞州所保证的高指标为依据，这时便要求其他州步其后尘，将他们的较有节制的指标进一步提高。计划于1959年1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将讨论通过《苏联七年发展计划》中的农业部分，极为雄心勃勃。赫鲁晓夫力图使七年计划的头一年就取得惊人的成绩。在这种压力下，许多州开始对指标的数字进行修改。斯塔克罗波尔地区允诺说，在1959年将肉类产量提高150%，克拉斯诺达尔地区做出了同样的保证。莫斯科州

和白俄罗斯共和国则保证使肉类的产量翻一番。

赫鲁晓夫没有忘记要给梁赞州以特别支持的许诺，他在党代表大会上多次高度赞扬梁赞人民的“辉煌的起点”。梁赞州要完成指标的努力几乎还没有开始，就被淹没在各种奖状和鼓励之中了。1959年2月梁赞州被授予列宁勋章，赫鲁晓夫还亲自前往授勋。

但是，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在一年的时间里如此大幅度地提高肉类和奶制品产量，或是增加牲畜的头数，都纯属无稽之谈。牲畜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充分育肥而使总重量上升。国家一般在秋季开始收购肉类，所以，从一月份才全面开始这项运动，显然是太晚了。但过分的宣传以及赫鲁晓夫的亲自参与，使任何退却都成为不可能的了。

为了使肉类加工厂的产量提高四至五倍，就要大批屠宰牲畜，几乎需要杀死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全部的猪和牛，而这是违反苏联法律的犯罪行为。但梁赞州党委下令，不仅肉用牲畜，而且奶牛和用于繁殖的种畜，都要宰杀。成千上万的奶牛和猪，被从农民手里强迫“购买”下来，变成了州的牲畜。州的组织甚至常常不付给集体农庄现金，只给票据，保证将来偿付（而且写明不是以市场价格偿付）。

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也还是不能解决问题。梁赞的农场和农庄负责人不得不到邻近的州去购买牲畜，有时甚至要远行到乌拉尔地区。梁赞的采购人员在这些州的市场或农庄用现金购买了牲畜，回到梁赞后，仅以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价钱再将牲畜转卖给国家。本应用于农业机械、信贷或其他目的的资金，被非法挪用来购买牲畜。但就是这样，增产五倍的指标也未能达到，同样处于高指标压力下的邻州领导，发现梁赞在“突击”抢购牲畜，便下令警察封锁交通要道，夺回梁赞“采

购员”非法买去的牲畜。这些采购员后来只得避开主要道路，在夜里偷运牲畜。

破釜沉舟的梁赞州党委采取的另一个措施，是规定所有的税收必须用肉类支付。不仅对农庄和农民强行征税，而且所有机关、学校、以至警察局都要交税。有些人只好开始养兔。工厂和机关先把钱收上来，派人到商店去用1.5至2个卢布一公斤的价格买一些肉，然后把肉拿到政府收购站去，再以25—30个戈比一公斤的价钱卖给国家。黄油也是如此，有时在商店和收购站之间一批黄油来回周转好几次（因为卖给国家的黄油经过收购单位冷冻后，还可以再发货到商店里）。很快，全州的商店里就再也见不到肉类、牛奶和黄油了。到这年年底，牲畜的数目也大大减少。

就是这样，梁赞州的领导人还在1959年12月16日，预定的中央全会召开的前几天，匆忙地庆祝了他们的所谓“胜利”。几乎所有的主要报纸都刊登了他们给赫鲁晓夫的公开信。这封由梁赞州党委会、州执行委员会、州共青团委员会签署的信件，吹嘘该州已完全实现了他们的诺言，将肉类产量提高了四倍，卖给国家15万吨肉类，相当于1958年数量的三倍多。他们还利令智昏、自欺欺人地说，该州在1960年将卖给国家更多的肉类，数量要达到18—20万吨。

为了表彰拉里奥诺夫的卓越成就，他被命名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并被授与列宁勋章，在整个中央全会期间，一直受到大力的称赞，尤其是赫鲁晓夫本人更是如此。重新印刷的学校课本里，也加上了描写梁赞州“辉煌功绩”的新段落。

1960年，梁赞州的领导们继续得到授奖和表扬，而该州的农业却面临着崩溃。因为要完成1958年的数字指标而对牲畜进行了残酷的宰杀，使得畜群数目减少很多，而这时，数目仍在继



续缩减。农民的猪或牛被“暂时借走”，而只得到一张收条。他们因此拒绝干活儿，直到要回一头牲畜，或是得到以1960年的市场价格计算的现金（自1959年以来，市场价格已上涨了二至三倍）。这时，把牛还给农民更有利些，所以牛又从集体农庄的畜群中回到了农户的自留地上。集体农庄的财政资金已经枯竭，根本无钱偿还银行贷款。地里的农活儿进展迟缓，已经可以预见收成将很不景气。卖给国家18万吨肉的保证成了泡影。这个州，甚至已经穷困潦倒无法达到以往交交给国家的肉类数量的一半，而只能达到3万吨，是他们所保证的18万吨数量的六分之一。此外，梁赞州的粮食指标也只能完成50%。说穿了，很多集体农庄其实早已破产了。

这种局面终于再也无法掩盖下去了，1960年底，中央委员会派了一个专门代表团到梁赞州进行调查。结果，证实了最坏的情况——梁赞州的农业糟得一塌糊涂。就在梁赞州党委预定召开全体会议的前一天，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拉里奥诺夫，在党委机关他的办公室里开枪自杀了。

由于仿效梁赞州的“榜样”，使苏联其他许多州也蒙受了重大损失。1960年，全国的肉类产量下降了20万吨，直到1962年，才开始略有回升。<sup>①</sup>

梁赞州的惨败及其造成的后果，严重地损害了赫鲁晓夫的名誉。“三、四年内在肉类产量上超过美国”的空头口号，这时完全成为一个笑料，从党的文件中删去了。新版的赫鲁晓夫言论集中，或者没有包括1957年他在列宁格勒的讲话，或者将有关赶超美国的部分删除了。其他讲话中引用的未能实现的生产指标，也被删掉，或者改换成了较为现实的数字和关于提高产

---

<sup>①</sup> 见莫斯科1963年版中央统计局材料《1962年的苏联国民经济》。

量的一般性号召。这种伪造和篡改，尽管无人加以评论，却绝不是不为人所知。

1959年至1960年全国范围的“梁赞试验”的后遗症，持续了很长时间，甚至直到1964年，赫鲁晓夫掌权的最后一年，肉类产量仍低于1959年，鸡蛋和羊毛的产量也比1959年低。<sup>①</sup>

1957年至1964年的肉类产量，从每人每年平均37公斤仅提高到40公斤。而美国1961年的肉产量是每人平均100公斤。两国在家禽产量上的差距则更大。直到1972年至1974年期间，苏联肉类产量按人口的平均数仍低于美国的一半。由此可见，赫鲁晓夫在1957年提出的“三至四年超过美国”的计划是多么不现实。

---

<sup>①</sup> 见莫斯科1965年版《1964年的苏联国民经济》，361页。

## 第十章 苏美制度的联姻

美国工农业的发展，一直使赫鲁晓夫感到新奇有趣，同时产生了相当的羡慕之心。他一再试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从美国看到的许多事物应用于苏联。对美国工农业成就的赞赏，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下决心改善两国关系，结束冷战。赫鲁晓夫在外交方面的主要贡献——“和平竞赛”的政策，以及在苏联国内实行的民主改革，尤其是对斯大林恐怖统治的受害者给以昭雪平反，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他与西方改善关系的诚意有了信心。尽管后来不时仍产生一些分歧，甚至是紧张局势，但赫鲁晓夫在这一问题上态度的转变，无疑是他对人类幸福的一个重大贡献，一个远远超过了他的许多缺点与错误的贡献。

苏联在日常生活和工农业生产中一些较为次要与孤立的方面所进行的“美国化”与“欧洲化”的尝试（如本书第四章中所述），几乎都是成功的，而且流行至今。但是赫鲁晓夫搞的几

项重要的基本改革，企图在不改变政府垄断和党的专制的情况下，将欧美的“自由竞争”与“自主经济”的原则，运用到中央集权的苏联经济中去，结果产生了全国范围的消极作用，使得国家实际上陷于一种停顿状态。在创造较为“自由”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允许经济积极性充分发展方面，赫鲁晓夫没有能获得成功，而他频繁而狂热地对人员、地点、事物的重新调整与组织，与其说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推动，毋庸说是障碍，赫鲁晓夫在几个方面试图将苏美制度融合起来的这种尝试，值得在此做一番探讨。

## 对工业的震动

大规模生产消费品，在商店里摆满千百种在别的国家司空见惯、而苏联却不曾生产过的新型产品，是对苏联经济的一个挑战。苏联的经济体制是集中管理，从一个小别针到蒸汽轧机的生产，都要受国家计划委员会控制，受政府有关部、局领导。这种管理体制，在生产重要工业项目方面是成功的，如制造大马力涡轮机，制造军用及民用飞机、船只、武器装备、原子弹、氢弹、反应堆，以及钢铁、煤炭、石油、木材和其他原材料的生产。但是大规模生产种类繁多，而且每个品种相对来说规模又不大的不同类型的消费品，如服装、文具、家用器具等，情况就不同了。计划委员会实行的集中管理，这时便显得极为笨拙了。

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不直接组织国家工业体制，经济是分散的、自治的。苏联在使国家迅速转变成成为工业强国，具有

强大的重工业方面，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在生产较高的生活水平所必需的消费品和提供服务方面，它却无法与资本主义经济竞争。由于企图用集中管理的典型苏联方式来解决，使以莫斯科为中心的部委猛增起来，原来的一些部门被解散了。官僚主义的中央机构不断扩大，却不见取得实际的经济效果。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是否应该再实行一次“新经济政策”，是否应该发展地方小型工业，甚至允许私人开业，以便生产国家计划委员会不予重视，而农民家庭却很需要的小型商品，如运货车、手推车、车轮、雪橇、车轴、车轭、马掌、干草叉、炉钳铁、木炭等等，可是在1956年，私人企业的观念还不能为人们所接受，这样的经济改革会显得过于激烈，甚至几乎是“反社会主义”的了。

## 国民经济委员会

为了不完全背离已经确定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原则，赫鲁晓夫提出，在国防和其他关键性的重工业部门继续实行中央控制。所有其他生产部门，尤其是消费品的生产，应该取消以莫斯科为中心的部委的控制，将管理权下放到在各州建立的州一级专门地方经济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工作，受在主要工业区设立的同类上级机构和最高经济委员会的监督指导。在二十年代，为了发展地方经济，曾经成立过这样的委员会。现在又采用这种做法，为的是使管理与生产联系得更密切，减少官僚主义，并鼓励地方的积极性与竞争。

各州的党委会，因这种改革扩大了他们的权限而表示欢迎。过去，他们只能负责农业、地方小工业和服务部门；现在，一个州党委会即掌管地方经济委员会，又负责本州范围内的全部工业。但是州委书记仍无权过问任何位于他州内的国家重要军事或工业基地，这些基地的负责人是由莫斯科直接任命的。

这项新的改革，得到了州委书记为主要成员的中央全会的热烈拥护。莫斯科的官僚特权者们则持反对态度，尤其是因为这种做法，将使数以千计的部委人员失去他们在首都的职务，而不得不迁到各州去组建新的经济委员会。经过一个月全国性的讨论之后，这项新的改革措施于1957年5月由最高苏维埃通过，成为法令。

## 效 果

这样全面的工业改革，不言而喻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应该经过几个州若干年的试点后，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报刊上对改革计划的种种分析，不能代替实际的尝试。这样的改革其实也很难使消费品的生产得到迅速发展。在美国之类的工业国里，权力下放意味着不受华盛顿的控制，但绝不是—一个州一个州地解体，或是使工业管理附属于各州的官僚机构。

小型的州经济委员会之间，没有产生象在极复杂的官僚关系网中出现的那种竞争，因为大工业区的下属机构分散在不同的州和地区，附属于不同的部门。例如，一个位于伏尔加格勒经济委员会管辖区域内的，过去属于拖拉机制造部（此时已被

取消)管理的拖拉机厂的生产,要受分散在十几个州的工厂的牵制。过去一个厂的厂长可以通过有关的部协调其生产活动。而现在,他要同从属于十几个不同的经济委员会的企业打交道,而且往往一个委员会就可以打乱整个厂(如伏尔加格勒拖拉机厂)的生产计划,影响它所需要的零部件的供应。因为与此同时,首先要保证供应当地工厂,无政府状态开始在生产当中蔓延,阻碍了专业化的实行。许多工厂开始自己生产过去可以很容易就从其他州以较便宜的价格买到的零件。

地区经济委员会的设立,只略微有助于改进地方小型企业的经营,对专业化大工业的发展则起了阻碍作用。这一点,在改革实行后一年,即1958年,就已经表现出来。于是1959年又决定,将若干小的州经济委员会合并成几个大的委员会。例如,莫斯科委员会代替了邻近较小的卡卢加、图拉和加里宁州的委员会,新亚伯利亚委员会包括了整个西伯利亚西部地区的鄂木斯克、托木斯克、克麦罗沃和附近的州。在这些联合委员会之上,又建立了中心委员会,如乌克兰经济委员会、俄罗斯共和国经济委员会等。最后,又成立了最高经济委员会。但是仍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需要恢复各个工业部门的一些全国性的规章制度。各类工业部门的全国性委员会,又开始在莫斯科出现,在很多方面实际上重新发挥着以往的作用。这些委员会的主任,以部级干部的身份参加苏联部长会议。其结果,到1963年时,管理工业的官僚机构,不仅没有象“权力下放”的设想所希望的那样有所精简,反而几乎扩大了三倍;非但没有形成美国式的竞争,反而产生了重叠、平行、责任分散等恶果。现代化的速度减慢了,短缺产品更多了。同时仓库里却堆满了被消费者嗤之以鼻、卖不出去的过时产品。工业管理体系由于管理部门的繁多而变成了错综复杂的迷宫。影响日常生产

的紧急问题，往往要等数月才能得到答复。这样的“新工业管理体制”，把国家引入了死胡同，而且看不到明显的出路。

## 对科研机构的改革

由赫鲁晓夫提倡进行的，对科研机构的改革和“权力下放”，多少还是比较成功的，直到1953—1954年，几乎所有新的科研机构都是建立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等几个大城市里。矿业、石油、渔业、森林、海洋学等科研机构也都设在莫斯科，尽管这些应用科学的专门分科与莫斯科的联系是非常微弱的。赫鲁晓夫将许多这样的机构迁到了与其有关的工业集中的地区。这毫无疑问是前进了一步，而且苏联报纸公开对这项改革计划进行了全国性的讨论。这是一个新的民主姿态。但是报界在审查可供开展讨论的主题方面，保持着相当的谨慎。在赫鲁晓夫时代，许多专业性的小型科学城镇，在莫斯科附近以及更边远的地区建立、发展起来。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莫斯科州境内、靠近新西伯利亚和杜布纳的“科学城”。大约有十个这样的城镇先后兴起，如普布金诺、奥布宁斯克、切尔诺戈洛夫斯克等。这也是受西方影响的一种反映，在西方，一些小型的科学城和大学城，如剑桥、牛津、伊韦特研究所，海德堡市、伯克利及其他许多城镇，其中不少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赫鲁晓夫有些过于简单地认为，西方的学者和科学家的工作之所以卓有成效，是因为他们被安静地隔绝于大城市的喧嚣吵闹之外，享有舒适的生活环境，因而可以全力以赴地从事科学研究。在苏联，距大工业中心40—100公里的地方建立这样



的科学卫星城，的确是个好主意，尤其因为这样可以为年轻的科学家们提供较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年纪较大、已有建树的科学家往往不愿离开莫斯科或列宁格勒）。

后来，这些科学城镇吸收了大批有创见的知识分子，成了不同政见和独立政治思想的中心。在进行最高苏维埃、各加盟共和国或地方苏维埃的选举时，这些城镇的否定票数一般比全国其他地方略高<sup>①</sup>，所以，从1968年前后，开始放松了对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城市建立新的科研机构限制。安静的科学中心被逐渐改造成了相当规模的工业城镇，人口组成中也掺合进了一定数量的工人。

## 对农业的震动

赫鲁晓夫根据他所获得的关于美国农业的大量情报，和他的美国农业界朋友的建议（其中最知名的是衣阿华州的农场主罗斯来尔·加斯特，他经常访问苏联），以及赫鲁晓夫本人1959年秋天访问美国时对农业的观察，使他感到，一个农场主可以独自决定怎样经营自己的农场，是调动积极性的重要方面。他

---

① 进行这种选举时，每个候选人只有一个提名供人投票。选民们虽然对候选人本人无法选择，但是他们确有另一种选择方式——将选票投入票箱（甚至不需要在名字旁边注明“赞成”）以表示同意；根本不投票，或者将选票投入票箱前，把选票上的候选人的名字划掉，以表示反对，这种投票方式根本不是什么“无记名”，因为要划掉候选人的名字，投票者必须到一个特殊的隔间，当着选举委员会的面，将否决票投入箱内。结果一般来说，99.8%的选票都是赞成票，而在这些科学中心城，约有1%的投票者到特殊隔间去划掉他们所不满意的候选人的名字。

清楚地看到，美国农业部对农场主没有绝对的控制权，而只能通过实例、示范、推荐和建议等，对他们间接地施加影响，一切最终决策都是由唯一真正了解怎样做对农场最有利的农场主本人做出的。在这一情况的启发下，赫鲁晓夫对制订农业计划的步骤做了全面修改。

赫鲁晓夫执政时，每个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都分配给了详尽的生产计划，具体规定了每种作物的耕作量，应交给国家的数额和要交给机械—拖拉机站的实物量等等。这种“上面来的”计划，往往根本不考虑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但是在集体农庄被迫将其产品无偿交给国家，而农庄庄员从劳动中几乎一无所得的体制下，“来自上面”的强迫性计划是唯一可行的。因为农民的利益总是取决于一个最起码的生产计划。

经过1953—1954年一系列旨在提高生产积极性的改革之后，中央委员会宣布，国家只保留制订各类产品指标的权利，整个生产规模、土地耕作面积、牲畜头数和耕作方法，可以由农庄自行决定。超过国家规定的征购指标的多余产品，可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农庄庄员的收益，根据工作日劳动量的比例进行分配。这样，对集体农庄就有了切实的“物质刺激”。

这种含有“自由企业”因素的新做法，对1955到1958年期间农业方面取得的成绩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1959年起，开始推行不切实际的“七年计划”以后，新的计划体制被取消了，农场和农庄又被“来自上面”的详细计划束缚起来。这些计划具体规定了播种面积、牲畜头数、作物种类以及用于作物和牲畜繁殖育种的品种。播种和收获的时间进度也都是硬性规定的，自由出售产品被禁止，同时颁布了控制购买机械和肥料的条例规定。

赫鲁晓夫试图通过制订严格的生产指标强力推行狂热的发

展速度，结果只产生了消极的作用。例如，在梁赞州的冒进之后（其他州的较小范围内也发生过类似情况），集体农庄被剥夺了何种牲畜可以宰杀的决定权，他们被迫把不再产奶的牛保留在奶牛群中继续喂养。如果一个农庄主席未经正式批准而将产奶不足的奶牛送进肉类加工厂，就要受到惩罚。结果，在三、四年里，一些集体农庄的牛群中，这种不产奶或产奶不多的牛占了百分之三、四十。从帐面上看，牲畜头数在不断增长，而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完成计划的方法实在荒唐。

## 农业部的命运

赫鲁晓夫不想简单照搬政府仅起咨询作用的美国制度，他改组了从农业部、大中农业机构、农学院到试验站的整套政府结构。这些改革在某些方面也许能起作用，但是由于赫鲁晓夫的典型的急躁与鲁莽，计划总的来说只能导致灾难，而且事实确实如此。计划中被执行实施了的部分，在1958—1963年的农业失败中起了很坏的作用。

例如，赫鲁晓夫决定，农业部只应通过试验和实例向集体农庄做出建议。这样，农业部就需要大量土地。所以赫鲁晓夫下令，让苏联农业部离开莫斯科，迁到农村去，建立一个大型样板农场，也是一种全国性的大型和长期的农业展览。于是，农业部失去了在莫斯科的舒适的办公室，将全部人马迁到了距首都100多公里外的、规模巨大的米哈依洛夫斯克国营农场。与此同时，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农业部迁到了离莫斯科120公里外的伊阿克罗马农场。其他地方，如乌克兰、格鲁吉亚、亚

美尼亚等加盟共和国，也以类似的方式将它们的农业部分别迁到了各地的农场。这些农业部不仅要监督、指导当地的农业生产，还要建立很多“样板”农场，供外地专程来参观访问的人们学习最新农业技术，回到各地后加以推广。

农业部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从城市搬到了农村，根本没有时间建造必要的办公室和住房。苏联农业部的办公室，就设在米哈依洛夫斯克疗养院里。部里的工作人员每天乘专车在颠簸的路上往返于莫斯科和农场之间，单程就要二、三小时。从其他城市来访的参观者和被邀请来参加各种会议的代表，住在莫斯科的旅馆里，每天也要这样往返奔波。所有的工作人员，从行政领导到食堂职工，都要抽一定时间下地劳动或试用新机器。但经常干的却是除草、刨土豆等最起码的农活儿，这对中、上层领导干部来说还真是一种锻炼。

一年之内，2,200名工作人员中，有1,700人接到了调离的通知，大部分较高的负责职务，这时被新调来的，没有什么资历的人接替了。农业部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急剧下降，以致几年中，农业部的电话竟没有编入莫斯科的中心线路。从位于米哈依洛夫斯克农场的苏联农业部，给设在基辅附近的一个农场的乌克兰农业部打一个电话，要经过几个电话数小时的联络，最后接通时，还常常根本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农业部下放后，并没有将原来的农场改造成生产能力很强的样板农场，赫鲁晓夫对此十分恼火。（米哈依洛夫斯克农场和其他“农业部农场”一样，成了梁赞州式的笑话——收成总是很坏，而且由于使用薪金较高的机关干部作为劳动力，使生产成本高得惊人。）于是，赫鲁晓夫将列佩斯克州一个先进农场的场长伊·沃洛费钦科任命为苏联农业部部长。他想，让一个农场场长管理农业部，也许比让从前的部长经营一个农场会要好些，基于这一假

设，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农业部长都由出色的国营农场场长来担任了，以赫鲁晓夫之见，把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调到制订政策的岗位，会改进农业生产的管理水平。然而遗憾的是，事不如人愿。经营管理一个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与指挥一整套全国性的生产部门，需要的是相当不同的领导艺术。

## “从柏油马路到田地”

赫鲁晓夫将农业机关、院校和技术学校，从城市迁到国营农场或农村的教学农场的做法，又是一个失败，他常引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例子，责怪苏联农业教育的问题在于，不是在农村，而是在国家首都及一些大城市里教授学生。

他对苏联农业教育的许多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政府曾对高等和中等农业教育给以大力支持。1928至1940年，毕业于高等和中等农业院校的专业人材，从11,000人增加到40,000人，1947年以后，又增加到50,000人。1959年达到了21万人。1953年时从统计上看，受过农业高等教育的苏联公民共计约100万人，而实际在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机械—拖拉机站及有关企业工作的，只有96,000人。<sup>①</sup>经过早期的改革，农村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后，情况有些变化。到1957年，已有28万专业人员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但是机械—拖拉机站被取消后，这个数字又下降了。

许多专业人员不愿在“基层”农村工作，原因是多方面的：

---

<sup>①</sup> 见1959年莫斯科版中央统计局材料“1958年的苏联国民经济”。

如工资低（集体农庄的农艺师或兽医的月薪是70—80卢布，低于城市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不愿成为农庄庄员而被束缚在农庄；以及生活水平低等等。如果农业院校设在城里，学生毕业后不被分配到农村去的可能性就大些。（对于占学生总数近70%的女孩子来说，争取不被分配到农村去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与非集体农庄庄员结婚。）<sup>①</sup>

在较长的时间里，逐步、缓慢地将农业技术院校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也许是可行的。这样，可以有时间修建教室、实验室、学生宿舍、文娛活动中心等现代建筑——为建造美国式的校园打下基础。但是赫鲁晓夫又是不能也不愿等待，甚至不考虑这样做所要花费的资金，他坚持所有的农业机构要在二、三年内全部迁到农村去。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财政部，既不能为这样大规模的搬迁提供资金，也无法建造必要的设施，甚至连规划都还没有做出。

然而赫鲁晓夫自信问题不大。他和以往一样，用人为制造的典型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拿莫斯科的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来说（这是距首都最近、最便于指挥的一个学院），为了减少该学院迁往库尔斯克的一个国营农场时搬迁的人数，赫鲁晓夫竟命令这个学院从1961年起停止招收新生（该学院1961年有近7,000学生），并且做出了在莫斯科150公里外建立农学院城和美国式的现代化“农业大学”的宏伟规划与设计。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的旧址，那些富丽堂皇的校舍、实验室、学生宿舍、实验园和小树林，成了赫鲁晓夫为来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新建立的卢蒙巴大学的校园。

---

<sup>①</sup> 在苏联，毕业生在三年中受国家分配的限制。法律规定在此期间，该毕业生不得辞职或另找工作。对女孩子来说，与城市工人结婚可以作为留在城市的理由，但男学生必须服从分配。

但无论是计委或财政部，都不同意为设想中的样板农学院支付约20亿卢布的建造费。把农业教学机构全部搬迁到农村的整个计划，需要花费500亿卢布——超过国家在几年内用于农业发展的全部投资。结果，“从柏油马路到田地”的搬迁计划一直是个梦想，无法实现。而从1961年就停止了招生的象季米里亚泽夫这样的农学院，却在慢慢地毁灭。这个农学院到1963年，教员的数目已与学生相等，每年都有学生毕业，而没有新生入校。若不是存在的日子侥幸比赫鲁晓夫统治的时期略长些，那么到1965年，整个学院就要消失了。1964年10月，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三天，这个学院又重新开始招收新生。

尽管如此，还是有几个农业技术学校成功地迁到了农村。新建立的技术学校或学院，自然也是在农村选择了校址。

# 第十一章 “农业奇迹”

## 乌云笼罩

事实很快证明，取消机械—拖拉机站和梁赞州的惨败，并非是有助于解决苏联农业问题的辉煌成就。还有另外两项曾被认为是成功的计划，在真实情况暴露出来时，成了也许是使赫鲁晓夫最丧气的残酷的现实。

### 开垦处女地的胜利成了问题

开垦处女地的最初胜利，其实就很不同于赫鲁晓夫 的设想。当初开始这项运动时，考虑的只是暂时使用这些土地。“处女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未曾开垦过的新耕作的土层，只能在四、五年内是所谓“处女地”，并由于土壤中含有大量养分而达到高产，单一品种 的连续耕作，使长期积蓄的养分消耗得很快，因此过去总是把耕作负担繁重的土地进行阶段性的“休



耕”，若干年内不再耕种。

赫鲁晓夫原来设想，从处女地收获的粮食，可以在四、五年内消除长期的粮食赤字，这样就可以有时间来改善传统作物产区的生产情况，化肥、拖拉机及其他设备将得到大量供应，产量会迅速增长。随着对处女地的依赖性逐渐减少，可以从单一耕作小麦过渡到适当的轮种制。整个计划的安排是，在一定的时间内，使一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能够在较小片的土地上正常地进行生产和管理。这样，就不再需要每年动员一百多万额外劳力——不仅是西部地区农庄和农场的一般劳力，还有学生、机关干部、卡车和康拜因的司机（连同他们的机器），有时甚至要调动军人——将所有这些人派到远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处女地去参加收割。

1957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6年的水平下降了2,500万吨。<sup>①</sup>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蒙受了严重损失。在1956年的特大丰收之后，这个现实尤其令人难以接受。而且这一年，苏联各个地区粮食普遍减产。1958年，处女地又获得好收成，全国粮食总产量再创新纪录，达到了一亿四千万吨。这样波动其实是正常的，气候观测表明，东部处女地地区的天气条件，五年中只有二年适合小麦的生长。

1959年以后便可以明显地看出，“处女地”将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所谓“处女地”的名称继续进行开发，并希望它提供占全国小麦总产量中相当大的数量，改造传统农业区的计划没有付诸实施。赫鲁晓夫由于处女地初期的好收成而打消了只把开垦处女地计划作为争取时间的权宜之计的打算，因此不但削减了对传统作物产区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而且因强迫他们

<sup>①</sup> 见1959年莫斯科版中央统计局材料《1958年的苏联国民经济》。

买下机械—拖拉机站的设备，反而增加了这些地区的财政负担。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统统倾注进了开垦处女地的计划。与此同时，常规农业区的建设却毫无进展。这些地区的粮食平均年产量，保持在1955年的水平，有些地区有下降。处女地的面积虽然在不断扩大，但是再也没有出现过1956年那样的产量。在整个1959—1965年国民经济发展七年计划期间，处女地的粮食产量只有一年达到了国家指标。1959年—1964年每公顷小麦的平均产量低于前五年（1954—1958），这无疑意味着单位面积生产成本的增加，处女地小麦的生产成本，比北高加索、顿河流域和乌克兰地区的小麦成本平均高二、三倍。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城市扩建，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长，因而把几乎全部增长量依赖于处女地的产量，就变得十分冒险——其他且不计，仅东部地区的气候情况极不稳定这一条就足以顾及（这一点在1963年处女地地区发生旱灾时，令人痛心得到了证实，我们将在本书第十四章中加以叙述）。如果有大量的粮食储备，这种不稳定性还不至于十分严重，然而遗憾的是没有这笔储备。在苏联的欧洲部分，1961—1964年每人平均的粮食产量甚至低于1913年的水平！一年生产的全部粮食，当年就消耗完了，没有剩余可供国家建立粮食储备。国家的经济状况十分脆弱，在极大的程度上受不利气候的左右。

如果考虑采取惯用的农业措施，如固定劳力和农业人口，适当的作物轮种和发展畜牧业等，那么，把处女地的开发从权宜之计变为全国近半数商品粮的长久来源所冒的风险也许还会小些。但是只在一、二个月的收获期间，季节性地调动人力与机械的状况，根本不可能采用这些措施。年复一年的小麦单一品种耕作，在越来越多的新开垦的土地上展开——到60年代初期，已达4,200万公顷。结果造成杂草迅速蔓延，无法施用化肥，产

量也无从提高。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处女地的开发在60年代初期，造成了破坏生态的灾难性的土壤流失，早期的科学研究已经预见到这种现象必然发生，并且警告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耕作成千万公顷没有森林带保护的、开放性大平原的土地是愚蠢的。但是“开垦处女地”运动的来势，不容人们去考虑当地的土壤和地形情况，并采取防止土壤流失的措施。不仅肥沃的土壤，连盐碱地和大片轻沙地都进行了翻耕，这些沙质土很快就被风吹走了。翻耕之前，没有任何人做过土壤分析，直到1965年才开始请教农艺专家。这些地区采用的耕作方法（将表层土壤翻转，埋到下面去），对土质是有害的，进行单一品种耕作尤其如此。但那时还没有其他的耕作技术，所以土壤侵蚀和杂草一样，从开垦运动初期即蔓延开来，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1955到1960年，已有几十万公顷土地为风沙侵蚀所毁。但处女地的土地是以百万公顷计算的，因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警惕。可是1962年干旱的夏季，风化侵蚀波及了几百万公顷。仅在巴夫洛达州一地，就有150万公顷土地被风“刮走了”。<sup>①</sup>而这仅仅是开始。1963年春天，又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几场暴风（风级高达每小时95英里）将成百万吨处女地的沃土卷起，移到了数十英里外的萨彦岭和其他山脉的脚下。风尘遮蔽了太阳，淤塞了沟渠，一些树墩周围积盖的土地堆高达两米，许多村庄城镇淹没在灰尘之中，数千公顷的可耕土层被风彻底卷走，以致地下的岩基都裸露出来。受害面积的准确的数字没有公布，但受到影响的土地成百万公顷。

1965年，风化侵蚀又毁掉了北哈萨克斯坦、克拉斯诺亚尔

---

<sup>①</sup> 见1964年莫斯科版《处女地地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经济》。

斯克地区和图拉州的几千公顷土地。在这些自然灾害的悲剧之后，政府才开始认真考虑实行有效的土壤管理，然而这些地区可耕土层的恢复，至少需要一、二个世纪。

很少有人了解，强行开垦处女地，大规模耕种和季节性地动员成千上万劳动力的做法，是与一个长期拖延没有解决的问题直接有关的——这就是苏联各民族的权利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曾经非法地将被指控与入侵德军有勾结（未经证实）的几个少数民族，迁居到东部（主要是哈萨克斯坦、阿尔泰地区和乌兹别克斯坦地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卡巴尔的尼亚人、巴尔卡里亚人、印古什人、伏尔加德国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等，纷纷被从他们的家园驱赶出去。1956年党的二十大做出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决议之后，自然应为所有这些少数民族恢复名誉，并允许他们回到本民族原来居住的地方去。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卡巴尔的尼亚人，巴尔卡里亚人和印古什人，很快被送回了他们原来的村庄和居住地。但是对伏尔加德国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昭雪，一直拖到1967年才进行，而且至今仍未准许他们回到自己的本土。对这两个民族的不平等待遇，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完全是出于实用，山区的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卡尔梅克人不善耕种仍旧过着半野生式的生活，常给当地人找麻烦，所以当地人很高兴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山区和高原去。

而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伏尔加德国人十分勤劳，即使是在放逐期间，他们又很快在新的地区建立起了良好的农业基地，精心耕作，从不打扰邻人。开垦处女地的运动开始以后，一百多万伏尔加德国人成了基本的固定劳动力，其中很多人是拖拉机手，机械师和其他技术工人。没有这些人，每年必要的农业生产活动简直就无法进行。正因为这一点，于是宣布说，让克里米亚鞑靼人

回到克里米亚，或让伏尔加德国人回到他们小小的家乡去是“不适宜的”。伏尔加德国人的那一块小小的家乡的土地，是他们的祖先用了比富裕得多的美国人从俄国人手里买下整个阿拉斯加时所付的更高的代价，从凯瑟琳女皇手里买来的。

## 玉米运动的后果

赫鲁晓夫的第二个农业“奇迹”——种植玉米运动。同样注定了失败的命运。由于看到玉米作为粮食和青贮饲料对美国畜牧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赫鲁晓夫依此先例，于1953年9月提倡在苏联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1954年，玉米种植面积增加到430万公顷。赫鲁晓夫不断施加压力，1955年又增加到1800万公顷。以后几年中，面积本应控制在这个已经过高的数字范围内，并且更多地注意对已经播种，但在苏联很多农业区还是陌生的这种新作物，怎样进行耕作、施肥和培育等问题进行研究。

当时，赫鲁晓夫正在极力推行将肉类产量提高三倍的计划，他认为只有玉米能够使他所希求的畜牧头数得到保证，因此1957年以后，他更加卖力地想使玉米不仅在产量有时比较好的南部和中部地区普遍种植，并且在全苏推广。他没有考虑到，种植玉米需要大量劳力、肥料（那时还很缺乏）、炎热的气候（只在苏联南部才有）和肥沃的土质（西伯利亚和列宁格勒都不具备）。耕作玉米所需要的特殊机械设备的生产和供应也不充足。但是不论集体农庄愿意与否，玉米的播种面积还一直在增长，1960年达到2,800万公顷，1962年又增加到了3,700万公顷。<sup>①</sup>

<sup>①</sup> 见1964年莫斯科版中央统计局材料《1963年的苏联国民经济》，第269页。

## 玉米作为青贮饲料

新播种的数百万公顷玉米，给气候条件本来不适宜种植这种作物的地区，如白俄罗斯、波罗的海共和国、中部地带、西北地区各州、乌拉尔、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造成了严重的问题。这些地区的玉米不是作为粮食，而是作为青贮饲料种植的。据赫鲁晓夫估计，每公顷可产300到400森特纳青饲料。但由于肥料，机械和人力的不足，很少达到这样高的产量。据中央统计局的数字，1954—1958年，平均每年每公顷青饲料玉米产量只有86森特纳。<sup>①</sup>而在白俄罗斯，中部地区和北部、东部的一些州，平均每公顷的产量甚至低于50森特纳。这样看来，把玉米作为青饲料就很不经济，远不及不需要如此大量劳动力的苜蓿、三叶草等传统草类青饲料作物。

以后几年里，由于中央委员会和地方领导的强大压力，玉米的耕作方法有所改进，又有了化肥和一些专门机械（尽管数量远远不够）。但是许多州的作青饲料的玉米产量仍然太低，很难与投入的劳动力相当。1963年，全国青饲料玉米产量，平均每公顷仅70森特纳。1965年赫鲁晓夫下台后，产量仍很低——平均每公顷98森特纳。经济学家早就计算过，如果每公顷产量低于100森特纳，则玉米不仅比其他一般饲料提供的“饲养单位”少，而且因缺乏机械，不值得投入额外的劳动力。在长期缺乏劳动力的情况下，城里的工人和机关干部经常被派去“种玉米”，同时保留原工资，这就使玉米青饲料的单位成本格外高。

<sup>①</sup> 见1963年莫斯科版《1962年的苏联国民经济》，第236—237页。

据1958年至1962年的统计，种植、收获100饲养单位的多年生饲料，如三叶草、梯牧草、牧场草等，成本为一至三卢布，而同样100饲养单位的玉米种植和收获的成本是五至六卢布。<sup>①</sup>

以上这些统计也许是不得要领的。因为在苏联引进玉米的那些地区，玉米从来不足，这时也仍然不是一种可靠的作物，1962年以前，人们还可以说，产量低是由于当地领导和集体农庄未能提供必要的劳力和肥料等等。但1962年成了危机的一年——春天和初夏都阴冷多雨，若不是被大面积的玉米取代，这时多年生牧草是一个理想的夏季。而作为干热气候作物的玉米却无法成活，死亡率占播种面积的70—80%。<sup>②</sup>一些比其他地方播种更多玉米的州发生了真正的“玉米灾难”，这些州的玉米几乎全部死光了（如沃洛格达州，种植了58,000公顷玉米，仅有1,000公顷可以收获。每个州购买的玉米青饲料的量差异极大。在立陶宛，1960年为每头奶牛购买的青饲料量是6吨，1961年为4.5吨，1962年不到一吨。抵制种植玉米时间最长的爱沙尼亚，1962年年景很坏，只为每头奶牛购买了300公斤青饲料，是1960年数额的十分之一。

赫鲁晓夫设想的将西伯利亚变为辽阔的玉米地的试验，他以失败而告终。只是偶尔情况不错，但更经常的是全部幼苗都被初夏的晚霜所毁，或是正在成熟的玉米受到八月末的早霜的侵袭。

种玉米的狂热和几乎将全部人力投入玉米地的运动，造成了直接与间接的危害。为了防止集体农庄庄员恢复种植传统牧草，国家不再制造生产改良与维持自然草场的机械设备，发展牧草种子的工作也停止了。灌木丛、小土丘在牧场草地蔓延，而后

<sup>①</sup> 1963年《经济问题》第二期22页。

<sup>②</sup> 见1964年11月10日与22日《农村生活报》。

又成为沼泽。几乎三分之一的草场被完全废弃。仅俄罗斯共和国，从1959至1965年，就有近600万公顷草地因杂草丛生而荒芜了。<sup>①</sup>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因缺乏机械设备，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干草未能收割，以致春天饲草不足时，不得不从南方“进口”稻草。<sup>②</sup>全国干草的年平均产量，从1953年的6,400万吨，下降到1965年的4,700万吨。<sup>③</sup>

赫鲁晓夫本来指望依靠玉米解决中部和东部地区的饲料问题，然而经过十年不曾间断的生产运动，这些地区的大多数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不仅没有任何盈利，反而不断蒙受损失。

## 玉米作为粮食作物

在庫班、北高加索、克里米亚和南乌克兰等南部地区，玉米作为粮食或许可以起到某种积极作用。粮食玉米的产量，从1963年的400万吨，增加到1964年的1,400万吨，但是这种产量的增加，不象在美国，是因为大幅度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而仅仅是由于扩大了种植面积。经过相当大的努力，粮食玉米每公顷的年平均产量只达到14森特纳，而需要劳动力少得多的冬小麦，每公顷年平均产量是13森特纳。1962年，南方小麦的产量略高于玉米（小麦为每公顷16.8森特纳，玉米16.6森特纳）。<sup>④</sup>据经济学家统计，种植一公顷玉米，平均损失20卢布，

---

① 见1965年莫斯科版《1965年3月24日至26日中央全会会议记录》第48页。

② 见1964年12月16日《真理报》。

③ 见1966年第3期《农业经济》，第16页。

④ 1962年《苏联国民经济》，269—270页。



而种一公顷小麦可盈利20卢布。<sup>①</sup>因此即使在南方，玉米的耕种也不能算是完全成功。而且扩大了玉米的种植面积，就意味着减少冬小麦的播种面积。

赫鲁晓夫打算把北高加索变成“玉米国”，而将小麦的种植基本转移到东部“处女地地区”。他对南乌克兰、顿河地区各州和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提出了同样的设想。如果这项计划进展得缓慢一些，逐渐地引进玉米，适当耕作，进行灌溉，使全部操作机械化，并且使用近系杂交的品种和足够的化肥，也许可能在苏联创造一个美国那样的“玉米带”。那时，每公顷粮食玉米的产量将会达到50至70森特纳，青饲料玉米每公顷500至1,000森特纳，但是由于缺乏谨慎的考虑和控制，“玉米运动”基本上是一个失败，加重了国家的农业负担。

赫鲁晓夫本人在被迫退休之前，已意识到在“种植玉米运动”中犯了一些错误。他不得不承认，玉米并非在所有的地区都是一种可以盈利的作物。在对集体农庄的压力多少减轻了一些之后，青饲料玉米的种植量下降了20%，粮食玉米的种植量减少了15%。赫鲁晓夫下台之后，全国的“玉米运动”就此告终。玉米在赫鲁晓夫在位时期已经极不得人心，以致1965年的播种量下跌到低于1940年的水平。甚至连那些种植玉米获得成功的农庄，这时也拒绝再种玉米了，青贮饲料玉米成倍地下降。莫斯科的玉米专售商店不得不改成了一般的副食商店。

---

<sup>①</sup> 1964年《计划经济》第三期，第53页。

## 第十二章 赫鲁晓夫 身边的人物

和任何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样，赫鲁晓夫在执政期间也有很多在党和政府内不担任正式职务的顾问。在很多情况下，赫鲁晓夫对这些贴身顾问的意见往往比中央委员或负责某个经济部门的部长的意见更为重视。这个超越于党政领导之上的顾问班子，使赫鲁晓夫与同事之间的关系不是更为密切，而是更多地树立了政敌。

在执政的初期，建立这种相对独立的私人顾问小组，曾有助于赫鲁晓夫制定某些计划与战略，而又不使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被认为是对手的人知晓。但是1957年以后，这种做法就已经没有必要。而且，决策机构的控制权经常从正规的党政机关手中转移到亲信顾问们身上，就给将来埋下了隐患。赫鲁晓夫频繁地在国内旅行和出国访问，经常在旅途中做出决策，而这时，只有和他身边的一小圈人可以进行商讨。如此看来，有必要在此介绍一下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人。

由于赫鲁晓夫的很多旅行都与农业有关，所以我们首先介绍在苏联科学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T·D·李森科。

## T·D·李森科

1956年前后，特拉菲姆·D·李森科开始成为赫鲁晓夫最信任的农业方面的顾问之一，尽管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们两人之间曾发生过数次齟齬，在战后初期，赫鲁晓夫与李森科有过多冲突，那时，李森科是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兼斯大林的首席农业顾问。赫鲁晓夫曾在乌克兰地区取消了几项李森科倡议的计划。1947年，在乌克兰应该种植冬小麦还是春小麦的问题上，赫鲁晓夫经过与李森科和卡冈诺维奇的激战后取得了胜利。1954年，当赫鲁晓夫发现1949至1950年一度支持马林科夫反对他，并被于1953年从计划委员会里清除出去的V·S·德米特里耶夫，成了李森科亲密的助手之后，他与李森科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加紧张了。

在李森科的指导下，德米特里耶夫进行了通过改变生长环境，将一个植物品种异变成另一个品种的模拟试验（如将青稞改造成小麦等）。赫鲁晓夫嘲笑这些设想是荒谬愚蠢的，当时这主要是针对德米特里耶夫，同时也借机讽刺了李森科。在《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上，出现了两篇尖锐批评德米特里耶夫和李森科的文章之后<sup>①</sup>，高教部改变了准备授予德米特里耶夫生物科学博士学位的决定。

<sup>①</sup> 《真理报》1954年3月26日：S·S斯坦科夫教授的文章；和《共产党人》1954年第5期“科学与生活”一文。

这一举动，在科学舆论界激起了对李森科更为尖锐的批评。他被公共指责为不仅在理论上炮制了错误的观点，而且对农业提出了许多错误有害的建议，如阻碍杂交玉米的研究，试图在西伯利亚种植冬小麦的失败等等，还有其他许多问题。这些批评十分有效，李森科失去了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到1956年时，他的影响已大大减少了。

但是，李森科在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里，仍有不少支持者。赫鲁晓夫的两个追随者，也是党中央主席团中名列前茅的成员，A·I·基里钦科和N·V·波德戈尔内，就是李森科的朋友（波德戈尔内和李森科是同乡，而他还以此为荣。当李森科已经是一个著名的科学家时，他还是默默无闻的）。李森科还通过帮助赫鲁晓夫所信任的一个农业顾问——A·S·谢甫钦科成为农业科学院的院士，从而博得了他的支持。<sup>①</sup>

李森科通过种种的途径，极力改善他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对赫鲁晓夫的所有提议，他都乖巧地积极赞助，广为宣传。李森科自告奋勇地推行赫鲁晓夫关于发展畜牧业的计划，并保证在短时间内使整个苏联牛奶的乳脂含量有所提高。赫鲁晓夫对此自然十分高兴。他也很欣赏李森科提出的，只要将化肥以特殊的方式与粪肥混合，则不需要很多化肥就可以获得高产的论断。

这样，到1957年李森科被恢复了名誉，设法进入了赫鲁晓夫精心挑选的内部小圈子，经常陪他到苏联各地旅行视察。没有受过农业经济方面的教育，也从来没有认真审查过李森科关于遗传学的奇谈怪论的赫鲁晓夫，很快就被娴于词令的李森科所征服，并在许多讲话和报告中，给李森科与其学术上的对手

<sup>①</sup> 苏联科学院院士衔不仅意味着名誉和威望，而且可以因为领取“科学院的工资”，使一个科学家的收入增加一倍。

的争论以极大的支持。1961年，李森科被恢复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他的好朋友和同事M·A·奥勒尚斯基被任命为苏联农业部长（赫鲁晓夫十年里换了五个农业部长）。

这时，李森科的理论 and 计划已经在学术界和农业机构中丧失信誉，因此赫鲁晓夫对所争论的生物学问题的干预，只能影响他自己的名声。在为赫鲁晓夫起草讲话时，他的农业顾问几乎总要加进赞扬李森科、指责反对他的人的词句，而且常常做得很露骨。但是，由于中央委员会、科学院以及高教部里的许多人都已经不再相信李森科的过时的理论，所以即使赫鲁晓夫对某个科学家做了尖锐批评，这个科学家也不至于因此而失去职务。尽管如此，1959年赫鲁晓夫几乎是在一怒之下，下令解除了N·P·杜宾宁的西伯利亚遗传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

杜宾宁一直是李森科的反对者。他不顾李森科的影响和干预，设法提高了遗传研究的水平，并在新西伯利亚建立了西伯利亚遗传学研究所。这个新机构从建立之初，就在应用遗传学方法选择优良品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如发展含糖量高的三茬甜菜，使用放射突变体和其他一些成果。李森科迫不及待地想方设法贬低杜宾宁，剥夺他的所长职务。而杜宾宁由于一个不幸的巧合被革了职——赫鲁晓夫是应该到杜宾宁工作的地方来的，但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里来的。

1959年秋天，赫鲁晓夫到美国的很多地方进行了参观访问，回来之后，又立刻飞往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毛泽东曾反对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因为那时中美关系非常紧张，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占领近海岛屿的蒋介石军队的长期炮击还在继续。

中国报纸完全避而不提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在北京，对他的接待也很冷淡。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的领导人一般用拥

抱和亲吻互致欢迎。但是当毛泽东到机场迎接苏联代表团时，甚至没有和赫鲁晓夫握手，与中国领导人进行的会谈，气氛也很紧张。结果，赫鲁晓夫停止了访问，比预定日期提前回国，连续数日的庆祝活动还没有结束，他就离开了北京。在回国途中，他的情绪一直很坏。

为了提高兴致，他决定在新西伯利亚停留，参观一下按照他的设想正在兴建的“科学城”。听说杜宾宁是负有盛誉的遗传学研究所所长，又联想到这个杜宾宁是与李森科对立的“摩尔根——孟德尔学说”的拥护者，赫鲁晓夫便拿他当了出气筒，命令他立即离职。

然而李森科又搞掉了一个对手的快乐也好景不长，就在同一个月里，他失去了一个重要伙伴，也是他在党中央主席团里的头号支持者——A·I·基里钦科。1959年初，赫鲁晓夫出国访问期间，基里钦科作为第二把手，实际主持政府工作。本来在这重要的一年里，处女地的收成看来会很好，赫鲁晓夫秋天离开苏联去美国时，完全有把握会有一个创纪录的好收成，但是入秋以后，一直阴雨连绵，霜降也来得过早，因为没有足够的粮食干燥设备，没有足够的带顶棚的仓库，也没有足够的谷物储存塔，使收获产生了困难，潮湿的麦子不仅极难收割，而且麦粒由于水份太大，在没有遮盖的堆放地开始发热、发芽，把收成全毁了。赫鲁晓夫从中国回来时，等待他的便是这样的一场灾难，责任自然由基里钦科承担，他被指责为对这一切不利情况缺乏准备，随即被从主席团里调离，派往罗斯托夫。在那里的地区机关呆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就在不引人注目的州一级活动中变得默默无闻了。

李森科在这场挫折中幸免于难，很快又恢复了他过去的影  
响。1963年4月，赫鲁晓夫直接出面干预列宁奖金委员会做出

的决定，迫使委员会撤消不授于被提名的李森科的两个追随者列宁奖金的决定。在这种压力下，委员会再次表决，终于给李森科的这两个拥护者受了奖。

1964年6月，由于科学院院士萨哈罗夫（未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恩格尔哈德发表了反对意见，而使李森科的一个最亲近的伙伴未能当选为科学院院士时，赫鲁晓夫愤怒到几乎要对整个苏联科学院进行改组。他竟命令科学院设立更多的院士名额，专门保留给李森科推荐的科学家。

1964年夏末，中央委员会的计划部门又在考虑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如果实施，将再次给苏联生物学和遗传学的发展带来威胁。尽管当时农艺科学与生物学的研究显然比1948年的状况要好些，但是在整个学术界和研究机构都可以看到，李森科阻碍着对现代生物学的任何新的发展趋势的研究。遗传学的教学混乱而且内容陈腐，从中学到大学的各年级学生，仍在学习“米丘林生物学”。关于改进杂交方法的知识十分有限，许多在国外早已采用的技术，苏联专业人员竟还闻所未闻。应用复杂的统计学来评价农艺试验结果的方法也未得到发展，这就给一些不道德的人在试验结果上搞欺骗和弄虚作假开了方便之门。如果不是1964年10月国家的权力机构发生了重要变动，至今都很难设想这种生物和农业科学的倒退，将何时结束。<sup>①</sup>

---

①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李森科自然被从高级决策机构中免职，但他至今（到1976年）仍是高尔基——列宁试验站的学术领导人，这个试验站有若干试验室，一千英亩土地和近二百名工作人员。李森科在78岁时仍在享受给予所有苏联科学院院士的另一特权——无规定的退休年龄（因长寿而占据行政职务的最高纪录是蠕虫学研究所所长S·斯科里亚宾，他1972年99岁时死于任上）。

## M·A·奥尔尚斯基

如我们所看到的，李森科对赫鲁晓夫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致于他对李森科的信任和依靠超过了农业部长。后来，由李森科推荐，他任命了李森科最亲密的助手和信徒之一M·A·奥尔尚斯基为农业部长。在报道上，对他的任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做法：《真理报》头版发表消息，同时刊登了这位新部长的照片（一般任命部长的消息都登在报纸末页的“记事栏”里）。但是，奥尔尚斯基在职的时间并不长。这时，正赶上赫鲁晓夫决定将农业部“从柏油路搬到田地”去，并开始把农业部的工作人员从莫斯科迁到来哈依洛夫斯克农场的时期。对于将只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进行监督、指导，奥尔尚斯基是毫无精神准备的。

赫鲁晓夫依靠自己亲自挑选助手的作法，也涉及到了文化和国际事务领域。他的最有影响的三个主要顾问是：A·S·谢甫钦柯、V·S·列别杰夫和A·I·阿朱别依。列别杰夫和谢甫钦柯是赫鲁晓夫的正式顾问，阿朱别依则是他的女婿（他的女儿拉达的丈夫），并担任《消息报》的主编。阿朱别依和谢甫钦柯在赫鲁晓夫所有的出访中几乎都陪同前往。

## A·S·谢甫钦柯

谢甫钦柯是赫鲁晓夫在农业方面最重要的顾问。赫鲁晓夫



有关农业问题的讲话，或是在农业会议上发表的“即席”讲话，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由他起草。报纸收到的供发表的文本，一定要经他过目。所以，事先未经修饰的讲话或“总结性发言”见报时，一般总要晚五、六天。

谢甫钦柯从战后即在乌克兰跟随赫鲁晓夫工作，给他当了十八年以上的顾问，作为一个持有农业科学候补学位的科学家和农业经济方面的专家，谢甫钦柯成了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以及在苏联国内外访问时不可缺少的随从。这主要是由于他有非凡的记忆力，他可以随时为赫鲁晓夫提供所需要的点滴的经济情况，或是准确说出在他们长期共事中所接触过的人或事。仅举一例，假如赫鲁晓夫偶然遇到一个以前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的集体农庄主席或地委书记，他只需问一下谢甫钦柯：“我好象在那儿见过这个人？”谢甫钦柯便会立刻准确地回答：“是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1951年9月22日，斯摩棱斯克州的农业先进工作者大会上，你向他询问了当地的牲畜品种。”借助于这个顾问的记忆力，赫鲁晓夫经常以能够称名道姓和谈起过去见面的情况而使人吃惊。

谢甫钦柯也是赫鲁晓夫加紧开展种植玉米运动的一个推动力。他自己出版了一本关于玉米的小册子，极力推广这种作物。1960年至1961年，他在权力机构中的影响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即凡是与农业有关的问题，如果不事先与他打招呼，连主席团成员都不可能约定时间与赫鲁晓夫面谈。对谢甫钦柯的这种信赖，使得党政系统中比他地位高得多的部长和中央主席团成员十分恼火。

赫鲁晓夫被罢官后，谢甫钦柯也立即被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中撤职，而后，他就在一个农业经济研究所里搞学术工作。

## V·S·列别杰夫

列别杰夫作为助手，对赫鲁晓夫起的作用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他是在部长会议，而不是在中央委员会里工作。赫鲁晓夫经常在文学艺术方面征求他的意见。作为部长会议的工作人员，他自然在法律上独立于党中央委员会中极端保守的文化部门，尽管他的办公室也是在党中央大厦里。没有人知道他与赫鲁晓夫的关系自何日始，也很难确切地说清楚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赫鲁晓夫发生影响的。很多人是在当他说服了赫鲁晓夫，应该发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捷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本书时，才明显地看出了他对赫鲁晓夫的影响。列别杰夫与《新世界》杂志主编、诗人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关系很好，由于列别杰夫的帮助，特瓦尔多夫斯基才得以获准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和其他一些坦率直言的作品。

列别杰夫与赫鲁晓夫的关系，是从赫鲁晓夫的一个不寻常的习惯发展而来的——他喜欢别人将文艺作品大声读给他听，而不顾自己去看。列别杰夫常常在赫鲁晓夫的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里或是当他在克里米亚或黑海之滨的皮松达半岛度假时，为他朗读。列别杰夫还是一个新闻摄影记者，常和其他记者一道，陪同赫鲁晓夫出访。回来之后，他就使苏联的报刊杂志上充满了奉承赫鲁晓夫的文章和照片（其中有些是以化名发表的）。

1963年，在得到阿朱别依的赞同后，列别杰夫把特瓦尔多夫斯基请到赫鲁晓夫在南方的宅邸，让他朗读他的讽刺诗《焦

尔金游地府》。许多外国作家也被邀请参加。《焦尔金》是一首辛辣的、反斯大林主义的叙事诗，涉及到了许多1963年仍在流行的官僚主义的条条框框。在特瓦尔多夫斯基朗诵的过程中，赫鲁晓夫不时开怀大笑，显然十分欣赏这些诗句尖锐地嘲讽了战后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不懂俄文的人得到了诗文大意的解释。列别杰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和阿朱别依看到如他们所料，赫鲁晓夫明显地表示满意。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他们在谈话中又询问了这首诗是否可以发表。当着外国作家的面，赫鲁晓夫无条件地表示同意说：“对讽刺文学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你们当然可以发表！”于是，阿朱别依甚至没有遵循任何要发表的作品都必须经过送审批准这一程序，很快就将这首诗在《消息报》上刊登了。

在此一年之前，赫鲁晓夫于黑海边休假时，列别杰夫以同样的方式，给他朗读了《伊凡·捷尼索维奇的一天》，使赫鲁晓夫感受到了这部作品的强烈感染力。这毕竟是一篇由过去的犯人描写的、斯大林时期集中营的恶梦。而这个恶梦已经被赫鲁晓夫本人所驱散了。如果索尔仁尼琴的这本书是在早些时候，即1962年春，特瓦尔多夫斯基刚刚把它送交中央委员会审查之后，就送到莫斯科去给赫鲁晓夫过目，赫鲁晓夫则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去读它，而不得不听从在中央委员会里负责文学艺术的极端保守的思想家的意见。深知这一点的列别杰夫，等了几乎半年时间，以便在适当的时候，使这本书取得应有的效果。回到莫斯科之后，赫鲁晓夫将发表这本书的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投票表决。主席团成员们拒绝表态，赫鲁晓夫又召集第二次会议，施加了相当的压力，终于设法通过了必要的决议。

但是在执政初期，赫鲁晓夫对有关文学作品的问题曾采取过非常谨慎保守的态度，这表现在他对V·杜金采夫所著的

《不是单靠面包》一书的尖刻攻击，和1958年舆论界发动的针对鲍里斯·帕斯杰尔纳克的运动，使得他在可能被从苏联驱逐出境的威胁下，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金。1954年，一次中央委员会讨论《新世界》的编辑们的活动时，赫鲁晓夫自己就曾批评过《焦尔金游地府》一诗（这首诗写于1953年底，十年之后才予发表）。1961年，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由于出版了一本相当温和的批评性作品的文集《塔鲁萨之页》，而受到中央委员会的严厉批评（巴乌斯托夫斯基是这本文集的主编）。《塔鲁萨》没能在莫斯科发表，巴乌斯托夫斯基便设法到卡卢加州去发表了，结果，批准它发表的卡卢加州委第二书记被撤了职。

多亏列别杰夫与赫鲁晓夫的亲密关系，使他得以在很多场合对文学作品和电影戏剧等给予支持，而免受中央委员会下设的文艺、电影、文化等部门的审查批准。但即使是列别杰夫，也不能使赫鲁晓夫完全脱离保守势力的影响，所以，赫鲁晓夫的表态经常是反复无常和自相矛盾的。

## A·阿朱别依

A·阿朱别依是列别杰夫的朋友，并和他一起为文学的自由化做过努力。在阿朱别依和列别杰夫的参与和指导下，出版了一本有照片和评论文章的关于赫鲁晓夫1959年访问美国的画册，赫鲁晓夫对这本画册欣赏备至，想给他的编辑者们授予列宁奖金，但列宁奖金的范围，只包括文学、美术和音乐，没有新闻专业。在赫鲁晓夫的极力坚持下，对列宁奖金的规定做了修改，设立了“杰出新闻作品”奖，以阿朱别依为首的、参与

编辑这本题为《与美国面对面》的画册的新闻工作者，自然被授予此奖。阿朱别依由此成为列宁奖金获得者。此后，再也没有给新闻界颁发列宁奖金。

阿朱别依几乎每次都陪同赫鲁晓夫出访，渐渐地成了他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非正式顾问。六十年代初期，在古巴的导弹危机中，阿朱别依以赫鲁晓夫私人使者的身份数次出使国外，无论实际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还是有关的驻在国的苏联大使，都未被告知这些出访的使命的具体内容，阿朱别依被“知情人”承认为是赫鲁晓夫的非正式外交代表，这只能引起外交部、外贸部和中央委员会主管外事的部门的愤恨和强烈不满（由于外贸部长N·S·帕托利切夫早期在乌克兰与卡冈诺维奇的关系，赫鲁晓夫很不喜欢他，在所有的国际谈判中，哪怕是与外贸直接有关的谈判中，他都将他甩在一边）。

这样，在赫鲁晓夫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由他最亲近的顾问和同事组成的“内部内阁”，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部长会议和主席团之外进行工作。《真理报》主编D·A·萨丘科夫，也是这个精心挑选的小圈子内的成员。他通过《真理报》和《真理报》编辑部下属的主要画报、杂志专门发动了一个将赫鲁晓夫树立为“民族领袖”的运动。对他的赞扬和推崇，很快就达到了甚至比对斯大林还要过分的程度。斯大林过的是一种幽居独处的生活，使人很少能有机会发表有关他的文章和照片。而现在，赫鲁晓夫参加各种活动的照片充斥了整个报界，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人们对“赫鲁晓夫迷信”的议论。随着“内部内阁”对重要决策和任命的影响与日俱增，赫鲁晓夫与政府和党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关系也逐渐恶化。

## 第十三章 引起政治危机的“改革”

不仅是已经出现的工业管理和农业上的失败，使人们对赫鲁晓夫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能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失望与怀疑。此外，他的一些新的计划，更加速了人们对他的信心的丧失。这些计划，有的是旨在改变党的结构及党在苏联社会中的作用，有的是要对整个中等教育体系进行改革。所有这些所谓的改革都是出于良好的愿望——使僵硬的党的机构自由化，缩小教育所达到的目标与经济需要之间的距离。然而，又是由于改革的进程太快，而导致了消极的后果。

斯大林死后，苏联整个教育制度显然需要全面改革，1954年至1955年进行的取消男女分校的改革是成功的。而这时要在全国范围开展的中等学校的重新组合，是要将传统的十年制学校改造成为十一年制的综合性技术学校。对此，城乡居民都表示强烈反对。这种新的教育体制要求男女学生从十四、五岁开始就学习一门手艺，如车工、金工、纺织、拖拉机司机等，学校与

附近的工厂、修理厂、农庄或农场挂勾，那里的工人为了适应需要而转成工艺教员。学生每周有一个整天，或者用二次，每次几小时离开学校，到工厂的车间或农庄、农场去劳动，并学习某种专业技术。这样做，需要相当的财政投资，给工厂和学校都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工厂工人抱怨，除了要完成自己的生产指标，还要花费时间去教学校的小孩子们一些最简单的技术。学生和家也不满意，因为他们不能选择学习哪门技术——这往往是由离学校最近又适于承担教学任务的工厂的性质决定的。大多数学生认为，他们根本不可能实际运用被强迫学习到的技术。相应的统计数字也证明，学生们的看法是有道理的：95%的学生毕业前所受到这种“专业培训”没有能得到利用，他们常常是去做别的工作，或者上技校和大学。但是赫鲁晓夫对反对意见置之不顾，坚持要严格地推行他的教育“改革”。经最高苏维埃批准后，这次改革成了强制性的法律。

由于放松了强加给苏联少数民族的一些规定，民族主义有所滋长，<sup>①</sup>中央的指示常常难以贯彻执行，有时还有碍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假如，放松了只准使用俄罗斯单一语言的要求后，许多全苏范围发行的科学杂志改用地方语言出版。数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也开始用爱沙尼亚文、格鲁吉亚文、白俄罗斯文、乌克兰文或其他十四个民族加盟共和国的文字记叙他

---

① 从民族上来说，苏联不到50%的人是“俄罗斯人”，还有一百多种其他少数民族。主要少数民族在他们世代居处的地区，有一个有限度的民族自治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如爱沙尼亚、乌克兰、格鲁吉亚等）。所有这些民族，都是在十五到二十世纪期间的不同时期从老俄罗斯帝国沿袭下来的。他们或自己加入了俄罗斯，或者是被俄罗斯民族所征服。有些民族，象乌兹别克、拉脱维亚、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语言文化，都比俄罗斯文化古老，很多民族具有不同的宗教背景，如穆斯林、罗马天主教等。

们的试验，这意味着一种科学情报的浪费。比如俄罗斯科学家无法利用乌克兰文写的科技文章中所介绍的情况，更不用说用格鲁吉亚文或爱沙尼亚文写的文章了。这些少数民族也无法读懂用其他民族语言发行的刊物。这种民族主义的倾向，与国际上倡导的科学一体化相冲突。科学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使一些主要语种如英语、德语、法语或俄语，在世界范围内通用；一些小国在专业科技出版物中，自愿放弃而不再使用小语种（如瑞典文、荷兰文、匈牙利文等）。

政府在一个地区削减开支，以便为另一个地区筹集资金的需要，迫使赫鲁晓夫取消了给在西伯利亚、北方和远东工作的工人发放的工资补贴，这不仅在这些地区引起了不满，而且使人口逐渐从这些重要的经济地区迁移。1961年实行的有限的货币改革，也是不得人心的（卢布的购买力增加了十倍，全部的工资和物价以同样的比例下降），有些物价在重新制订时，比过去有所提高。赫鲁晓夫对劳动生产率的缓慢增长感到失望，于是试图修改许多工业企业的生产指标和工资标准，激起了工人的强烈不满，并造成了劳动力的紧张。提高肉类产量运动的失败，加上梁赞州事件，使国家的肉类资源大大减少，迫使政府将肉类、黄油、牛奶、鸡蛋及其他产品的零售价格提高了50%以上，不愿逆来顺受地接受涨价的地方，发生了官方与愤怒的消费者之间的公开冲突。所有这一切，使赫鲁晓夫基于1953年至1958年的成功而建立起来的威望，在1961年到1962年期间骤然下降。他本人和他的顾问们对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整个党内普遍弥漫着不满情绪。

对公众舆论变化的寒流十分敏感的赫鲁晓夫，这时又一次乞灵于谴责斯大林。在1961年召开的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又公布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揭露斯大林及其同伙反



人道主义的罪行材料。这次，他公开点了在1956年二十大的讲话中没有被点名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伏罗希洛夫等人的名。

二十二大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新党章，由党中央主席团通过的赫鲁晓夫讲话的初稿，没有提到要公布更惊人的有关斯大林罪行的新材料。这个讲话是准备公开发表的，而不是象1956年那样做秘密报告，谁也没有预料会有什么突变。然而1961年的讲话中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更震动人们的心灵，内容也广泛得多。赫鲁晓夫谈到的受害者，不是二十大上说的几千人，而是数以百万计。他还详细揭露斯大林亲自签署了判处上百人死刑的命令这一尤其令人发指的事实。在做了这个讲话以及随后公开进行的关于斯大林残酷地滥用职权的讨论之后，再也不可能象二十大以后那样，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压力和作为对党内保守分子的让步，而部分地保留斯大林的荣誉了。

斯大林的经过防腐处理的尸体被从红场的陵墓中移出<sup>①</sup>，葬在克里姆林宫墙附近的一座小陵墓里。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销毁了这位前领袖的所有肖像和纪念碑。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场所、地名和团体组织都相应地更改了名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德国人转为失利的名城斯大林格勒，这时也更名为伏尔加格勒。

一些西方人士认为，这些做法主要是对中国最高领导的一种蔑视和挑战。他们不断要求苏联共产党恢复斯大林的名誉和历史地位，部分苏联高级官员认为，对专制暴政的谴责和随之

---

① 在大会结束之前，1961年10月31日夜晩，一部挖掘机在克里姆林宫墙附近挖了一个深坑，将斯大林的棺柩放了进去，为了防止掘墓，坑里注满水泥，并用一块花岗石板封顶。第二天，红场上刻着列宁和斯大林名字的金碑已经刷新，只剩下列宁的名字了。

而来的自由化趋向，会削弱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但在所有这些变动的幕后，还隐藏着赫鲁晓夫个人的企图，这就是维持他自己的声誉，而且从政治上来讲，他确实达到了目的。

对苏联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自由化的倾向是从1962年11月允许出版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关于斯大林劳动集中营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其他一些前犯人的著作与回忆录反映出来的。这些耸人听闻的作品在1963年初成百万册地发行，被视为舆论自由的开端，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但是，赫鲁晓夫和他的主席团的同事们很快就意识到，任何自由化的浪潮，对他们自己同样也是危险的，它可能威胁党的官僚机构的垄断地位，并导致其他民主改革，甚至可能要求修改或废除对文学作品出版前的审查，赫鲁晓夫在1962年底参观莫斯科的一个艺术展览时，煞有介事地斥责现代派的艺术倾向。当他用典型的农民语言把展览会比做“狗屎”，并质问“谁应对此负责”时，著名的苏联雕塑家叶尔尼斯特·奈兹维斯特尼态度坚决地对这位苏联领导人做了回答。他激烈地为现代派艺术辩护，并告诉赫鲁晓夫，他现在所看到的作品，在艺术水平上远远超过斯大林时期。按理说，赫鲁晓夫应该回答他：“你正是我所喜欢的那种人”。可是1963年6月，党中央委员会专门召开了关于“思想意识”问题的中央全会，决定禁止艺术上的自由化倾向，提倡“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尽管如此，后来奈兹维斯特尼还是受赫鲁晓夫家庭的委托（也是由于赫鲁晓夫早些时候的要求）为座落在“新处女墓”的赫鲁晓夫墓创作了抽象派的墓碑<sup>①</sup>。

<sup>①</sup> 奈兹维斯特尼由于艺术上的原因继续受到迫害，他申请了流放签证，于1976年3月离开苏联，他的雕塑作品因为无法带走，故由赫鲁晓夫家族保存。

在1963年3月与著名艺术家、诗人和作家的一次会见会上，赫鲁晓夫就已经从二十二大所宣称的反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上有所后退。他重新肯定了斯大林在到1934年以前的所作所为，说“必须承认斯大林对党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直到现在，我们都认为斯大林是忠于共产主义的，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不能、也不应该被否定”。在这次讲话中，赫鲁晓夫还为斯大林的残酷无情开脱，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晚年处于一种慢性疑心病和迫害狂的病态。资本主义国家的谍报机构了解到斯大林对暗示性情况病态的多疑和敏感，向他大量灌输了似乎是真实的文件和消息，使他变得确信，“国内的某些军事专家在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国家的活动，各种罪犯在策划种种阴谋。”<sup>①</sup>

随着为斯大林“半恢复名誉”，对文学作品的审查不但远远没有放松，反而更加苛刻。知识界的自由化分子越来越受到刁难，苏联的自由派看到赫鲁晓夫明显地转而对国内政治加紧控制，对他也不再抱什么幻想，提高“意识形态方面的警惕”，“帝国主义的威胁”等字眼，又出现在每天的宣传中。农业生产的失利，工人、农民负担的加重，再加上这条新政策，几乎使赫鲁晓夫在苏联完全威信扫地。

紧张的气氛再次出现，人们担心过去的压制和恐怖再次卷土重来。至少本书的作者开始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担忧，若莱斯·麦德维杰夫写的题为《生物科学与个人迷信》一文，揭露了李森科的罪行和假充内行的欺骗行径。这篇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的文稿，在1963年6月关于意识形态的中央全会和8月份的《真理报》上，都受到了严厉批判。这时，罗伊·麦德维杰

---

<sup>①</sup> 见1963年3月10日《真理报》。

夫于1963年底完成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短文的初稿，已在地下刊物上刊登流传，征求意见。

赫鲁晓夫同样失去了军队的信任与支持。这主要是由于他突然单方面的采取行动，将苏联军队裁减至120万人，并削减了军事预算。赫鲁晓夫需要这些人力和财力去发展工农业生产。但是军界人士认为，对苏联武装力量这样大的单方面的削减，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国防力量。军队裁减还意味着数以千计的职业军官提前退休，靠养老金生活。出于经济原因，赫鲁晓夫又减少了退休金的金額，这自然引起了当事者的不满。<sup>①</sup>

尽管明知不仅是他本人，而且整个党的威信都在下降，赫鲁晓夫还是令人难以置信地加紧了反对宗教的宣传。许多地区的教堂被关闭，一些农村的情况则更糟，那里没有足够的库房储放农业机械，就把教堂改作了库房。在俄罗斯最古老的修道院中名列第三的鲍罗费克斯修道院，曾被保留下来作为博物馆，但这时被改建成了一座进行农业机械化教学的技术学校。普通的白色油漆遮盖了礼拜堂里绚烂多姿的壁饰。

在苏联全部人口中，至少有五至六千万人信仰基督教，其中主要是农村中的老一代人。由于教堂被关闭、改建和毁坏，使许多老年人更加不愿意在农村呆下去了。他们离开集体农庄，到城市里去和儿女一起生活（许多集体农庄，到了退休年龄的老年人是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阻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不适用于这些到了退休年龄（妇女55岁，男人60岁）

---

① 赫鲁晓夫裁减军队和军事预算的行动，导致了与最高军事指挥机构的公开冲突。他很快就收到了由苏军全体元帅签发的备忘录，要求恢复被削减的军队和预算，并对国防力量被削弱而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提出了警告。这个备忘录激怒了赫鲁晓夫，但他最终还是让了步，停止了部队的复转工作。

去和在厂矿、机关工作的成年儿女一起生活的老年人，因为在农村生活的老人不领取国家退休金，其社会保险从集体农庄的预算中开支。不少农庄无力按期支付养老金，所以很愿意让老年人离开，去和儿女们一起生活。

对各宗教教派，尤其是活跃的宗教团体的迫害加剧了。特别是1961年俄罗斯加盟共和国通过了新的刑法，其中第227条宣布，任何可能引起公民“反对社会主义或履行其公民义务”，以及“怂恿唆使少数人加入宗教团体”的宗教活动，都是犯罪行为。这样，在1917年革命后立即采取的教会与学校分离措施的基础上，这时又进一步宣布禁止父母在家庭中对子女进行宗教教育。如果发现18岁以下的青年参加做礼拜，就可以对牧师进行起诉。

一度追随过赫鲁晓夫的人，并不是因为他在经济上和行政上犯了错误，而逐渐改变了态度，下决心搞掉他，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牵涉到党内机构的二项改革。这二项改革本来是得到党中央委员会支持的，但后来在实施的过程中发现，改革不符合一党制的基本原则。因而改革不仅失去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多数的支持，也得不到一般的中央委员——特别是占中央委员会中大多数的州委书记的赞同。

对斯大林时期党内特权者的残酷、独断专横行为的生动揭露（这种现象被相当正确地归结为是违反党内民主原则造成的），使赫鲁晓夫有理由提出修改党内的一些制度，以至重新制定党章，按照新的章程的规定，党的领导机构（即地区和州委、以至中央委员会本身），在进行下一届选举时，各级委员会中必须有三分之一的成员由新的党员干部担任<sup>①</sup>。按道理讲，这一

---

<sup>①</sup> 州党委会每二年选举一次，地方委员会每一年选举一次。

点也适用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但不能引伸到第一书记（即赫鲁晓夫本人）和其他一些有豁免权的、有特殊功绩的老党员。

党章的修改，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党内民主的因素，取消了长期任职和往往由此产生的终身制，为其他人的当选创造了条件。州委书记和加盟共和国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地位无疑受到了威胁，新的章程意味着要对他们的工作表现进行阶段性的评议，这使他们有理由担心会被较年轻的、作为新鲜血液的人所取代。任何党的书记，不论是共和国的、州的、市的、区的或工厂的，除了在党的阶梯上被提升之外，起码都希望能保持自己的职务。

关于党内职务方面的规定是，凡有五百名以上职工的机构，可以设一名专职书记或党的组织委员。他们一般是从普通工人中挑选出来的，由党组织发给工资，以后很快便成为专职的党的工作者。而在较小的机构，如科研所之类的部门工作的党的书记，党务工作是本职工作之外来完成的，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却又没有额外收入。只有这些人才乐于在任职期满时，把党内职务让与他人。就是区党委会书记的薪金，也是很高的。所以担任一、二届书记的职务后可能被迫放弃职位的前景，必然是令人不快的。要使州委书记或长期担任中央委员的人对这个新规定感到兴趣，就更加困难了。

新的规定，使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失去了他们十分需要的稳定与安全感，同时却使赫鲁晓夫能够狡猾地对党内干部进行控制和摆布，撤换他不中意的人，只留下绝对驯服者。这样，就在赫鲁晓夫与州委书记们之间产生了一股关系紧张的暗流，赫鲁晓夫过去曾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作为他的主要支柱，而主席团的大部分成员是州委书记。这些摩擦，必须在下次党代表

大会，即1965年当中央委员会三分之一的成员不得不面对强制性的更换之前，加以解决。

第二项党的机构的改革，或许也是最后促使那些正在考虑撤换赫鲁晓夫的人下定决心的是他将所有州一级党委会分成了工业和农业两个委员会。这一划分决定，是1962年11月扩大的中央全会通过的。但是从职权范围来说，只有党代表大会才有权决定这样重大的党内机构的变动。

赫鲁晓夫之所以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过是为了把国家从他自己所导致的僵局中解脱出来。这种僵局的形成，是由于设立了体制复杂的经济委员会和把农业部迁到了农村，而使得这些机构变得效率极低。全国工农业生产混乱，指挥不灵和随之发生的减产，迫使赫鲁晓夫寻找出路——不是谨慎地退回到多少已经被验证了的集中统一的管理方法，而是要彻底检查整个党的系统。

当时的制度是，州党委会（以及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系统）对一个州实行全面领导<sup>①</sup>，州委第一书记就是一个州当然主人。第二书记掌管农业。可是现在，从1962年秋天开始，一个州的党委会被分成了彼此独立的农业委员会和工业委员会，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也相应地一分为二。按行政区划进行管理的原则这时改变成为按生产类别进行管理。

很难说这种做法对工业的影响如何，农业却由于增加了新的负担又摇摆起来。农业委员会既缺乏财政资金，又没有劳动力来源，这就更需要从城市抽调劳动力去农村。但党的农业委员会无权从城市工厂或机关招收季节性农业劳动力，州的工业

<sup>①</sup> 州党委会是全苏党的系统的一部分，州执行委员会是苏维埃政府系统的一部分；执行委员会实际上代表所谓的“苏维埃政权”。但是，无论是在一个州或整个国家，都是党的系统权力更大。

党委会又已经不负责农业，也就没有兴趣再让成千上万的蓝领、白领工人去割干草、搞收割、挖土豆或收获其他蔬菜。失去了这种传统的援助，农业生产任务无法完成，不少庄稼干脆在地里烂掉了。

报纸上开始出现由政府授意发表的文章，鼓吹应该提高农庄庄员的劳动生产率，并坚持说农村其实有足够的劳动力<sup>①</sup>。这些文章没有起什么作用。即使提高农庄庄员的劳动生产率，也无法补充需要从城市抽调的劳动力，农庄庄员的负担加重了，又颁布了新的清规戒律，特别对自留地和自留畜的使用加以限制。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各加盟共和国和全苏的党中央机构也做了分工，分别建立了中央委员会工业局和中央委员会农业局。尽管这些局的顶头上司都是一个人——赫鲁晓夫，但从整个党的组织结构来说这时是分成了相互独立的两个部分。一个稍微近似于两党制的制度开始出现。尽管仍然统一在同一个思想体系和党纲、政纲之下，但已经带来了两党制所潜藏的问题。

随着州党委分为工、农业两个部分，区一级在几十年里发展起来的指导农业的机构也完全改变了，一个州里按地理位置划分的区被加以合并，取消了原有的区党委和苏维埃委员会，代之以区域性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管理机构来领导生产，这些机构的党的委员会行使过去农村区党委的职责。合并后的区成立了区苏维埃，但职责是有限的，不负责管理生产。

实行地区合并的效果从下列数字可见一斑。合并前的俄罗

---

<sup>①</sup> 如与美国或西欧相比，这是确实的。苏联的农村人口比这些国家多得多。而大多数农村居民，不是战争遗留下来的寡妇，就是老年人或由于战争而永远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了一千五百万寡妇和二千万终身残废者，他们大部分人家都在农村。因为在战时，工厂都改为从事军工生产，多数工人可以不服兵役。



斯加盟共和国，平均每个人口是三万七千人，有十二个集体农庄。1963年以后，变为六万八千人，二十四 个农庄。在乌克兰，新合并地区平均人口是十万，合并前的区是四万九千人<sup>①</sup>。在乡村公路网不完备、通讯系统落后的情况下，突然在全国范围建立起新的地区中心，而且往往离集体农庄很远，造成了通讯联络的中断。常常是因为仅仅到新的地区中心去一趟，就给普通居民和农庄或农场的管理人员带来极大的不便，普通居民有时是需要办理某种证明或许可证的。

过去在本地区举足轻重的州党委第一书记，这时不再享有往日的权威。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分清工业书记和农业书记究竟谁主管一个州。他们各自独立地行使职权，都直接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一个向中央委员会工业局，一个向农业局。这个问题变得很棘手，因为毕竟需要有一个主要负责人。

按照过去的制度，如果要将一个地方党的领导选入中央委员会，那么总是也只能是“第一”书记。而现在，有的州因为工业书记过去担任过第一书记，所以条件较为优越；有的州则是农业书记占上风，特别是如果这位书记受过农业方面的专门教育。曾经担任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的农业书记，也许认为自己是州里的第一号人物，而他的工业方面的对手可能根本不承认这一点。根据传统的做法，州委书记也被选为全苏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也是如此。而现在就意味着，每个州共有四个可能的竞争者。但是宪法规定的人口与代表名额的比例（每三十万人选一个代表），并不是每一个州在最高苏维埃里都可以有四个代表席位。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还有第五个人，即州里的头等模范工人或农庄庄员，也有

---

<sup>①</sup> 见《共产党人》1965年第一期，121—122页。

权要求被选为最高苏维埃代表。

州党委会与苏维埃委员会领导人之间的竞争自然是很激烈的。这种竞争并不意味着人民可以充分发扬民主，选举“较好的”代表，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毕竟是一点民主的萌芽——有了过去根本不存在的某种形式的竞争。州委书记不再是一个地区的土皇上，而只是工业或农业方面的地头蛇，哪个书记的意见对检查官或州法官更有分量？谁对警察局局长发号施令？谁来主持州的思想工作会议？谁主管公共卫生事业和教育？这样，一个统一的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党，是不是被分成了两个党——工人党和农民党？甚至州的报纸也不得分成城市报和乡村报两种报刊了。

新的管理体制，并没有使工、农业生产兴旺起来。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中坚力量的州委书记们，由于赫鲁晓夫早期的改革提高了他们的地位，曾热情支持过他，现在则转而激烈地反对他。中央委员会里工业和农业两个局的存在，削弱了主席团的权力，主席团的成员们因此也对赫鲁晓夫不满。看来，已经等不到下届党代表大会，即到1965年再来扭转这种全面改革的趋势了。党内的不满情绪必须立即平息，一元化的州党委会的固有权力必须恢复。否则，由于对资金，对在最高苏维埃的席位，对中央委员名额，对财政预算的分配，以至涉及政治生活各个方面的竞争引起的冲突，将会导致党的分裂。谁知道这样划分、再划分的界限是到何处为止？甚至连克格勃也分成两部分都不是不可想象的了。

在苏联政体的发展过程中，两党制在实质上或许是一种进步，最终也可能成功。但在那时，共产党实行这样重大转变的条件还不成熟。显然，只有撤换赫鲁晓夫其人，才能消除州一级权力的二元化。1963年初，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将何时发

生——也许要等几年时间。但是不管怎么样，定于1964年底或1965年初按期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将决定他的命运，并使党恢复传统的对各地的一元化领导。即使意味着牺牲主子，土皇上们也要回到他们的王国去。这时，只有出乎意料的惊人的成就——如持久的农业——才可能挽救赫鲁晓夫。

1963年，是赫鲁晓夫任职期间内两个值得庆贺的周年纪念：担任第一书记职务十周年和就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五周年。报纸、讲话电影，充满了对他的热情赞扬；他的著作以多种版本出版；报纸每天登载他在不同场合、不同内容的照片；新闻纪录片以重新焕发起来的狂热报道他的活动——一切看起来都将象在暗示，这十周年的确是充满胜利的，但对赫鲁晓夫来说最不幸的，正是他自己的“领地”，他倾注了如此之多的心血的农业，恰恰在1963年成为灾难的根源。

## 第十四章 失败的苦涩

1963年，苏联某些地区受旱，虽然不象过去的旱灾那么严重，面积也没有那么大，但就是这不大的旱灾，与其他复杂情况加在一起，使整个地区面临饥荒的威胁。1953年，在类似的坏年景之后，马林科夫批准将国家的战略储备粮卖给加盟共和国，赫鲁晓夫对此大加指责，他慷慨激昂地说，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存战备粮。没想到十年之后，他发现自己处于同样的境地。

起初，1963年的旱情并没有引起人们普遍的忧虑。近八年的官方宣传已使人们相信，自1953年以来，国家的粮食产量几乎翻了一番。当然偶尔还可能有收成不好的情况，但是大家都以为，在八、九年的时间里，国家肯定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储备，以防止饥荒。然而1963年刚刚到9月份，正值赫鲁晓夫即将庆祝他担任第一书记十周年纪念之际，南方大部分地区、乌克兰、北高加索和外高加索的面包供应开始急剧减少。人们为了

买二、三公斤面包，要排几小时长队。商店很快就不得不对每人所要购买的食物数量进行限制。面粉从货架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面包还能保证供应，成千上万的人从附近城镇拥到首都来购买食品，真相很快地败露出来——国家仓库并没有储备。

所有迹象都表明，如果继续无限制地销售，1963年收获的粮食，将维持不到1964年的秋收季节。为了保证全国的粮食供应，必须恢复战后已经取消了的官方定量配给制。

## 形势确实使赫鲁晓夫很难堪

他意识到，南部地区的饥饿会引起全国恐慌，已经朦胧出现的农业危机也不是容易解决的。只有从国外大量购买粮食和其他食品，才能解救灾难，无论在沙皇时期还是在苏维埃的历史上，都还是第一次需要这样大规模地采取紧急措施。国家没有足够的硬通货储备，来支付这样巨额的购买。赫鲁晓夫因而被迫采取了极端行动——除手头现有的硬通货外，还动用了部分国家黄金储备。第一批总计为500吨的金锭，运到了伦敦的黄金市场。贸易代表团被派往很多国家，其中主要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甚至包括西德和法国，去购买粮食，有少量粮食是在美国购买的，并在芬兰买了一批麦稞。与此同时，还不得不增加了其他食品的进口——从澳大利亚和南美洲进口肉类，从新西兰进口黄油，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进口家禽和各种罐头食品，甚至从中国买了罐头肉。这样，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苏联，落到了在农业上要依赖资本主义国家的地步，而且至今未能摆脱

这种依赖。

## 更多的烦恼

1963年的粮荒并非旱灾所致，而是1959年以来，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素引起的日益严重的混乱造成的恶果。1959年时已经很清楚，苏联的农业无法达到新“七年计划”中极度浮夸的目标。这个罪责(和以往一样)，又落到了农庄庄员身上。一种很流行的指责，是说他们在集体农庄劳动的时间太少，花在自留地上的时间太多。赫鲁晓夫在1961年至1962年，重新实行了对农业工人的惩罚政策，试图通过经济手段，使他们集中精力在集体农庄劳动，更多地依赖于农庄的收获。并强制实行了严格的控制——连集体农庄可以种多少土豆都是严格限制的。

报纸上发动了对自留地的强大攻势，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残余。在自由市场上出售自留地产品的农庄庄员，被视为“投机倒把者”。但是自留地的产品，在国家副食品总产量中，占有不可忽视的比重。据经济学家统计，五十年代末期，自留地的产品约有80%是农民家庭自己消费的，只有20%拿到市场出售。而这20%构成了城市市场上出售的新鲜蔬菜的50%左右，和新鲜水果的30%。

由于种种指责谩骂，私人生产的副食品，产量急剧下降。在国家批准的农庄自由贸易市场上，1959年——1962年期间的副食品销售额大大减少，市场价格却有上升。这使得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和数百万的农民家庭，变得更加依赖于国家的食品供应，农民的积极性完全被扼杀了。

另外，肉类产量的指标又有提高，迫使许多农庄主席命令庄员将自留畜卖给集体农庄。仅1959年，以这种方式“购买”的奶牛就有300多万头<sup>①</sup>。私人所有的猪、绵羊、山羊和家禽的数目也大大减少。

更糟糕的是，从农民私人手里强行购买来并入集体农庄畜群的牲畜，喂养很差。以乌克兰为例，从庄员手里购买了牲畜之后，农庄的畜群头数增加了43%，而配给的饲料只增加了1%<sup>②</sup>。结果，集体畜群的扩大，并未使肉类和奶类的总产量增加——有的农庄产量维持原状，有的情况变得更坏。过去由私人喂养的1,200万头牲畜转为农庄集体所有之后，农庄需要的饲料量大大增多了，而农民不仅根本谈不上向国家出售和提供饲料，反而实际上要依赖国家作为饲料粮的来源。况且，既然不再允许私人自养牲畜，农民也就不再在自留地上种植饲料作物了。集体农庄畜群的扩大，本来应该是逐步发展的，并与饲料的增长情况相适应，而不能实际是靠剥夺庄员的奶牛，来扩充集体畜群。过去应允的，为放弃自留畜的农民从集体畜群中提供牛奶、黄油和肉食品的诺言没有兑现，在物品如此奇缺的情况下，也确实难以兑现。由于饲料不足，全国每头奶牛的平均产奶量下降，城市的供奶开始紧张。

与此同时，对在郊区饲养牲畜也做了限制，而这在过去是被鼓励的。赫鲁晓夫在1953年时曾公开讲过，住在市郊和小城镇的居民，对自己喂养的牲畜有所有权。现在又是他，向最高苏维埃提出了一项禁止这些居民拥有牲畜的法案。人民该谐地

---

① 见1964年莫斯科中央统计局版“1963年的苏联国民经济”，第313—314页。

② 《经济问题》1965年第八期，第25页。

称此法案为畜生法<sup>①</sup>。这项法案的通过，主要是由于政府对“集体”畜群都无法提供足够的饲料，自然不可能再象以往那样，将饲料售与个人。一些城郊居民只好买面包去喂奶牛。后来宣布，这是犯法行为，违犯者要被送去蹲班房。

所有这些措施都极不得人心，在农民中间尤其如此。根本说不上去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努力生产，提高产量。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超额完成”粮食及其他农业生产指标，也不足以解决人民吃饭和牲畜的饲料问题；如果再因气候不好（哪怕灾情并不严重）而完不成生产计划，就必然要导致灾难性的局面。

## 对休耕地的错误处理

另一个与旱灾一起造成了危害的错误做法，是耕种了本来应该进行休耕的土地。俄国的农民几百年来就知道，夏天休耕的土地，经过秋、春两季翻耕和经常除草，积蓄了水分与养料，来年夏末可以抗旱播种越冬作物（即可以在八月底播种冬小麦）。到了本世纪，才通过科学方法查明，经过夏季休耕的土地，之所以能积蓄氮（通过固氮微生物）和其他养料及水分，是由于有利的土壤结构。夏末秋初时节播种在这种土壤中的越冬作物，在秋季即生长出大量植被，根部也长的很好，扎的很深。

---

① 俄文SKOTSKY zakon—词中的形容词SKOTSKY意为“有关牲畜的”（广意指任何家养牲畜），该形容词是从名词SKOT引伸而来的。SKOT用于指人时，相当于英文的贬义词“猪彘”或“畜牲”，因此这里的用法是相当贴切的双关语。—英译者注



有了这样防护性能良好的根系，庄稼便可以顺利过冬。开春以后，作物迅速返青，成熟较早，往往在夏末经常发生旱情之前就可以收获。这样的越冬作物，显然比春天播种的作物有更多的优越性。

但是赫鲁晓夫和他的一些顾问们认为，让土地在夏天休耕，无异于闲着一块空地，纯粹是一种浪费。他在这个问题上，尤其受阿尔泰农业研究所所长G·A·纳利瓦伊科，和美国衣阿华州农场主罗斯韦尔·加斯特的观点的影响。这两个人的观点又是基于容易使人产生误解的数据，这些数据资料实际上只适用于有充足的肥料来源和除草剂的精耕细作的情况，而苏联在当时还不具备这些条件。

每年在夏季进行休耕的土地的面积，一般约为一千八百万公顷。赫鲁晓夫和以往一样，又是等不及先进行小范围的试验，就在1962年大面积地取消了休耕地。有三分之二，约计一千一百万至一千二百万公顷的休耕地，种上了玉米、向日葵等作物。但是赫鲁晓夫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尽管耕作面积大大增加了，1962年的产量却仅略高于1961年。

由于不再有可以进行早期播种的休耕地，越冬作物的播种，不得不比理想日期推迟一个月至六个星期。更糟的是，播种只能在刚刚收获完毕、地力已十分衰竭的土地上进行，寒冷季节到来之前，没有足够的时间使根系和植被充分生长。结果，1963年的严冬播种较迟的作物全部毁掉，而播种在仅剩的几百万公顷休耕地上的庄稼，安全的渡过了寒冬。

1963年的旱情发生的较晚，到夏季后半期才出现。在休耕地上端种的冬季作物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而播种较迟的越冬作物损失后，又补种的春季作物，受到了严重影响。

春天播种在处女地的庄稼也受到了旱灾的影响，春季作物

和随后播种的普通作物统统早死了。但是处女地垦区休耕地上的越冬作物，收成却不坏，只是因数量太少而挽救不了大局。

就这样，1962年的两个严重错误——对自留地的限制和取消夏季休耕地，使1963年不太严重的旱情，形成了严重的全国性农业灾难。

赫鲁晓夫很迟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在1963年12月的中央全会上，他附加了各种条件后承认，在苏联受周期性旱灾影响的一些地区，进行夏季土地休耕还是必要的。出席全会的与农业有关的所有成员都很清楚，苏联为什么突然需要进口一千二百万吨粮食。如果按传统的做法休耕土地，这些粮食完全可以在苏联境内生产出来（无需费太大的气力，即可在休耕地上收获二千万吨粮食）。

所有与会代表，对赫鲁晓夫准予恢复传统耕作方式的决定，报之以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这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基本愿望：再也不愿意排长队去买加拿大小麦做的面包、阿根廷进口的肉、丹麦的黄油、波兰的鸡蛋、保加利亚的鸡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蔬菜。

## 首当其冲的肥料问题

赫鲁晓夫在1963年的旱灾之后终于认识到，起初设想作为临时应急措施，以争取时间去发展传统农业区的“开垦处女地计划”，实际上阻碍了传统农业区的发展。1963年的痛苦教训迫使他重新认识形势，但是他又一次被自己“奔放的热情”蒙住了眼睛。

年景不佳的预言成为事实以后，赫鲁晓夫终于不得不承认，农业的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化的肥料。于是，出于他的典型性格，赫鲁晓夫为苏联化学工业的发展制订了一个惊人的目标——到1970年，化肥生产将扩大到一亿吨（即在七年内增长五倍）。为了达到这个宏伟目标，每年必须增产化肥一千二百万吨——是1953年至1963年平均增长率的十倍（苏联在这方面要再一次“赶超美国”）。

赫鲁晓夫没有征求有关的计划部门或农业化学、化肥专家的意见，也没有考虑历史的教训，就宣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在美国和西欧的农业高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化肥生产，在苏联是非常落后的。1937年，产量只有三百万吨，与苏联这样一个大国极不相称，西欧任何一个小国的化肥产量都高于这个数字。战后，化肥的产量有所提高，但是从未达到计划的指标。到1950年时，产量只有五百五十万吨——仅达到计划的三分之一。1953年要使产量达到一千七百万吨的努力未能实现，因为产量到一千三百万吨时，生产能力就饱和了。<sup>①</sup>在所有既定的农业发展目标中，完成情况最差的是化肥生产，落后于计划40—45%。到1962年，化肥的产量才达到1950年制订的一千七百万吨的指标。但即使在这一年，苏联每公顷土地施用的化肥，只有美国化肥施用量的三分之一，法国的七分之一，英国的十一分之一和西德的十五分之一，而且使用的是质量低劣的非颗粒状化肥，除草剂则几乎根本没有使用。

不仅集体农庄没有什么储放化肥的场地，铁路部门也没有专门运送化肥的车皮。根据国家的统计数字，这使将近四分之一的肥料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损失或变质了。另外，集体农庄没有播撒化肥的机械，只能靠笨重的手工劳动进行操作。

<sup>①</sup> 见1963年莫斯科中央统计局版《1962年的苏联国民经济》。

由此看来，赫鲁晓夫要突然大踏步前进，每年增长一千二百万吨化肥，达到总产一亿吨的目标，是十分荒唐的（过去三十年中，一年的最高总产量，还不是只有一千七百万吨）。当赫鲁晓夫被严肃地告知这些无情的事实时，他只好想办法，既把数字降下来，又不至于丢面子。他首先安排了一次特别中央全会，然后，由中央委员会出面，邀请一些著名科学家、化学家和农业化学家，起草一封公开信，建议修改一亿吨的指标，拨发更多的资金，用以建造仓库和提高化肥的质量及施用方法。这就使赫鲁晓夫可以在“认真考虑了科学家们的建议”后提出，将一亿吨的指标改为七千至八千万吨，年增长量由一千二百万吨降为七百至九百万吨。

就是这些较为节制的数字，也未能兑现，完成率不过50—60%。而且生产出的很大一部分化肥，没有用于小麦及其他粮食作物，而是被一些专门作物（如棉花、向日葵等）占用了。

因此，1963年不甚严重的旱灾（其危害由于对自留地和休耕地采取的愚蠢的措施而加重），又加上为改善农业状况而制订的化肥生产计划的失败，这一切，使1964年成为比1957年对赫鲁晓夫来说风险更大的一年。

## 对赫鲁晓夫的补救措施的反应

赫鲁晓夫在绝望的困境中，一次又一次召开中央全会，会议中心都是围绕农业问题，但却发现不了能够解决问题的奇迹。

从丹麦和瑞典访问回来之后，赫鲁晓夫又向主席团提出了

一个新方案，要对整个农业管理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这项计划准备在十一月提交中央全会讨论。赫鲁晓夫在此方案中提出，在莫斯科建立十二个全国委员会，分别指导十二项专门的农业类别，即：畜牧业、家禽饲养、粮食生产、土壤改良、农业机械、化肥使用等等。每个委员会要有不少于五百至六百名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个提议草案除递交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外，还发给了所有的州党委。全国各地纷纷于八月份之前召开各级党的会议，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赫鲁晓夫的设想又是根本行不通的。这个方案将意味着，在实行农业工业双重领导的同时，还要彻底肢解整个管理体制。州委书记们对权力划分的状况已经很不满意，现在那些主管农业的书记，在莫斯科又要多十二个不同部门的上级。

对赫鲁晓夫的“初步方案报告”的不良反应，加强了反对他的那些中央委员和州委书记们的势力。这不同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1957年组织的那场“阴谋”。在最坚决地主张赫鲁晓夫必须下台的那些人当中，有很多人本来是不希望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的，而且当时还尚无明确的人选来接替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主席团的所有成员，和大多数中央委员，几乎都是靠了赫鲁晓夫的提拔，才取得了这样高的地位。他们在一定的时期里，都曾满腔热情地与他共同奋斗过，给予过他支持，并且成为他的权力的组成部分。但是现在这步棋是非走不可了。在复杂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时代，掌管苏联这样一个大国，不是任何哪一个人力所能及的，特别是如果这个人不仅缺乏所需要全部专门知识，而且更甚的是，没有接受有价值的建议的必要耐心和通情达理。

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们首先承认，他是“好心办坏事”。但不论他的个人品质如何可敬，他实际上是在把国家，而且（对州

党委和中央委员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在把党引向灾难。他在损害党的中央领导的基础,损害党的团结,并且已经威胁到了党内要害职务的任期。他的反对者们说:“我们不想,也不再需要任何改革”,“必须恢复过去稳定可靠的集中领导的方式”。鉴于这些考虑,他们于是下决心剥夺了赫鲁晓夫的权力。

## 第十五章 赫鲁晓夫下台

下决心将赫鲁晓夫从权力中心驱逐的人们，不想再重复1957年的错误。他们缓慢而审慎地制订了作战部署。赫鲁晓夫的权力，最终要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剥夺，但是首先需要召开一次主席团预备会议，讨论批准历数赫鲁晓夫所犯错误的重要报告，说明他如何独断专行，违犯了党章规定的集体领导的基本原则。当时，赫鲁晓夫正在离索契不远、位于黑海之滨的皮松达海角别墅中，欢度十月份的假期，这使得预备性讨论较为容易进行。赫鲁晓夫度假的这个地方，有一种奇特的植物现象——保存了一座唯一幸存下来的古代松林。一道数英里长的水泥墙，将海角的三分之二围起，赫鲁晓夫的别墅，就在这道围墙后面离海不远的地方。正是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最后几天。

1964年10月，部署赫鲁晓夫下台计划的时间，正是他的威信在上至党的领导人、下至集体农庄庄员的几乎全体人民中，

处于低潮的时期。这时没有任何一个较有影响的阶层，无论科学家、医生、作家、教育工作者、艺术家、工商业管理人员、工人、机关干部、军人、青年人或老年人，愿意对赫鲁晓夫表示支持。除了私人顾问的小圈子之外，党和政府系统内，也没有任何一个派别是亲赫鲁晓夫的。这些顾问们尽管身居要职，却没有个人实权。因此，赫鲁晓夫的下台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合法程序，即召开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和中央全会来解决，而无需1957年那样的“阴谋”。

1957年时，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关键性人物，竭力不让中央委员会的一般成员了解他们的行动计划。1964年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十月初，在正式召开中央全会提出最后决议之前，中央委员被从各州召集到莫斯科，并分别向个人或小组传达了使赫鲁晓夫下台的步骤、作法。向讨论小组介绍情况的工作，主要是由苏斯洛夫出面作的。在全体二百多名中央委员中，只有三个人不同意预定的决议。这三个人是：中央委员会农业书记V·J·波利亚科夫、列宁格勒州委书记V·S·托尔斯科夫和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一个成员。据传，乌克兰的代表曾试图与赫鲁晓夫通电话，提醒他注意事态发展，但未能打通。显然，他在黑海寓所的电话系统已被控制。

讨论撤换赫鲁晓夫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于1964年10月11日召开。米高扬没有出席会议，因为他当时也正在离赫鲁晓夫不远的地方休假（与目前流行的对这些事件的叙述相反的一种说法是，由于他是赫鲁晓夫的密友，因此根本没有将所要实行的计划通知他）。1957年拯救了赫鲁晓夫的人物之一弗罗尔·科兹洛夫，因重病缠身，也未参加会议。除主席团成员及候补成员之外，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一些州的州委书记，共二十二出席了会



议。尽管国防部长R·马列诺夫斯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V·谢米恰特尼，其他军队、国家保安系统和警察官员，都尽知内情，并支持已经准备好的决议，但还是采取了特殊保安措施。从最初的预备会议开始起，到最后决议切实通过时止，对赫鲁晓夫实行了隔离。

外国报纸对赫鲁晓夫下台的“意外事件”，充满了耸人听闻的“阴谋”或“政变”的谣传。实际上，事件的组织者已做了周密考虑，使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在宪法及党章允许的限度之内，以避免任何在全国较大范围引起动乱的可能。起初，准备保留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职务，因为选举或撤换中央委员，要由党代表大会决定。但是后来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的最初反应，他的激怒、粗暴、甚至带污辱性的举动，使得不可能再为他保留中央委员的身份。在中央全会上将作主要发言的是苏斯洛夫，但是已经决定，选举勃列日涅夫为第一书记。

这时，克里姆林宫与外界的联系已被完全断绝，赫鲁晓夫的所有联络线路，自然是处于严密控制之下。10月11日，赫鲁晓夫接到一个电话，通知他主席团正在开会。召开会议的原因（赫鲁晓夫对此会议毫无所知），据当时与他通话的勃列日涅夫说，主要讨论赫鲁晓夫关于进一步划分农业机构的计划，即前面提到的他的“初步方案报告”。

赫鲁晓夫起初拒绝（而且是相当粗暴地）在这样仓促的情况下参加会议。（米高扬也被通知去莫斯科，这时已经动身。）间隔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勃列日涅夫又通知赫鲁晓夫，如他继续拒绝前来莫斯科，主席团就将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开始会议议程。在这之后，赫鲁晓夫才同意立即起身去莫斯科。为他准备的是一架军用飞机，不是他自己的私人专机。飞机在莫斯科降落时，他要求送他回家，但卫士拒绝服从，并通知他，事先已

接到命令，让他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宫。

主席团会议一直进行到10月13日深夜。只有米高扬曾一度反对撤换赫鲁晓夫，但后来还是加入了多数派的行列。赫鲁晓夫起初不同意自动退休，坚持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他仍然希望能象1957年那样，得到中央全会多数成员的支持。但在10月13日夜间会议休息时，米高扬说服了赫鲁晓夫，递交自愿退休声明才是明智的作法。后来在报上发表的辞职申请的措辞，也是在这时商定的。由于赫鲁晓夫的“合作”，会上决定，预定10月14日下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不展开广泛讨论，也不对赫鲁晓夫做尖锐的公开谴责。

主席团会议在10月14日上午继续开会。下午，经过充分准备的中央全会开始进行。全会由勃列日涅夫宣布开始，米高扬主持，苏斯洛夫做了关于撤消赫鲁晓夫的职务及其原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发表了许多针对被贬黜的领导人的恶意评论，随后，未经讨论，一致通过了撤销赫鲁晓夫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以及取消他的中央委员资格的提案。

苏斯洛夫的报告，着重论述了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错误，此外还指责他企图建立“赫鲁晓夫迷信”，滥用职权，任用亲戚朋友当顾问，形成非正式的“小内阁”，用听取亲信顾问的意见代替征询主席团的意见。同时指责他让全家人都介入政治——他的女婿、《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依，以类似非正式“外交部长”的身份行使职权，许多外交政策的制订都没有征求葛罗米柯的意见，这种状况使苏联的驻外使节感到十分迷惑。受到批评的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决议，有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和副总统阿密尔授与苏联英雄称号，以及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其实最需要粮食的时候，却在那里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价钱昂贵的体育馆。

赫鲁晓夫下台之后，阿朱别依、《真理报》主编P·萨丘科夫和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哈尔拉莫夫，都象中央委员会农业书记V·波利亚科夫一样，因助长了“赫鲁晓夫迷信”而被解职。除此之外，党和政府内均未发生其他重大改组与人事更换。全会还通过决议，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与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永远分离，不得兼任（后面一个职务被建议由柯西金担任）。

赫鲁晓夫下台的事件，在西方广为流传，并有很多文章进行了报道，人们对事件的一般发展过程了解得十分清楚。苏联报纸却没有宣布任何细节，而是在10月16日之后，由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委员会其他高级官员，纷纷出发到全国各地，会见党的积极分子，向他们解释已经通过的决议及其背景。通过这些“内部”会议，人们才逐渐了解到10月12日至15日在莫斯科发生的许多事情。

之所以让苏斯洛夫做主要发言，是因为他早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是主席团成员，并不是由于赫鲁晓夫才取得这样的地位，而其他主席团成员多数都是赫鲁晓夫提拔的。在赫鲁晓夫全盛时期，他们曾争先恐后地充当他的吹鼓手，这就使他下台之后出现了有趣的局面。因为赫鲁晓夫时期虽然没有实行集体领导，但是大家共同负有责任。所以尽管赫鲁晓夫下了台，却没有对他的政策进行公开的讨论或做正式的批评。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在实施目前受到攻击的各项计划和改革中，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苏斯洛夫的讲话和会议文件，都从未发表。后来，在对党的积极分子介绍情况并进行讨论时，也仅涉及到了赫鲁晓夫很少的几点错误。象勃列日涅夫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之后说的那样，“我们不能往自己脸上抹黑”。他建议，对党外人士和报界，除了报纸发表的官方

说法之外（即赫鲁晓夫因年龄和健康原因，已根据本人要求被解除职务），不应对他被撤职的原因做任何其他说明。

一般公众舆论对赫鲁晓夫的“辞职”及克里姆林宫领导的其他变更反应冷漠。据说，当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头头向勃列日涅夫报告说，没有发生群众示威，甚至在全国各地没有发现任何一起支持赫鲁晓夫的声明时，他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毕竟十多年里，赫鲁晓夫的各种活动通过所有的宣传工具不断进行报道，报纸上几乎天天有他的照片。况且，确实有不少人从他的许多改革中得到了好处。

赫鲁晓夫退休以后的生活很少为人所知。他下台之后受到的待遇，比他对马林科夫或布尔加宁的处理要细致、周到一些。发给他的退休金很高，并允许他保留莫斯科的公寓和郊外的别墅<sup>①</sup>。还给他配备了一辆有司机驾驶的专车，并有一个小组负责保卫他的乡村住宅，同时显然也是对他进行监视。他有时甚至还被允许会见外国记者，但从来不在苏联报纸上进行报导。

在退休的最初几个月里，赫鲁晓夫几乎一直处于消沉状态，很少离开他的寓所的范围。到1966年时，他已经习惯于作为一个退休者的生活，开始到莫斯科去走走，去看戏，看电影或者非正式地会见他认识和喜爱的作家、艺术家。他有时干脆就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散步，人们当然能认出他来，有时还和他交谈。这样散步时，他总是由保卫人员陪同着，这些保卫人员并不干涉他的活动，随他与别人去攀谈。有时，他也邀请老朋友来乡间别墅作客，但多数被邀请者，总是以某种借口加以婉拒。他

---

① 赫鲁晓夫执政时，与大多数主席团成员和政府高级官员一样，有四处寓所，莫斯科的一套公寓；一个由国家提供各项服务的豪华的市内住宅；市郊的一所乡村住宅和黑海滨的一栋夏季别墅。莫斯科的公寓和乡村住宅，被视为领导人的个人财产，死后可留给家属。莫斯科的市内住宅和黑海滨的别墅，在离任后归还政府。

喜欢听外国电台的俄语广播，特别是BBC电台的俄语节目。

赫鲁晓夫在他居住的乡村居民区散步时，享有完全的自由。他有时走得很远，眺望毗邻农场的田地。一次这样散步时，他看到有一块地种得很不好，便让工人把领班和场长叫来，当面严厉批评了他们（这样做当然是正确的）不负责任、马虎从事的工作态度。他出于习惯，不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还具体提出了改进办法，下了命令。起初，这些头头尽管迷惑不解，还是有礼貌的。后来，场长被赫鲁晓夫相当切中要害的尖锐批评所激怒，终于走上前一步，生硬、直率地回答说：“你现在已经不是部长会议主席，无权干涉我们农场的事务。我们自己知道应该怎么做”。以后很长时间内，赫鲁晓夫一直怨恨地记着这件事。

七年漫长的深居简出的生活渐渐逝去。而后，1971年9月13日，全世界得知，赫鲁晓夫因心脏病，于两天前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去世。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发表了一条简短的新闻公告，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公告中对“荣誉退休者赫鲁晓夫”的逝世，表示“悲痛”。

赫鲁晓夫的葬礼，没有在克里姆林宫墙外列宁墓旁边的小型公墓举行，而是在古老的新处女修道院<sup>①</sup>墓地进行的。前者是通常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及象宇航员尤列·加加林那样的杰出英雄举行葬礼的地方，后者则是为稍微次要一些的优秀人物（如科学院院士、副总理、著名作家、艺术家等）专门保留

---

① 由于著名的纪念碑和雕塑，新处女修道院及其公墓，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游览地。座落在这里的赫鲁晓夫之墓，赢得了最后一份荣誉。他的由苏联雕塑家叶尔恩斯特·奈兹维斯提尼塑造的纪念碑，是公认的艺术杰作。这个作品如此惊人，以至拖了一年多时间，才得到所需要的安放许可证。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小型墓地上，不允许建造大型纪念碑，墓碑也都相当朴素。

的墓地。除有莫斯科市议会的批准外，一般人不能安葬在新处女墓地。(而要安葬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小墓地，则需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批准。)约150人参加了为赫鲁晓夫举行的简单的安葬仪式，其中有他的直系亲属，和几个由于他而得以恢复了普通公民生活的过去的政治犯。没有苏联官方人士出席葬礼，但是党中央委员会送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花圈。

## 第十六章 在赫鲁晓夫之后

赫鲁晓夫离开政治舞台之后，没有象斯大林死后那样出现一种权力真空的状态。——尽管政治斗争无疑还会持久地进行下去，但真正的集体领导开始出现，虽然本质更趋于保守。这个班子是由许多至今（1976年）仍和我们在一起的人物组成的——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为了增强权威性，这个职称后来改为总书记）、总理阿列克塞·柯西金和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

如人们所能预料的那样，不久便开始对赫鲁晓夫曾经实行的几乎所有内政、外交政策进行重新审议与修正。过去按行政区划组织州党委的作法得到了恢复，合并了的地区又重新分开。党和政府的机构不再自上而下分为农业和工业两部分。各级经济委员会和全国的全国委员会均被撤销，又重新建立了更合乎传统的政府各部，而且这些部在指导某一专门工业方面，被授予更大的权力。全苏农业部以及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农业

部，从被下放的农场回到了莫斯科，又搬回了他们在下放前曾享用过的舒适的办公楼。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的农业部，也都回到了各自的首府城市。专门修建“农业城”，建立农业教育中心的计划被彻底废弃，莫斯科的季米里亚泽夫农学院，又一次敞开大门招收新生。李森科被剥夺了制订政策的权力，遗传学的教学和研究终于走上了现代科学研究的轨道。有关农业问题的中央全会推迟到1965年才召开，以便能有时间想办法消除由赫鲁晓夫的改革造成的后果。为此采取的措施有，缩小处女地的面积，将集体农庄的自留地恢复到原有的规模，以及废除对私人拥有牲畜的限制。同时也在考虑工业方面的经济改革，改变僵硬、一体化的住宅与工业建筑规格，及其他需要改革的一些经济问题。

对宗教的压制和迫害不再继续，东正教又可以做礼拜并散发教义——但只能在教会的范围内。许多有文化或历史价值的教堂和修道院开始修复。克里姆林宫意识到，在目前国家实行严密控制的情况下，与其把教会看作是被宽恕的反对派，不如视其为盟友，它将有助于培养一种服从的意识。遵奉宗教礼仪，在俄国农村中一直是很盛行的，因此重新开发农村教堂和恢复礼拜，制止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这算是一个额外的收获。

赫鲁晓夫对中等教育的“改革”也被停止。传统的十年一贯制又取代了十一年制综合技术教育计划。同时仍为十四、五岁愿意学习某一专业技术的儿童开办了专门的职业技术学校。

赫鲁晓夫时期典型的花钱少而外观丑陋的住宅建筑，以及统一单调的办公楼设计，均被废止。有特色的建筑物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相继兴起。已建造完毕的标准化建筑也在可能的



情况下加以修饰，使之变得较为美观。今天，在苏联的任何城市，人们都可以十分容易地分辨出，哪些是斯大林时代的建筑（特权阶层的高级寓所），哪些是赫鲁晓夫时期大规模迅速建造的难看的楼房（即赫鲁晓夫贫民窟），以及后来那些较符合现代建筑风格的居民住宅

以上这些变化，既不是一昼夜之间发生的，其效果又需要几年时间才能看清楚，在农业方面尤其是如此。

1965年春天，当农民有了选择的自由时，玉米的种植面积大幅度降了下来。三叶草等多年生牧草又开始生长。赫鲁晓夫的一些政策，无疑在农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但总的来说，不满情绪有所缓和。已经取消了的机械——拖拉机站，不可能再恢复起来，已经离开农村的那些人，也不可能奇迹般地返回。经济上的发展变化，在苏联这样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进行得十分缓慢，农业落后的基本因素，在赫鲁晓夫去世后多年，还依然存在。

选举制度上遭人忌恨的改革，即党章上关于中央委员会及州党委会的成员，在每次改选中必须更换三分之一人选的规定，很快就被取消了。那些失去了重要职位的高级官员，又回到了特权阶层的宝座上，尽管职位稍有降低（他们被任命为副部长、加盟共和国的部长、州委书记、州执行委员会主席或派驻国外任大使）。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循序渐进的，不象赫鲁晓夫时期那样，总带有不可捉摸的突然性。

赫鲁晓夫遗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国际问题——与中国的冲突，未能得到解决。中国舆论对赫鲁晓夫的下台表示高兴，但他集中批评的是他的外交政策，而这些政策肯定要由新政权继续执行下去。

赫鲁晓夫是自由化的政治改革的倡导者，他的垮台，不可

避免地导致了保守势力的复苏，所谓“新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开始出现。随着赫鲁晓夫的名字从每天的报纸上消失，报刊又开始以肯定的口吻提到斯大林。为了抵消赫鲁晓夫单方面削减部队和军事预算造成的影响，军队建设又有所加强。在赫鲁晓夫时期几乎已经完全处于无权地位的克格勃机构，这时也恢复了相当的实力。赫鲁晓夫一直是这样一个领导人，他更着重于把权力寄托在他个人的威望和得民心的程度上。鉴于新的领导尚不能依赖某个人或某些成员的集体威信来树立权威，党和国家的权力机构又需要加强，克格勃因此被授予了极大的权威。军队的政治实力也是不容忽视的，而且带有军事所特有的保守和极权的本性。

一次，在闲暇之余，赫鲁晓夫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自己的失败，回顾着问题出在哪里——尤其是在农业方面——显然正是这一想法，激发了他撰写回忆录的念头。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从回忆录中看，甚至直到最后一刻，赫鲁晓夫也没有认识到，他的不幸不是由于缺少拖拉机和肥料，或是没有好的管理人员和勤劳的农民，也不能将他的挫折归罪于农民不懂得怎样种植玉米。问题的症结在于，自从强制实行合作化以后，带有深厚的农民意识烙印的真正传统的农民，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他们已被残酷地压服。合作化运动企图把农村劳动力变成工业模式的变种，把农业工人改造成工业工人，同时剥夺了他们的基本权力。农业工人受到土地的束缚和官僚主义的纪律的制约，成为麻木不仁的政府和无动于衷的官僚主义的牺牲品。如果农业工人能被允许作为一个独立的农民进行自由劳动，或作为一个真正的合作集体的成员，在劳动中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那么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农业本来是最应该鼓励发展个人积极性与个体自由的。

而且，如果不是随着集体化的发展而将私人企业包括生产效率极高的个体工匠全部取消的话，那么不仅是农业，整个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都会更快。在政治上，如果不是采取不断强化的极权主义方式，而是逐步恢复社会主义民主，哪怕是先在党内恢复民主，然后逐步向全国范围扩大，情况也会完全不同。

新政权企图在不进行重大的政治民主改革的情况下，取得较大的经济效果的尝试，也没有获得成功。其保守主义的倾向，在1968年对捷克的军事干预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捷克的悲剧不仅震动了全世界，也使苏联领导人的威信下降到了极其可悲的程度，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通过内部改革与重新调整外交政策来挽回影响。

经过1965年一系列的改革，和解决赫鲁晓夫的各项改革遗留的问题后，整个经济形势明显好转。在1964—1974年的十年间，苏联的工业发展成绩显著，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提高。但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农业仍然远远落后，危机只是推迟了，并未消除。工业的发展有赖于农产品的增长，而农村依旧太贫困，使这种增长得不到保证。主要的问题还是：缺少能够有效地管理农业机械的技术人员；年轻人不愿留在农村劳动；化学工业的原始状态无法提供足够的化肥；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别，等等。（农村居民没有国内通行证<sup>①</sup>，因此调换工作或住地十分困难，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赫鲁晓夫曾经想过办法，避免每年动员大批城市工人、机关干部和大中学生，

---

<sup>①</sup> 从1976年开始，对城乡居民实行了一种同等的新通行证制度，人们可以自由地从城镇迁居到农村，或从农村返回城镇。过去，城市居民很不愿意到农村去工作，因为这样做往往是单行线——再想回到城市时，就十分困难了。

在夏末和秋天去农村参加收割，但是没有成功。1965年至1972年在秋天的收获更加依赖于市民和军队的情况下，城市居民不仅仍然在夏、秋收获时节被派往农村，而且春天还要去参加播种，仲夏去收割干草。这种农业状况，不可避免地要出现食品短缺，国家也无法储备一定数量的粮食，由此导致了1972年和1975年的两次比1963年更为严重的农业危机。苏联1972年从国外购买的粮食量，创了世界纪录（约3,000万吨，大多是从美国进口的），世界粮食供应的平衡被扰乱。全世界各地，甚至包括美国，粮农产品价格纷纷上涨，牲畜饲料和肉类产品的价格也都提高了。

这的确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苏联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拥有的可耕地面积都大，而且具有优越的发展农业和出口农产品的条件（与加拿大相比）。从这个角度来说，苏联必须对世界的粮食形势负主要责任。由于苏联大量购买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世界的粮食和其他食品涨价，对遭受周期性旱灾与气候灾害的穷困国家用以维持生计的粮食供应，因而减少。1973年石油价格猛涨和粮价上涨，这两个基本因素，实际上已经在一些亚非国家造成了农业危机和饥荒。那些传统的粮农产品出口国，如果在1974年拥有相当于1971年数量的剩余产品，那么较贫穷国家的旱灾与年景不好造成的悲剧性后果，就可能小得多。

世界粮食供应问题的压力，迫使苏联采取了一些新的农业改革措施，其效果在不久的将来即可显示出来。在我们看来，这些改革应该能使苏联从农产品进口国变为出口国。

人们尽可以对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进行批评指责，但他确实也做了许多值得人们称赞的事情。他所进行的改革的历史性后果，是十分矛盾的。他在执政后期对农业和经济方面的影响最为不利——在他下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不良影响仍

在起作用，并且助长了世界性农业危机的发生。尽管赫鲁晓夫要对向一些阿拉伯国家运送武器负责，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了后来这个地区的国际冲突的爆发，但是他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并非都是消极的。是赫鲁晓夫首先倡导了苏联与美国和欧洲之间相互合作的政策，后来发展为七十年代的“缓和”。一系列截然不同，然而又是相互关联的事件，已经使这种政策几乎是永久地破产了。这些事件是：1968年对捷克的入侵，军备竞赛的加剧，美国在越南战争的升级，克里姆林宫对苏联国内知识分子阶层日益增长的民主倾向的压制，以及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然而赫鲁晓夫播下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种子，总算得以幸存——各种迹象不断表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彼此越来越宽容。由赫鲁晓夫开创的，为在苏联实行民主变革的斗争，并没有完结。是他宣称，一种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优越性，不应通过军事的胜利，而应通过和平成就加以体现。这种积极的态度，是与冷战后的年代相适应的。

和平竞赛的观念，在一个时期中曾经仅仅意味着一种十分昂贵的技术表演：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并将第一个宇航员送入太空；美国接受挑战后，多次将三人小组送上月球，以此显示美国的技术水平仍高于苏联。但是近几年的事态表明，世界毕竟并不需要用这些“宇宙的”证据来证明一种政治制度优越于另一种制度。

没有什么更明智的政策，能象科学技术的革命一样，超越历史遗留的种族、宗教、民族和意识形态等问题，将世界变为一个整体。赫鲁晓夫在苏联的自相矛盾的举动（这种情况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中国文化革命的破坏性倾向，约翰逊和尼克松总统在越南、柬埔寨战争的失败，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

间短促而激烈的战争引起的隔阂，以及第三世界不断增长的饥饿与贫困（美国和苏联都想对第三世界国家显示自己制度的优越性），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意识到，对抗不能成为建设未来的指导思想。人们所需要的是不同制度间的友好合作，尤其是最强大的“超级大国”美国、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只有这样，那些更倾向于采取民族主义的和自我为中心政策的较小国家，才能变得更有节制，而不依赖诉诸武力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赫鲁晓夫的经历及其执政的年代清楚地表明，在当今极其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任何领袖个人，都不应该在他本国掌握过分的权力，或在国际事务中过分施加影响。世界必须从一两个人的主观决策的危险中解脱出来。个别领袖人物，无力单独处理所有现代世界的重大问题，甚至无力单独处理一个较大国家的所有重大问题。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目前所处的，是一个集体决策的时代，这种决策又是建立在全世界和全人类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的。帝国主义时代，战争与革命，都需要“伟大式的”政治英雄，而现代世界最需要的，是受过良好教育、有自制力的、明智的领袖人物。他们能够彼此对话，达成合理的妥协。权力过分集中于某个个人手中，不论这个人是由全民选举的“总统”，或是较小范围选举的“总书记”，还是以其他某种方式成为国家元首的，都不适应当今经济技术相互依存、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结构。现在，世界的问题只能靠深思熟虑的科学方法加以解决。世界上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存在，可以成为摩擦、分歧的根源，反之，也可以成为友好与互利合作的基础。因为不同的制度具有多种经济技术能力，有各自的经验，各异的潜力和独特的利弊。每当赫鲁晓夫试图单纯以意识形态为准绳做出决策时，他就会犯很多错误。他的许多错

误，也正是由于对背景情况了解不充分，以及观点上的狭隘偏见造成的。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他的急躁常常毁了本来是可以达到的目标。但是，当他将自己的决策基于普通的人之常情和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时，他的根基就坚实得多，对苏联和世界的历史所起作用也更积极。只有明确地实行这些原则，才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这便是我们对未来的领袖们的期待。